

唐 帝 列 传

唐 文 宗

冯 辉 著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前 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繁荣时期，大唐帝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中华民族引以骄傲自豪的辉煌灿烂时代。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逐渐走下坡路。唐朝中后期，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开始衰落，在朝廷内部，皇帝的家奴——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窃取了唐朝的政权和军权，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生杀废立皇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朝官反对宦官的斗争不断发生，朝官内部的党争迭起。在地方上，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内部各地，造成列镇相望的局面，尤其是“河朔三镇”，俨然是独立王国，唐朝中央政府力不能制，只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

唐王朝的第十四任皇帝唐文宗就是在这多事之秋登上皇帝宝座的。唐文宗是由大宦官王守澄等拥立的，但他又不甘心受制于家奴，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但却半途而废；后与李训、郑注谋划，发动“甘露之变”，企图把宦官一网打尽，但仍以失败告终。唐文宗对藩镇的割据势力，开始时还能调动各镇兵马，讨伐不服从朝廷命令的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勉强平定了这次叛乱。但以后对藩镇的桀骜不驯大都采取姑息、迁就的政策，听之任之，苟且偷安。唐文宗对于朝廷内部的党争也是束手无策，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旧唐书》评价唐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意思是说唐文宗恭俭儒雅，励精图治，孜孜为政，力图成为一个有为之君。即位之初，他确实想理平天下，抑制奢靡，提倡节俭，大开一代廉洁之风。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轻刑慎罚，重农惠民，颇有唐太宗之遗风。但是，唐文宗最大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又迫于宦官的威势，不敢有所作为，因此，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等重大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开成年间，唐文宗的锐气大减，心情忧郁，仅能维持残局而已，最后忧郁成疾，抑郁而终。

2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力图围绕唐文宗这个传主的事迹，全面反映唐文宗在位十四年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全貌。在吸收史学界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写作方法上，采取纪事本末体，使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通俗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争取做到雅俗共赏。

本书写作从搜集材料到成书，历时一年有余。尽管做出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四年岁末

第一章 宦官拥立,文宗登基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原名李涵,是穆宗的次子,母亲是贞献皇后萧氏。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日生,长庆元年(821年)封为江王。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文宗在宦官的拥立下即位,改名为李昂。开成五年(840年)正月辛巳(初四),崩于大明宫的太和殿,在位十四年,享年三十二岁。群臣议加谥号为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

1

第一节 敬宗被弑

文宗的前任皇帝敬宗在位期间喜好声色,贪睡晚起,怠于政事。有时候,百官在紫宸殿门外列班等候,一些老弱有病的大臣站得几乎跌倒了,也不见他上朝,而且每个月只不过上几次朝,连大臣都很难见到他。

敬宗崇信道教和佛教。道士赵归真以神仙之术,僧人惟真、齐贤、正简以佛教的祈祷求福理论向他宣传游说,敬宗十分信任这几个人,允许他们自由地出入皇宫。占卜算命之人杜景先请求敬宗允许自己前往江淮、岭南各地为敬宗求访有特殊才能的异人。另有润州人周息元,自称已在世数百年,

敬宗遂派宦官前往迎接,并把他安排在皇宫中的山亭居住。

敬宗游乐毫无节制,与身边的小人亲密无间,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嬉戏游玩。他擅长踢球,喜爱摔跤,于是禁军和诸道藩镇争相进献大力士,供他玩乐。敬宗又出钱一万缗给内园栽接使,命令他们为自己招募大力士。这些大力士陪同敬宗摔跤游玩,昼夜不离他的身边。敬宗令左右神策军、教坊使、内园栽接使的军士和官吏踢球、摔跤、玩杂戏。敬宗还喜欢深夜外出捕捉狐狸,叫做“打夜狐”。他的性情极为暴躁,动辄没收大力士们的财产,还不时地将他们流放;宦官稍有过失,就会遭到棍棒的毒打,众人对敬宗既痛恨又害怕。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辛丑(初八),敬宗在夜里外出打猎,很晚才回到宫中。余兴未尽,又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踢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取乐。敬宗酒兴正浓时,入室更衣。这时,大殿里的火烛忽然被吹灭,一片漆黑。在场的人却不惊慌,苏佐明带领几个人闯入室中。敬宗毫无准备,只听室内一声狂叫,敬宗惨死于苏佐明等人之手。年仅十八岁的敬宗即位二年多就结束了他的性命。显然这是一场在宦官的策划下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

刘克明、苏佐明等人杀害敬宗以后,假传敬宗的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入宫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路隋心里明知其中有诈,但慑于宦官的威势,不敢追问事情的原委,只好遵命起草敬宗遗制。田务澄、苏佐明等人又连夜迎接绛王李悟入宫。绛王李悟是宪宗的第六子,他见中使来迎,好似喜从天降,也不问究竟,便随宦官冒冒失失地趋入宫中。

第二节 文宗登基

第二天(壬寅,初九)黎明,宰相率领百官入朝,忽闻敬宗暴崩,满朝文武官员都大吃一惊。只见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先对文武百官宣布敬宗遗制,继而拥出绛王李悟在紫宸殿外廊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众人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只有宰相裴度怡然说道:“我们这些人只知道遵奉皇上的旨意,既然皇上猝然驾崩,留有遗言,我们就应该遵行才是。”刘克明说:“裴公已是三朝元老,朝中一切重大决策,全依靠你了!”裴度敷衍说:“我已是老朽不中用的人了,朝廷大事只凭你们裁定便是了!”同平章事窦易直也随声附和。

刘克明等人打算撤换内侍省掌权的宦官,消息传出,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人紧急商议对策。为了取得朝中大臣的支持,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前往裴度家中与他商议对策。裴度退朝以后,心里十分痛恨杀害敬宗的乱臣贼子,但在慌乱之中,手中没有兵权,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正巧梁守谦来访,裴度连忙迎入,对梁守谦说:“我正要请你,你看今天朝廷发生的事变是怎么回事?”守谦说:“这群弑君的逆臣,可恨可杀!”裴度问:“我们这些人在外廷,你们在宫中,他们这群人究竟是不是弑君的逆臣,应当查明才是。”守谦说:“何必多查!我听说逆贼刘克明等人将要驱逐我们,所以我来见司空大人,就是要与你共同平定国难。”裴度立即说:“中尉手握重兵,一呼百应,何不速入讨贼!稍微犹豫不定就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了。”守谦说:“即使真的消灭了逆贼,绛王李悟也不应继立。”裴度

说：“这个自然，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守谦问：“是否可以立皇子李普？”裴度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皇子年幼，不如立江王李涵。”梁守谦离开裴宅，便与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右神策军中尉魏从简商议决定，派禁军前往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同时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讨伐杀害敬宗的贼党。贼首刘克明跳入井中躲藏，被禁军搜出斩首，绛王李悟也被乱兵所杀，其余逆贼全部被擒斩首。

这时，由于诛讨贼党决定得非常仓促，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王守澄认为翰林学士韦处厚博古通今，所以，当天晚上的所有决定，都是和他共同商议。王守澄等人打算对朝廷内外发号施令，却疑虑用什么名义来措辞。韦处厚说：“《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讨伐贼党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国家的名分，这对于忠君的大义有什么嫌疑呢？在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紧急关头，怎么能够犹豫不决、模棱两可而躲避嫌疑呢！”王守澄又问：“江王应当采取什么方式登基？”韦处厚回答说：“明天百官上朝时，首先应当以江王的名义发布公告，声称已经平定宫廷内部的叛乱，然后百官再三上表劝江王登基，最后由太皇太后下令，正式册立江王即皇帝位。”

当时，王守澄等人都同意韦处厚的建议，也无暇再去问有关部门是否合适，凡江王登基的种种仪式和法规，都出于韦处厚之手，完全符合过去的典章制度。

癸卯（初十），百官在紫宸殿外廊拜见江王。江王身着素服，哭泣流泪，向文武百官宣布已经平定了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的叛乱，而且任命司空平章事裴度暂兼冢宰，主持敬宗的治丧事宜。江王在公告中说：

大行皇帝听断英明，临下以法，将期治理，以靖区

宇。而奸凶构祸，矫宣遗言，不询群臣，专断神器。寡人义重君臣，毒甚手足，乃亲率左右护军中尉、心腹近臣及诸职事官等，并左右神策军六军使、兼诸军使及将士，并飞龙将士等，搜钁伏愿，大擒诸贼。或血刃当辜，或赴井而毙。其头首刘克明、田务澄、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并正刑书，罔有漏逸。此者宗社威灵，文武协力，岂伊菲薄，敢贪天功！凡百多士，中外藩岳，致滋刷愤，哀庆当同。大行皇帝正枢于太极殿前，率依光陵故事，有司条上，务尽诚敬。其冢宰、司空平章事裴度当摄，立功将士，节级各有优赏。布告遐迩，咸使闻知。^①

甲辰（十一日），江王在少阳院接见禁军诸军使。僧惟贞、齐贤、正简，道士赵归真等术士以及敬宗在世时以奸佞得宠者，都被流放到岭南或荒远的边疆地区。击球军将于登等六人令本军处置。裴度率百官三次上表劝江王即皇帝位。乙巳（十二日），江王李涵正式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改名李昂。这就是唐朝的第十四任皇帝——唐文宗。太皇太后在批准江王即皇帝位的册文中说：

维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月乙巳，太皇太后若曰：“大行皇帝睿哲英灵，对天明命，方夏底绥，夷蛮贡庭，罔有不端，太康有截，宜荷九庙之重，永享亿年之祿。岂虞奸妖窃发，矫专神器，蛊惑中外，扇诱群萌，骇动神人，衅深梟獍。咨尔江王某，聪哲孕粹，清明毓如，智算机开，玄谋电发，躬率义勇，大清凶徒，且膺当璧之符，爰掇枕戈之愤。既歼巨害，当享丰福，是用命尔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裴度，奉册即皇帝位。

^① 《唐大诏令集》第114卷，《政事·杂录》。

永惟高祖太宗之翦定隋乱，玄宗之寝渍利泽，宪宗之坚除蠹孽，艰难险阻，勛乃负荷，小心以事上帝，俭德以刑家邦，■于令闻，持久如始，敬之休哉。”^①

丙午（十三日）文宗赴西宫穿上皇帝的衣服。丁未（十四日），宰臣百僚上表请文宗正式主持朝政，三次上表以后，文宗才同意亲政。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戢、王信等被流放到岭南。戊申（十五日），文宗尊奉自己的生身母亲萧氏为皇太后，敬宗的母亲王太后为宝历太后。这时，穆宗的母亲郭太后住在兴庆宫，王太后住在义安殿，萧太后住在太极宫，当时号为三宫太后。文宗生性孝顺恭谨，侍奉三位太后如同一人，每五日一问安，每次得到四方进贡的珍贵奇异食品，首先用来祭天以及奉献宗庙，其次奉献三位太后，最后才自己享用。有关部门曾献新瓜、樱桃，文宗命献陵寝宗庙之后，让中使分送三宫、十宅。最初，有司送三宫物品，一律称“赐”。文宗说：“向三宫太后奉献食物，怎么能称为‘赐’呢？”因此，改“赐”为“奉”。即使敬宗的郭贵妃和敬宗的儿子李普，文宗也倍加优待，一视同仁。文宗的慈孝大都类此。

己酉（十六日），文宗下令将凤翔、淮南在此之前进贡的二十四名歌女全部遣返还家。庚戌（十七日），以正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柱国、赐紫金鱼袋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翰林学士路隋为承旨学士，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丙辰（二十三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为刑部尚书。丁巳（二十四日），为绛王举行葬礼，朝廷停止办公三天。《收葬绛王诏》说：

① 《唐大诏令集》第1卷，《即位册文》。

叔父绛王，为逆贼等援立，窃窥天位，无讨贼之意，遂使忠义衔冤。及王师擒妖，义旅问罪，前驱勇气，以致殄殂。朕伏以太皇太后慈仁，恩以慰解。宜令有司，量事收葬。申恩讨贼，刑礼之中，示于四方，以明朕意。^①

大和元年（827 年）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和。

^① 《唐大诏令集》第 39 卷，《诸王·收葬》。

第二章 革除奢靡，励行节俭

唐文宗自幼生长在宫中，过着优裕豪华的生活，但他生性俭朴，不喜欢华丽奢侈。封为江王后，他在王府中亲眼目睹穆宗、敬宗两朝王公贵族官僚的奢侈腐化，十分厌恶。文宗即位后，首先革除奢靡之弊，大力倡导节俭风气，成为唐朝历史上一个比较廉洁、俭朴的皇帝。

文宗即位后不久，就颁布诏令，革除敬宗朝的奢靡之弊。诏令说：

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穷，遵道以端本，推诚而达下。故圣祖之诫，以慈俭为宝；大《易》明训，垂简易之文。未有上约而下不丰，欲寡而求不给。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讎耻，摅亿兆之哀冤。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义抗请，至于再三。以图宗社之安，以答华夷之望，俯从众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复礼，修政安人，宵兴匪宁，旰食劳虑。夫俭过则酌之以礼，文胜则矫之以质。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灵，仪刑家邦，以化天下。内庭宫人非职掌者，放三千人，任从所适。长春宫斛斗诸物，依前户部收管。□县溪陂、凤翔府骆谷地还府县。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总监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属诸军，并各归本司。余七百三人，勒纳牒身，放归本管。先供教坊衣粮一百分，厢家及诸司新加衣粮

三千分,并宜停给。五坊鹰鹞并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粮小儿一百人,并停给。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度支、盐铁、户部及州府百司应供宫禁年支一物已上,并准贞元元额为定。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宝钿者,悉宜停造。东头御马坊、球场,宜却还龙武军。其殿及亭子,所司毁拆,余舍赐本军。应行从处张陈,不得用花蜡结彩华饰。今年已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城外坟墓先有开_斫以备行幸处,宜晓示百姓,任其修塞。^①

文宗即位之初的释放宫女,解放鹰犬,节省冗食,取消皇室在国家仓库之外别贮钱谷,停止在正常上贡之外的一切摊派和勒索等措施大开一代廉俭新风气。

唐文宗曾召见太子太傅赵宗儒,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尧舜之化,慈俭而已。陛下守而勿失。”^②文宗欣然听纳,身体力行。他首先从自己做起,在处理政事以外的闲暇时间,仅以读书、观史为乐,对于女色、音乐、歌舞、外出打猎从来不曾留意。文宗衣着朴素,一次在一座别殿召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时,文宗举起自己穿的衣服说:“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百官都称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只有柳公权默不作声,文宗问他是什么缘故,柳公权回答说:“陛下尊贵而为天子,富裕而有四海,应当提拔贤才,撤免庸才,听取百官的规劝,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够达到天下太平。至于穿洗过的衣服,不过是生活小节罢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御服三浣,终为一段佳话。

① 《旧唐书》第17卷上,《文宗纪上》。

② 《册府元龟》第104卷,《帝王部·访问》。

唐文宗的御膳也比较简单,从不铺张浪费。每当出现天旱、彗星等自然灾害的时候,文宗总是认为是上天警告他,于是,引咎自责,主动要求尚食使(负责皇帝饮食的官员)减少御膳,将原来一天的食物分为十天食用。十月十日庆成节是文宗的生日,天下赐宴,庶民同庆。文宗诏令不许杀猪宰牛,只许食用蔬菜水果,同时不得广置斋宴,大集僧众。并且,在庆成节诏令京兆尹暂时停止在曲江宴请文武百僚以及在延英殿为文宗祝寿等活动。

文宗即位后不久,便下令拆毁升阳殿东边的放鸭亭,又毁掉望仙门旁边的看楼十间。这两处都是敬宗在位期间修造的供玩赏的建筑物。文宗多次下令停止宫廷内外非急需的修造,多次释放宫女回家或于寺观安置,五坊鹰犬酌情减放,暂时停止教坊每天侍候皇上的乐人活动,厩马适当减少饲料,中央各机关官员的伙食标准也要适当降低。

唐文宗严格规定地方各级官员向朝廷上贡的制度。凡是供应皇帝的车马、御服以及宗庙祭祀的用品,都应当遵循俭约的原则。各地方一律禁止以新奇异样的非常之物上贡,尤其是一些高级丝织品过于华丽,不宜织造。同时诏令天下州府,在接到诏令后的一个月內,全部焚烧织造高级丝织品的机杼,违犯者以故意违犯诏令严加惩处。

西川的丝织业非常发达,每年向朝廷上贡綾、罗、锦等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从大和四年(830年)五月起,文宗下令在常贡数内减少二千五百一十匹。吴、蜀两地盛产茶叶,每年正月向朝廷上贡新茶。这些贡茶都是在冬季采集制作的,文宗不愿违背茶叶生长的自然规律,下令让吴、蜀两地以后应在立春以后贡茶。江南的桂、贺、泉三州每年向朝廷上贡蚺蛇胆四两。一次,文宗与侍讲学士许康佐谈到取蚺蛇胆,须

生剖其腹，文宗动了恻隐之心，下令每年在常贡数内减少三两，桂、贺、泉三州轮流每年上贡一两。开成元年（836年），文宗下令河东停止上贡葡萄酒，西川停止上贡春酒。

唐创立两税法以后，税额不断增加。一些藩镇节度使和地方官多以“进奉”为名，加紧搜刮人民，以少许钱物进献给皇帝，其余大部分尽入私囊。开成元年（836年）闰五月，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进“羨余钱”二万贯、杂彩八万段，文宗没有接受这些钱物，退回使贷贫下户缴纳国家租税。可是，过了两个月，卢周仁又进“羨余钱”十万贯，御史中丞归融弹劾他违反规定进奉，文宗下令将卢周仁所进奉的钱放在河阴院收贮，分文未取。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请求致仕（退休），献马五十匹、玉带五十条、银器五担，唐文宗都没有接受这些礼物。

大和五年（831年），唐文宗诏令端午节，藩镇节度使历来都向朝廷进奉钱物，其中的杂彩匹段，只允许进奉生白綾绢。

开成元年（836年）正月，唐文宗诏令各道元旦贺正（祝贺元旦）、端午、皇帝诞辰、贺冬四个节日向皇帝的进奉，从今暂停三年，其钱折充两税，减轻百姓负担。各地除药物、茶果外，不得另有进奉。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各道州府一律不得向百姓摊派勒索一物以上。二月，唐文宗又下令各道依旧节例向朝廷贡献禽鸟、猎犬等一律暂停三年。

唐文宗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励行节俭，而且严格地要求皇亲国戚和各级封建官吏，禁止生活奢侈腐化，大力倡导节俭之风。当时，承穆宗、敬宗两朝的积弊，社会风气很不好，皇亲国戚生活奢侈腐化，竞相攀比，官吏的贪污现象也很严重。唐文宗嫉恶世风的奢靡，深为此弊而忧虑。他听说汉阳

公主(李畅,顺宗的女儿)生活非常节俭,常用铁簪在墙壁上划道,记载田租的收入。一次,汉阳公主入见,文宗问她:“你穿的衣服是什么时候做的?你看当今的奢靡之风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汉阳公主回答说:“妾自贞元时离开了宫廷,至今所穿的衣服都是当时德宗皇帝赐给的,以后从来没有添置过。元和以来,宪宗皇帝多次对藩镇用兵,朝廷把库存的纤丽之物全都拿出来赏赐作战有功的将士,这样,许多高级的生活用品流散于民间,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奢靡之风。现在,如果陛下将您的所好表示给臣下,那么,谁敢不听您的话呢?”唐文宗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命中使去汉阳公主和各位公主的家中传达他的旨意:今后,各公主要按照汉阳公主所穿的衣服规格、样式制做,如果遇上皇帝接见的日子,不许浓妆艳抹,头戴华丽的装饰,不许穿过于短窄的衣服。同时,责成京兆尹严厉禁止京城王公贵族官僚的浮华奢靡之风。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唐文宗又下令左右神策军、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内官不得穿纱縠绫罗等衣服。

一次,驸马韦处仁头戴夹罗巾,文宗对他说:“我羡慕你家门第清高素雅,所以,才挑选你做驸马。像这样贵重的头巾,让那些达官贵戚去戴,你最好不要戴。”

开成四年(839年)春正月,丁卯(十四日)夜,唐文宗在咸泰殿张灯结彩,请来三宫太后,各位亲王、公主、驸马及其他亲属欢聚一堂,举行家宴,共度元宵佳节。宴会上奏起《仙韶乐》,按照家人的礼节,唐文宗为三位太后举杯祝福,气氛非常热烈、欢洽。可是,文宗忽然看到他的女儿延安公主穿的衣裙特别宽大,非常生气,立即打发她和驸马窦遒回去,听候处理。事后,文宗下诏说:“公主参见父皇,所穿衣服超过了规定,驸马窦遒对她管教不严,理应受到处罚,应当扣发他

两个月的俸钱。”

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壬戌(十八日),唐文宗颁布诏令,要求朝廷百官、王公贵族的衣服、车马、住宅等务求朴素,力戒奢华。诏令说:

俭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临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亦谕卿士,形于诏条。如闻积习流弊,余风未革。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后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盖朕教导之未敷,使兆庶昧于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欤?永念惭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①

后来,右仆射王涯根据唐文宗的诏令,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各级封建官吏的衣服、车马、住宅制度。诏令颁布后,引起王公贵族官僚的不满,拒不执行有关规定。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选择诏令中一些比较容易施行的制度进行贯彻落实,同时,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最后仍然没能施行下去。唐文宗以后又三令五申,力戒奢华,态度十分坚决。

唐文宗还在朝廷中树立正面典型人物,积极倡导节俭的风气。左拾遗夏侯孜曾穿着绿色的桂管布衣初次拜见皇上,唐文宗问他:“你的衣衫为什么这么粗糙?”夏侯孜回答说:“我的衣服是用桂管布做的,这种布很厚,可以御寒。”他日,唐文宗对宰臣说:“我观察左拾遗夏侯孜衣着朴素,一定是一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个忠正廉洁之臣。”宰相把夏侯孜平日的言行报告给文宗,说他是当今的颜回、冉有,清贫乐道。文宗听后感慨万分,也向夏侯孜学习,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穿上,文宗率先垂范,满朝文武官员争相效法夏侯孜,结果,致使这种桂管布的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唐文宗大力革除奢靡,励行节俭,至大和末年,社会风气已经有所好转,穿长裾大袂的逐渐减少了。宰相们说:“如果陛下进一步要求皇亲国戚杜绝奢靡之风,那么,就不用担心朝廷内外的臣民不服从教化。”唐文宗说:“此事很难做到家喻户晓,只不过要革除某些最严重的奢侈浮华现象,自然要以俭德教化臣民。我听说以前内库中只有两件锦袍,以金鸟装饰,非常华丽。其中一件唐玄宗到华清池时曾经穿过,另一件赐给了杨贵妃。当时如此贵重的东西,现在恐怕一般的富裕人家都有吧!国家富了,臣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但是,不能奢侈浪费。我听说当朝的左卫副使张元昌的生活就非常腐化,甚至使用金唾壶(痰盂),最近因参与李训之乱被杀了。”

第三章 励精图治，孜孜为政

唐文宗即位时，大唐王朝已经进入后期，开始走下坡路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很大破坏，皇权衰落，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生杀废立皇帝。地方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扩展到内部各地，战事频起；在统治阶级内部又出现了牛李党争，前后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唐文宗就是在这多事之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孜孜为政，还是一个比较有所作为的皇帝。

15

第一节 甲夜亲事，乙夜览书

唐文宗初封江王，在王府的时候，温顺谦恭，聪明文静，好学不倦。他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当读到太宗皇帝孜孜不倦地治理国家时，便感慨万分，从此立志以后在政治上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唐文宗即位以后，勤于政事，每次在延英殿召见宰臣，大都用两、三个小时，详细听取宰相和大臣们对军国大政的意见。按照唐朝的惯例，皇帝每逢单日都要去上朝听政，双日休息。但是，敬宗在位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文宗恢复了过去的制度，并对宰辅说：“我想和各位爱卿每天都见面，讨论国家大事。辍朝（双日皇帝不上朝或因其它原因朝廷不

办公)以及各种假日安排在双日就可以了。”文宗不仅坚持每逢单日上朝听政,而且为了向宰相和群臣访询朝廷大事,每次都很晚才退朝。凡是因对大臣去世表示哀悼等原因而辍朝,以及因酷暑炎热或雨雪天气而放假,也都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上朝。

大和初年,唐文宗经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在思政殿接见翰林学士,在麟德殿接见南北军使,与他们研究军国大事。各少数民族的使者及各道驻京城的进奏官也可以谒见文宗。

过去,朝廷虽然设置了待制官^①,但皇帝很少召见,形同虚设。大和元年(827年)五月,唐文宗召见待制官礼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独孤朗。以后,屡次召见待制官,每次一刻钟左右,向他们咨询时政。

唐文宗在处理朝政以外的闲暇时间,仅以读书观史为乐,很少接近女色、欣赏音乐、观看歌舞,也不外出打猎。每次退朝回到宫中,便展读群书,爱不释手。读史至昏君佞臣,便扼腕叹息;读史至明君善政,则赞叹不已。唐文宗曾对左右侍臣说:“若不甲夜亲事,乙夜览书,何以为人君耶?”^②可见唐文宗为政十分勤奋,每天处理朝廷大事直至深夜,并且夜读史书,以史为鉴,力图把国家治理好。

凡是朝廷军政大事,唐文宗必亲自过问;凡是选用朝廷内外官员,宰相提名以后,唐文宗必亲自考察其办事能力,然后再正式任命。开成元年(836年)正月,唐文宗召见监仓御

^① 唐高宗永徽年间,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唐代宗永泰时,勋臣罢制无职事的都待制于集贤门。以后成为定制,以文官六品以上更直待制,备皇帝顾问。

^②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甲夜指初更时分,乙夜指二更时分。后遂称夜读为乙夜观书,也称作乙览。

史,问他太仓中储存了多少粮食。监仓御史崔虞回答说:“现在,太仓中储存的粮食共有二百五十万石。”文宗又问:“没有九年的积蓄吗?”崔虞回答说:“不足。”文宗再问:“没有六年的积蓄吗?”崔虞回答说:“遇到紧急的情况,连三年的积蓄都没有!”

文宗听罢,说:“这哪像一个国家呢?每年国家的费用不少,而国家仓库的积蓄又不多,这的确值得忧虑啊!”宰相李石说:“京畿一带这几年连续遭受旱灾,没有办法增加库存的粮食。待臣来年征收两税,麦熟时让农民缴纳麦子,谷熟时让农民缴纳谷子,这样,国家的粮食储备自然会逐渐充实起来,年成好,农民也愿意缴纳。”

文宗说:“如今国家用粮食的地方,暂时以钱购买。来年折纳(农民向国家缴纳粮食,折合成钱),务必优惠农民。”宰相郑覃说:“如果不优惠农民,折纳将损害农民的利益。”

宰相李石又向文宗汇报泾阳水利的使用情况,建议当农民春种时禁止使用碾,等到秋冬用水量减少时可以任意使用。

郑覃说:“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游手好闲、从事商业的人应当尽量减少。”

唐文宗又谈到朝廷各个部门的工作拖拉迟缓,办事效率很低,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加强管理。他指着身边的御炉说:“此物原先也非常华丽,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失去了光彩。如果不加以修饰,它怎么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呢?”李石说:“各个部门都有负责人,陛下只不过是责成他们各自完成本职工作而已。”郑覃说:“改变社会风气,应当讲究实效。西晋时,阮籍、嵇康之流脱世超俗,口谈玄言,对于当时国家的政治有什么好处呢?”文宗说:“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饮酒食肉,破

坏礼教。”郑覃说：“近三十年来，朝廷百官不务实事，清谈误国。”李石说：“这是由于天下太平，人人无事，生活安逸所造成的。现在的人们只羡慕过去的王夷甫，以不能赶上他为耻辱，然而却不做实事。”文宗说：“你们这些宰相辅佐我治理天下，必须要加强法制。法者，是帝王的鞭策。骑马不拿鞭子，而指望日行千里，能行吗？”郑覃、李石道歉说：“陛下抚育怀念各地的老百姓，为国事忧虑，孜孜为政。我们这些宰相虽然愚笨，却怎敢不尽力为陛下效劳呢！”

开成二年（837年）八月，丙午（十五日），唐文宗在延英殿坐朝，召见刑部员外郎纥于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韦纾及大理正、丞等人。从此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唐文宗都召见执法官，了解执法轻重的情况。

开成三年（838年）二月，唐文宗下诏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大卿、监等官，每遇皇帝坐朝，宜令两人依次等候皇帝召见。

开成四年（839年），唐文宗对宰相说：“我在位已经十四年了，因天下平安无事，虽然还没有达到治平，但也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宰相李珣说：“邦国安危如人身，四体平和之时，长宜调养，如恃安自忽，则疾患旋生。朝廷当无事之时，思省阙失而补之，则祸乱不作矣。”^①

唐文宗即位以后，确有治理好天下之心，也采取了许多兴利除弊的措施，因此，朝廷内外都一致相互庆贺，以为天下太平大有希望了。大和年间（827～835年），唐文宗曾几次谋诛宦官，镇压割据藩镇李同捷等人的叛乱，平息朝廷内部的党争，虽然没有取得重大的政绩，但是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① 《唐会要》第52卷，《识量》。

开成 (836 ~ 840 年) 以后,由于甘露之变的失败,宦官的势力更加嚣张,文宗心情忧郁,但仍依靠李石、郑覃、杨嗣复等人,竭力维持残局。

《旧唐书·文宗纪》篇末史臣说:“唐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意思是说,唐文宗虽然孜孜为政,但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优柔寡断,往往功亏一篑。

第二节 选贤举能,澄清吏治

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是帝王为政的关键。唐文宗针对当时吏治的弊病,申明条令,纠正选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

大和三年 (829 年) 四月,中书、门下两省向唐文宗呈送了一份报告,指出当时选官的一些严重问题:近年来,有些人为了求官,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打通关节。有人每天都去宰相府,自我表白功绩;有人直接找皇帝,委婉地请求皇上赐官。这些人的道德修养很差,缺乏受爵让能的贤德,大长追名逐利的歪风。也有人因稍有能力,已被授官,担任现职以来,并无重大政绩,却要求升官。对于这些人,应当建立必要的制度约束他们。报告提出了选官的根本原则是用人唯能。考察一个人能力的大小,要循名责实,听其言,观其行,还要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反对自我表白,反对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求官。官吏的升迁必须以政绩为依据,凡是有突出政绩、勤恳务实的官吏,都予以升官;凡是政绩平平、自求升官的官吏,都予以摈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确的选官制度,激发官吏为政的积极性。唐文宗看了这篇报告后,批示照办。

唐文宗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升迁十分重视。

文武五品以上官大都是中央和地方的高中级官员，他们不经过吏部或兵部的考试，只是将名单报送中书门下两省，建立名籍，称为“具员簿”。每当官位有空缺时，中书门下便根据“具员簿”，按照每个人的任职年限和考课成绩，选择合适的人选。开成元年（836年）二月，中书门下的一份奏文说：

诸州刺史、诸府少尹、次赤令、诸州府五品以上官并常参官等，在任之例，约是三载，命代之后，遽则到京，人数既多，阙员常少，稍经时月，则诉饥寒。起今后，请据旧章，刺史及五品以上官在外应受替去任，非有征召未得到京，宜委所在州府每两月一度申中书门下，其初状仍具前任政绩，受代月日，中书门下准前置“具员”，量才除授。其家在上都，因自归止者，京兆府申奏。

可见即使是“具员”官，也须待选而重新授官。待选期间，由所在州府或京兆尹每两月向中书门下作一次申报，以便有空缺职位时依“具员簿”授官。而应入三品或尚书省四品官者，还得临时向皇帝上奏，由皇帝定夺，不得依资格改任高官。

唐文宗还批准了中书门下关于内外常参官^①迁转不限年考的上奏。奏文说：

伏望从今以后，内外常参官并不论年考，议事而迁位，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后以日月班之，第而用之。则冀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职，而以起功。唯御史台刑宪是司，责任颇重，其三院御史，望约旧敕例比量

^① 指日常赴朝参的官员。唐朝五品以上文官、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皆为常参官。

处分。

此奏规定内外常参官的迁转不限任职期限，即不论资排辈，而是根据才能、功绩升迁。职位相同的官员以才能的大小决定，才能相同的官员以声望的高低决定，职位和声望相同的官员才按资格决定。这样，可以激励五品以上的高中级官员务尽其职，避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循资升迁。

为了防止官吏选拔的伪滥，健全审批程序，唐文宗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颁布诏令：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逾滥。如闻近日诸处奏官，不经司检寻，未免奸伪。起今以后，诸司诸使诸道应奏六品以下诸色人，称旧有官及出身，请改转并请授官，可与商量者，除进士及登科，众所闻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书门下及三库，委给事中、中书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与甲库官同检勘，具有无申报。中书门下审无异同者，然后依资进拟。如诸司诸道奏论不实，以有为无者，临时各加惩罚，务使仕进稽实，永绝侥幸。^①

唐代六品以下文武官员人数较多，每年这部分官员的选授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唐代铨选（量才授官）一般从头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三月结束，这个期间称为“选限”。但在头年五月份，中央政府就必须向各州府下达本届选人的资格范围，称为“选格”。选格颁定以后，所在州府发布公告，具备资格的现任官或已经离任的待选官员均可报名应选，此为“投状”。州府将选人的资格出具证明，称为“选解”，又称“解状”。选解送达尚书省都省后，分别转至吏部或兵部。选人

^① 《唐会要》第54卷，《省号上·中书省》。

最迟在十月份集于京城,称为“冬集”。并须以京官五人作保人,其中一人必须是熟悉选人情况的,向吏部或兵部介绍选人的情况。吏、兵二部派专人对选人资格进行审查,称为“判南曹”。其审查人选资格的依据是选人的档案材料——“甲历”。这种甲历,中书、门下、吏部各有一份,称为“三库甲历”,简称“库甲”。南曹主要审查选人出身、考核成绩以及是否符合当年的选举资格等,如果有伪滥不实者,立即取消其应选资格,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以停选若干年的处罚。经南曹审查合格的人选,参加吏部或兵部的考试。唐代文官考试的内容有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辞辩证;书取其书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其中,身、言是无足轻重的,而书、判则是关键。兵部考试内容与武举的考试内容几乎一样。经过考试定出留用、黜放人的名单,向选人公布,称为“长名”、“长榜”、“长名榜”。得以留用的人,吏部或兵部根据选人的成绩、资格等级、出身、任职经历等条件登记,拟定官职。吏、兵二部将登记拟定的官职名单,以类排列,编为甲历,称为“团甲”,送呈尚书都省审查。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尚书左丞韦弘景发现吏部拟定的官职不公平,选人多超资授官,纠察其事,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资格,吏部尚书、侍郎被扣罚俸禄。都省审查集中后,便将选人拟定的官职名单报送门下省复审,称为“过官”。门下省“过官”通过后,一般便由中书省中书舍人起草任命状——告身,然后由吏部或兵部授予选人。受官者必须赴朝廷面谢皇帝的圣恩,皇帝有时还要赐予少许物品,并于朝堂坐食。

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还可以打破年资的限制,破格选授。大和七年(833年)五月,唐文宗下令:

县令、录事参军,如在任绩效明著,兼得上下考及清

白状、陟状者，许非时放选，仍优与处分。其余官见任，得上下考，与减三选。如本官两选以下者，同非时人例处分。^①

除了上述的按正常程序选官以外，唐文宗还多次下诏求贤，不受资历、出身等条件的限制，直接选拔有能力、有德行的人任官。大和元年（827 年）正月，唐文宗颁布敕书说：

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娴吏理，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常参官及方牧郡守各举所知，无人举者，亦听自举，并限来年正月到上都。^②

开成元年（836 年）正月，唐文宗再次颁布敕书说：

其有藏器待时，隐身岩穴，奇节独行，可激风俗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各以名闻。^③

唐文宗对官吏的选拔、任用非常重视，亲自过问，了解情况。尤其是对吏部选官与地方州牧的政绩更为重视。

一次，中书省提名鸿胪卿张贾为衢州刺史，文宗表示同意。张贾好赌博，当他和文宗告别赴任的时候，文宗问他：“听说你善于长行（古代一种赌博游戏）？”张贾回答说：“只是在处理政事的闲暇时间和朋友们玩玩，不妨碍政务。”文宗说：“你贪好赌博，怎么能不妨碍政务呢？”张贾赴任后立刻改掉了赌博的恶习。

大和五年（831 年）五月，将作监王堪因负责维修太庙，工作拖拖拉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没有修好，因而被扣罚俸禄，并免去将作监的职务，改任太子宾客。文宗的任命诏

① 《唐会要》第 74 卷，《论选事》。

② 《册府元龟》第 68 卷，《帝王部·求贤二》。

③ 《册府元龟》第 68 卷，《帝王部·求贤二》。

书颁布后,给事中李固言封还诏书说:“东宫官属是调理、保护太子的重要官员,不可让工作弛慢被罚俸禄的人居于太子左右。”文宗认为李固言言之有理,于是改授王堪为均王傅。

开成元年(836年)六月,宰相郑覃向唐文宗上奏尚书省一丞空缺,请求用秘书监张仲方充任此职。文宗说:“尚书省的丞、郎,是朝廷的重要人选。张仲方任京兆尹、华州刺史时,没有什么政绩。如果将这个职务授予他,对于那些有政绩的人又怎么说呢?”在此之前,唐文宗曾因浑瑊是功臣的后代,但他昧于政事,不同意他出任州刺史,尽管宰相极力为他请求。今又因为张仲方官业无闻,不同意授任他尚书省丞、郎之职。众宰相为文宗善于用人而高兴。

一次,唐文宗对宰相说:“丁居晦做御史中丞如何?”宰相因此而联想到许多大臣,叹息说:“宋申锡胜任这个职务,可惜啊!牛僧孺可以做御史大夫。”宰相郑覃说:“最近御史中丞未曾发挥作用,恐怕没有什么声望的人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文宗说:“不是这样,鸾凤与鹰隼的作用不同。丁居晦可以做御史中丞。以前,社会上流传的谚语说杜甫、李白之流为‘四绝’,我问居晦这是怎么回事,居晦说:‘这不是皇上所要知道的事情。’我曾为这件事记得居晦这个人,所以今天提拔他做御史中丞。”

唐文宗召见兵部侍郎主持选官工作的崔郾、尚书右丞主持选官工作的郑肃,问他们:“县令、录事参军如何进行授官?”对方回答说:“资序相当,考问他们的为官之道,如果合格,即可授官。”文宗又问:“按资格应当授官,而才能不够,怎么办?”崔郾回答说:“授予偏远之处不好的官职。”文宗说:“如果认为偏远之地条件差,让那些才能不够的人去那里做官,这怎么能对得起偏远地区的人民呢?那里的人民生活很

苦,应当怜悯他们,尤其须要选择良吏去治理。”又说:“朝廷希望把天下治理好,无论是远地近地,都必须选择合适的人去治理,如果用人不当,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呢?”宰相说:“陛下求治的道理讲得很深刻,而各个部门向您汇报工作太少了。从今以后让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候召见,一一处分,这样,国家何忧不理!”文宗又召见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书判户部王超、礼部侍郎高锴、鸿胪卿李逵、司农卿李珣等人,各问其部门的政事。文宗说:“朝廷的政事在于众官同心戮力,才能够办好,希望你们务必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开成二年(837年)二月,乙未(二十五日),唐文宗对宰相说:“你们向朝廷推荐官员时,不要考虑是否对自己亲近还是疏远。我听说窦易直担任宰相时,未曾任用过自己的亲戚朋友。如果自己的亲戚朋友真有才能,为了避免嫌疑,放弃而不用,也不算是真正的公正。”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才是正确的推荐官员的方法。宰相李石任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兼管度支的文书工作,他乘机贪污三千多缗钱,被逮捕入狱。李石说:“我原来认为韩益通晓财务,所以任用他,却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贪心!”文宗说:“宰相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则加以惩罚。这样,人才就容易获得。你对你所任用的人不掩饰他的过失,可以说是一心为公。以前,有的宰相对自己所任用的人,总爱掩饰他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的确是一大弊端!”

自从开成以来,神策军军将及下属官员的升迁,大多不向唐文宗上奏请求批准,而由神策军直接行文到中书省,中书省复核后便予以施行,结果,神策军军将及下属官员升迁官爵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开成三年(838年)九月,癸未(二十八日),唐文宗下令今后神策军军将及下属官员升迁官爵,

一律首先上奏，待批准后报送中书省复核，然后再予以施行。

唐文宗还十分注意对朝廷官员的考察，随时了解他们为政的情况。开成二年（837年）二月，唐文宗在紫宸殿坐朝，对宰相说：“我听说有些州府的地方官太不像话，没有一点儿政绩，你们也知道吗？”宰相李固言回答说：“我听说邓州刺史王堪，年龄太大了，身体有病，已经无力工作。隋州刺史郑襄，也没有治政的方法。”文宗问：“王堪岂不是贞元年间的御史吗？当时的三院御史，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文宗又问：“唐州刺史是赵蕃吗？”宰相都回答说：“是”。郑覃说：“王堪，我看他是旧臣，因此，推举他为刺史。郑襄最近几年做官也没有什么过错。如果说地方州刺史治理得不好，我也另有所闻，只是因情况了解得不详细，不敢随便乱说。”

宰相退出以后，唐文宗又召见起居舍人张次宗，向他询访地方州刺史的为政情况，张次宗说：“王堪确实已经衰老不堪，不能胜任州刺史的工作，应当另外派人代替他。”御史中丞狄兼_輶向文宗汇报本司的工作，文宗也向他询访邓、隋、唐三州的情况。狄兼_輶说：“王堪一贯廉洁正直，但已衰老。邓州疆土缺，馆驿多，须才能、精力很强的人做州刺史，才能胜任。又因好几个道的防秋兵都要经过邓州，馈饷繁重，供应不上就是问题。唐州刺史赵蕃，没听说有什么过失。隋州刺史郑襄，臣素不相识。”

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皇帝治理天下的重要助手。唐文宗在位期间，先后任用了十九位宰相，大都是品行端正、学识渊博、有所作为的社稷之臣。既有元老旧臣，又有后起之秀。其中的裴度、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石、郑覃、杨嗣复等都是唐朝后期比较有影响的宰相。

裴度是四朝元老重臣，“文蔚采章，量包江海。负经邦之

远略，怀许国之明诚。”^①裴度相貌虽然不超过一般人，但神采奕奕，言辞雄辩，观听者为之肃然起敬。其威望不亚于郭子仪，其谋略又过于王导、谢安。四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遇到唐朝使者，必问裴度年龄几何，状貌像谁，天子是否重用他。凡命将相，朝廷上下皆推裴度为首。身系国家安危二十余年，威名播于华夷。唐文宗对他十分器重。韦处厚“体道为徒，见义勇为。居易以行古，至和而不流。冰霜挺松柏之姿，贞白秉璚璋之德。文挥儒雅，学该儒玄。”^②大和初年为相，为文宗登基做了大量工作。路隋“敏识周通，宏才恢薄。挺然仁者之勇，蔚为君子之儒。”敬宗朝，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有人用金帛感谢他授官，他从来不接受礼物，并斥责说：“我以公事接受私财吗？”牛僧孺“穷圣贤旨奥之学，铺邦国经纬之文。蔚为名臣，秀出群萃。”^③穆宗朝，韩弘父子以家财厚贿朝廷权贵，班列之中几乎都接受了贿赂。不久，韩弘父子都死去，穆宗派宦官查点他家的财产，看到他家的帐本，上面记载着纳贿之所，唯有在牛僧孺名字的旁边用红笔写着：“某月某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退回收讫。”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两度入相，出镇浙西、西川、淮南，政绩卓著。李宗闵“岩廊正人，宗室全德。才惟不器，道实生知。”^④郑覃天资直气，岳降上才，性惟端庄，道本孤峻。文含风雅，学专儒玄。通古今理乱之源，达教化损益之要。”^⑤杨嗣复“动必居正，言惟在公。峻若孤山，清犹止水。从政稟诗书之教，承家

①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②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③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④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⑤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建礼乐之源。”^①这些宰相为唐文宗谋诛宦官、平抑藩镇割据、加强边防等做了许多工作。

唐文宗对宰相和文武百官是完全信任的。大和元年(827年)五月,文宗下诏说:

元首股肱,君像臣类,义深同体,理在坦怀。夫任则不疑,疑则不任。自魏晋以降,参用霸制,虚仪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实人心腹,庶使诸侯方岳,鼓治道化,夷貊飞走,畅泳性分。况吾台宰,又何间焉!自今以后,紫宸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②

开成四年(839年),宰相杨嗣复屡次上表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文宗不许,并且派内官弓箭库使张克己到他家中宣布诏书说:

凡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义,卿心以为知止,朕却以为近名。大臣进退,须系朕心。不可因侪列之一言,决然舍朕。于理未当,卿更思之。明日,朕开延英,即便须参假候对。卿若不至,朕亦不坐。^③

杨嗣复接到诏书,非常惊慌,第二天马上去拜见文宗谢罪,文宗安慰他说:“我没有批准你辞职,你怎么能舍弃我呢?”唐文宗信任、器重宰臣大都类此。

唐文宗对官员的任用和考察,也存在一些问题。盐铁转运使王播从淮南来京城朝拜,向唐文宗奉献银器数千件、綾绢数十万匹,企图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用。文宗任命他为左

① 《册府元龟》第74卷,《帝王部·命相四》。

② 《册府元龟》第99卷,《帝王部·推诚》。

③ 《唐会要》第53卷,《崇奖》。

仆射、同平章事，这难免有以贿赂而得任宰相之嫌。大和二年（828年），唐文宗亲自策试贤良方正科的考生，刘訥在对策中痛斥宦官专权，言辞激烈，切中时弊。主持这次制举考试的官员及众考生都十分佩服他的才华和胆识，但由于惧怕宦官的威势，唐文宗最后没敢录取，使刘訥名塞天地而身老岩穴，终不为世所用。唐文宗因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勔擅长审断疑难案件，任命他暂为职方员外郎。尚书右丞韦温说：“郎官历来是朝廷任命有名望的士大夫的职位，不应轻易地赐给有才干的官吏。”于是，文宗改授姚勔为检校礼部郎中，仍担任盐铁推官。后来，唐文宗问宰相杨嗣复对这件事的看法。杨嗣复说：“韦温的目的在于澄清官吏的出身和等级，如果官员因为出身庶族，社会地位不高，但很有才干，却不能担任那些有名望的职务，那么，天下的一些具体事务谁去为陛下处理呢？我认为这恐怕是晋朝重视门第的衰败遗风吧！”文宗一向器重韦温，最后还是没有违背他的意图。开成元年（836年）五月，唐文宗在紫宸殿坐朝，宰相李固言上奏说：“御史中丞李祿在御史台任职，虽然没有大的过失，但为人温和不争，做御史中丞不太称职。此官是监察百官、维护朝廷纲纪的重要人选，如果用人不当，则会紊乱国家的典章制度。”文宗说：“李祿做御史中丞，确实没有什么成绩，但他为人不是很敦厚正直吗？”李固言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李祿不适合做御史中丞，他为人敦厚正直，很难胜任弹劾之职，并且御史台的工作很难做，必须选择合适的官员。”为官虽无大过，但也没有什么作为，这样的官吏也应当撤换。唐文宗对官吏要求不严，有时碍于情面，对一些严重失职渎职行为惩罚不够有力。大和二年（828年），义成军节度使李听被魏博军打败，丧师过半。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

弹劾他说：“赏罚不立，无以示天下。李听按兵不动，贻误战机，干扰军令，结果，大败而逃，仅仅保住自己的生命。请把他交付法庭治罪。”但是，文宗没有追究李听的责任，只是让他改任太子少师。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贪污七千余缗钱，文宗考虑到他的父亲王智兴为朝廷曾经立过战功，因而免除死刑，流放康州。王晏平又秘密地请求魏博、镇州和幽州三位节度使上奏朝廷，为自己申冤，唐文宗无可奈何，改任王晏平为永州司户。开成元年（836年），有关部门考虑到左藏库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请求朝廷批准对库中的财物进行一次检查，同时上奏说，如果掌管库房的官员有罪，但是在朝廷大赦以前犯的，请求给予宽恕。文宗当时表示同意。检查后，果然发现掌管库房的官员谎报库中的丝织品受潮腐烂，从而贪污。文宗赦免了他的罪过。给事中狄兼_輶封还诏书说：“掌管库房的官员贪污，根据国家法律，不能赦免！”文宗对他解释说：“有关部门奏请检查的时候，我已经同意不予追究。与其让我失信，不如赦免罪人。你能尽职尽责，我十分赞赏！”

第三节 虚心纳谏，拒上尊号

唐太宗曾经问魏征说：“怎样做才算是英明的君主或者昏庸的君主呢？”魏征回答说：“国君之所以英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说：‘先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时候尧和舜的时代，广开四方的才路，招收贤德之士；

开阔视听,了解各地的不同反映,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清楚。因此像共工、鲧这样的人,也难以蒙蔽他。奸佞的口是心非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宫中,疏远朝臣,与百姓隔绝而偏听偏信赵高,等到天下大乱百姓起义时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听偏信朱异并加以重用,等到侯景叛乱攻打京城时,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隋炀帝偏听偏信虞世基,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洗劫郡县,他也不知道。所以做国君的要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这样,即使权势很大的大臣也不能阻塞下情蒙蔽君主,而老百姓的呼声必然会顺利地反映到朝廷上来。”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这番话。

唐文宗继承了他的先祖唐太宗的优良传统,虚心纳谏,广泛听取百官的意见,曾两次拒绝群臣为他上的尊号。文宗虽然懦弱、优柔寡断,但他主动招谏,虚心纳谏,确实有太宗遗风。

大和元年(827年)正月,唐文宗下诏说:

诏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无有隐讳。^①

四月,宰臣奏事完毕,文宗召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补阙、拾遗集于政事堂,宣谕圣旨:从今以后,如有公事都可以向皇帝当面论奏。

四月,丙辰(二十五日),宰臣等从延英殿退出以后,文宗再召宰相韦处厚单独谈话。当时,文宗虽勤于听政,但是往往犹豫不决,有时与宰相商议已经决定的事情,不久,又中途改变。这一天,宰相韦处厚在延英殿极力批评文宗的这种做

^① 《册府元龟》第103卷,《帝王部·招谏二》。

法,他说:

陛下不以我们德薄才浅,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最初得到陛下听纳,不久又改变主意。如果是出于陛下本意,则显出陛下言而无信。如果是因为听信别人的话而改变主意,那还要我们宰相干什么!况且,裴度已是四朝元老,竭诚尽忠,众望所归,陛下应当亲信重用他。窦易直也是忠厚之臣,效力先朝,陛下也应当委以重任。只有我德薄才浅,承蒙陛下厚爱,提拔我为宰相。既然我说的话不被陛下采纳,那么,我就应当辞去宰相职务。

文宗矍然道:“你何必这样呢?你的志向和政绩,我一向是了解的。你当宰相之后,百官的工作很有起色。即使朕有过失,你也不应当提出辞职,以显示朕不能容人。”文宗再三对他加以劝慰,不允许他辞职。韦处厚拜谢而去,刚出延英门,文宗复令中官召还,对他说:“你以后想要说的话,可以畅所欲言。”韦处厚后来上疏言事凡数百言,文宗皆听纳。韦处厚又对文宗说:“裴度勋高望重,为人正直忠诚,应当长久重用,可壮国威。”文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宰相向皇上奏事,议论朝政,人们不再有议论。

六月,唐文宗下诏说:内外卿士,有规劝朕的过失,可写成书面材料,密封后直接交给我。

大和三年(829年)十月,宰相路隋对文宗说:“宰相责任重大,不适合兼管钱、谷之类的琐碎事务。过去,杨国忠、元载、皇甫玑身为宰相,而兼管财政,但他们都是奸臣,不足以效法。”文宗认为路隋说得有理。这时,宰相裴度请求辞去兼任的度支使职务,得到文宗的批准。

大和五年(831年),太庙第四、第六两室破损漏雨,过了

一年多还没有修复。文宗大怒，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监王堪的俸禄，紧急下令暂停宫中的修建，由宦官率领工匠用宫中修建的材料修葺太庙。左补阙韦温上疏说：

我听说百官各尽其职，国家才能治理，照章办事，朝廷才能有尊严。国家设立各种制度，建立各种机构，办事根据惯例，国家有一定的费用，而重要的是奉祀宗庙。因太庙应当修葺，皇上的诏令下达已过了一个月，有关部门怠慢拖拉，不负责任，也没受到什么处罚。应当罢黜怠慢的官员，以便惩罚他不恪守职责的罪过，选择能够胜任该项工作的人，责成他完成修葺太庙的任务。这就是照章办事，百官各尽其职。这样，皇上就可以不操心，各种工作都能做好。现在，怠慢不负责任的官员不尽其责，陛下对失职的官员仅仅扣罚俸禄而已，而太庙破损漏雨却委任宦官去进行修葺。这样做，等于允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把太庙当作陛下的私产，百官都徒为虚设而已。事关宗庙，都要写在史册上，如果不符合以往的典章制度，不可冒然行事。我请求陛下重新颁布诏书，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修葺太庙，这样，国家的制度不会紊乱，各项工作都能做好。

文宗认为韦温言之成理，随即命人追回宦官，仍然责成有关部门修葺太庙。

大和六年（832年）正月，壬子（十八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各地水旱灾害严重，凡监狱中关押的罪犯，一律予以减刑。群臣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说：

德如三皇只不过称皇，功如五帝只不过称帝，徽号之来，是圣王的末事。今年三川发生水灾，江淮旱灾歉

收，恐怕不是推崇美饰陛下名声的时候。

文宗称赞韦温的规劝，辞去徽号而不受。《答中书门下上尊号》制文说：

朕以否德，纂承睿图，业业乾乾，惧不克荷。是用发天地无私之道以成化，像日月无私之照以烛幽，纂唐尧虞舜之为君，继贞观开元之致理。朕以夕惕宵兴，不遑遐逸，冀将昭复圣哲，保绥华夷。至于鸿名，犹不轻议，尚未富庶，岂可属心。卿等台铉重臣，翼宣元化，宜匡朕志，臻于缉熙。今阴雪伤和，尚资宽宥，乃有文武至德，加于朕躬。省视奏章，难从虚美，宜断来表，深谅余怀。^①
五月，唐太宗又下诏说：

朕闻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兴纳隍之咎；一夫不获，叹时予之辜。虽饥疫凶荒，国家代有，而阴阳侵沍，儆戒朕躬。自知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屡降诏书，俾副勤恤，发廩蠲赋，救患赈贫，亦可谓至矣。今长吏申奏，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于蒸人，精诚未格于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侵冤，税役多蔽，奸赃未去，农业失时，有一于兹，皆伤和气。并委内外文武常参官一一条疏，各具所见闻奏，必当亲览，无惮直言。^②

群臣考虑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号。大和七年（833年）十二月，甲子（十二日），百官又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这时，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华州出使回来，向文宗汇报说当地百姓贫困。文宗感叹地说：“关中

① 《唐大诏令集》第6卷，《帝王·尊号批答》。

② 《册府元龟》第103卷，《帝王部·招谏二》。

今年收成不错，百姓尚且贫困，何况江淮地区近年连续水灾，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怎么敢接受尊号的虚名呢？”于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带赐给薛季棱。群臣四次为文宗上尊号，文宗最后仍然没有接受。

唐文宗读《贞观政要》，想到了魏征的忠贤，于是下诏访求魏征的后人。同州刺史杨汝士推荐自己的属官、魏征的五世孙魏瓘为右拾遗。魏瓘有其先祖遗风，敢于犯颜直谏，文宗也愿意听纳。

前御史中丞李孝本因参与李训诛杀宦官的密谋，他的两个女儿被株连籍没，分给右神策军，文宗把她俩调到宫中。右拾遗魏瓘上疏说：“陛下以前不近声色，多次把宫女放出，让她们和鰥夫配婚，但近几个月来，我听说教坊使已测试挑选出了一百多个擅长乐舞的宫女，庄宅使至今还在挑选。现在，又把李孝本的两个女儿召入宫中，连同宗同姓都不加回避，以致议论纷纷，我为您感到痛惜。过去，汉光武帝在一次宴会上，多次回头观看画在屏风上的侍女像，大司空宋弘严肃地提出批评，光武帝随即下令撤去屏风。陛下怎能不记取宋弘的批评，难道甘居于光武帝之下吗？”文宗立即下令放出李孝本的两个女儿。同时提拔魏瓘为补阙。文宗说：“我挑选女子，是打算赐给诸王。至于李孝本的两个女儿，我是可怜她们年幼孤独，所以想收养在宫中。魏瓘对这件事虽然不了解，但却能直言极谏，可见他太爱护我了，无愧于他的祖先！”于是，命中书省起草制书，褒奖魏瓘。诏书说：

乃祖在贞观时，指事直言，无所避，每览国史，朕与嘉之。瓘为拾遗，屡有献纳。夫备洒扫于内，非曰声妓，恤宗女之幼，不为渔取，然疑似之间，不可户晓。瓘辞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瓘虽居位日浅，朕何爱一

官，增直臣之气，其以^①为右补阙。

在此之前，文宗对宰相说：“太宗得到魏征，可以知道为政的得失。朕现在得到魏^②，又能极谏，朕不敢奢望出现贞观之治，大概也能处于无过之地。”教坊有一个乐工，善于演奏新曲，文宗下诏授予他扬州司马的职务。朝廷百官都议论说司马的品位较高，不可以授予一个卑贱的乐工。文宗执意要授，宰相暗示谏官不要再进行劝谏，魏^③仍坚持劝谏不可，最后，这个乐工被降授润州司马。

不久，魏^④为起居舍人，文宗问：“你家还保存很多先祖的书信和遗物吗？”魏^⑤回答说：“只有先祖上朝用的笏板还保存着。”文宗让起居舍人魏^⑥把他的先祖魏征用过的笏板奉献给朝廷。宰相郑覃说：“关键在于表彰魏征对朝廷忠诚正直的精神，而不在于他的笏板。”文宗说：“我思念魏征，看到他的笏板自然就会想起他。这就像西周时人们思念召公，因而称颂他曾经休息乘凉过的甘棠树一样。”文宗又对魏^⑦说：“朕处理朝政有不当之处，你要及时指出。”魏^⑧回答说：“我以前为谏官，所以对陛下有所规谏，现在我是起居舍人，负责记载陛下的言行，因此不敢越权行事。”文宗说：“两者属官都可以议论朝廷大事，你就不要推辞了。”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下令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以前无印，谏官如果有章疏上奏，各于所在部门请印，这样，谏官的章疏人多知之。至此，特敕置印，并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衔结署。

开成元年（836年）正月一日敕书：“内外文武官及诸色

① 《新唐书》第97卷，魏征传，附魏^②传。

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有裨时政，必加升擢，待以不次。”^①

开成二年（837年）三月，壬申诏：“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吏，如有规谏，各上封事，极言得失，陈救实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辅厥辟。”^②

开成三年（838年）八月，谏议大夫、知匭使事李中敏奏：

应旧例，所有投匭进状及书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诡异难行，不令进入。臣检寻文案，不见降敕处，所由等但云贞元中奏宣，恐是一时之事。臣以为本置匭函，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通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于九重之意也。臣伏请自今以后，所有进状及封章，臣等但为状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庶使名实在兹，明置匭之本意。^③

唐文宗同意他的请求。

同月，知匭使事，谏议大夫李中敏又奏：

伏准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体设谏匭，将防漏塞，若征副本，恐不尽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须知进状人姓名住居去处，或要召问，如过旬日无处分，即任东西者。伏以旧例，诣光顺门进状，即有金吾押官责定住处，匭院投状。即本司收投使状人名，便差院子审查家第及主人，旋牒报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责状，

① 《册府元龟》第103卷，《帝王部·招谏二》。

② 《册府元龟》第103卷，《帝王部·招谏二》。

③ 《唐会要》第55卷，《省号下·匭》。

想进状人劳扰，又虑烦并，今伏请准前，准牒京兆府。^①

唐文宗批准他的奏请。

开成三年（838年），河中奏称发现一种不吃其他兽类的驺虞，是天下祥瑞的象征。于是，百官都向文宗表示祝贺。文宗对杜□说：“李训、郑注都是自称发现祥瑞，从而乘机作乱的。由此可见，所谓祥瑞的东西，并非是国家太平的象征。你从前在凤翔的时候，不向朝廷奏报发现白兔，真可谓是先知先觉。”杜□说：“过去，黄河边发现图，伏羲用它来策画八卦，洛水旁发现天书，大禹用它来制定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这些都对百姓有益，所以值得效法。至于禽兽草木一类的所谓祥瑞之物，什么时候都有。刘聪桀骜不驯，叛变朝廷，但却几次发现黄龙，石虎残虐无道，但却在各地捉获了苍麟十六个，白鹿七个，用来拉自己的车。由此可见，所谓的祥瑞之物和帝王的圣德毫无关系！玄宗曾经担任过潞州别驾，他即位以后，潞州奏报发现十九种祥瑞之物，玄宗说：‘朕在潞州的时候，只知道勤勉于本职工作，对于你们奏报的祥瑞之物，我丝毫不知道。’因此，我但愿陛下一心一意地以百姓富足安乐作为国家兴隆的象征，对于其他的所谓祥瑞之物，都不要采纳。”文宗称赞杜□的意见。过了几天，文宗对宰相说：“现在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是最大的祥瑞。至于嘉禾灵芝，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处呢？”宰相说：“孔子在《春秋》一书中之所以记载自然灾害和某些怪异的自然现象，是用以警告帝王勤政爱民，但并不记载所谓的祥瑞之物，也就是这个原因。”

不久，唐文宗按照杜□等人的意见颁布《令诸道不得奏祥瑞诏》：

^① 《唐会要》第55卷，《省号下·图》。

朕以菲德，祗膺大宝，深求理本，将致时雍，以慈惠恭俭为休征，以人和年丰为上瑞，夙夜思省，无以过之。至于嘉颖连理之祥，飞禽走兽之异，出自邦国，来献阙庭，虚推功德，非予所尚。岁晏奏陈于清庙，元正列荐于上朝，探讨古今，亦无明据。恭惟灵圣，岂候荐闻，声匪经常，允当厘正，庶溥天之下，知予务实之心。其诸道应有三等祥瑞，亦不得更有闻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腊飧太庙及献太清宫并元日受朝，奏祥瑞仪注宜停。^①

同年十一月，庚午（十六日），唐文宗问翰林学士柳公权，朝廷中近日有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郭𧇊被任命为□宁节度使，朝廷不少人对此很有疑问。”文宗说：“郭𧇊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又是太皇太后的叔父，在此之前，他做官从无过失，从左金吾大将军而转任□宁这个小地方的节度使，不知朝廷百官有何疑问。”柳公权回答说：“百官并不是议论说郭𧇊不应当担任□宁节度使。听说陛下近日把郭𧇊的两个女儿选入宫中，不知是否属实？”文宗说：“是我让她俩入宫的，是让她俩参见太皇太后。”柳公权说：“百官不知陛下的用意，都认为郭𧇊把两个女儿纳入陛下后宫，所以才被任命为节度使。”文宗低头无语，过了很久才说：“那么，该怎么平息百官的非议呢？”柳公权回答说：“只要把郭𧇊的两个女儿从兴庆宫送回她们的家里，百官的非议自然就平息了！”当天，太皇太后派宦官把郭𧇊的两个女儿送回家。

开成四年（839年）十月，乙卯（初七），唐文宗想要观看记载朝政大事的《起居注》，起居舍人魏轶认为不妥，说：“《起居注》既记载善行，也记载恶行，用来警诫帝王去恶从

^① 《唐大诏令集》第114卷，《政事·祥瑞》。

善。陛下只管努力勤政为善,而不必观看《起居注》!”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魏轶说:“这是以往史官的过错。如果陛下亲自观看本朝的《起居注》,那么,史官在记载时就会有所避讳,将来怎么能让后人相信呢!”文宗这才作罢。

第四节 加强法制,轻刑慎罚

封建国家的法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是由封建国家制定并强制实行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秩序,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特权。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唐朝法律在唐以前封建王朝法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日臻完善,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政治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上有最高的权威。皇帝的诏令是封建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不仅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而且甚至可以取消、更改或代替法律,公布于世的成文法也在皇帝的诏令之下。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臣民对皇帝的态度作为量刑定罪的首要标准。处于皇帝之下的大小贵族、官僚,封建法律也分别保护他们的不同特权。

唐文宗在位期间,注意加强法制建设,基本上不滥用个人的权力,对法律的执行是比较谨慎的,对宦官的滥杀无辜也有一定的抵制。

在法制建设方面,大和元年(827年)六月,唐文宗下诏

说：

元和、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已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闻奏。^①

唐代的成文法典，分为律、令、格、式四类。根据《唐六典》的解释，律“以正刑定罪”，是处理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其中也有涉及民事和诉讼法的法权规范），是对一切触犯封建法律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的量刑依据。令，“以设范立制”，所谓“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它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单行条例，同时又作为律的补充。格，“以禁违正邪，百官所常行之事”。还包括皇帝临时对国家机关所颁发的各种单行指示，又成为令的补充。式，“以轨物程事”，“其所常守之事”，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以及百官的权责规定。格，与式类似，近代国家机关的行政法规。

唐代以皇帝随时所下的敕令编成“格”，中唐以后常以格敕连称，并能直接变更律令的规定，同时，年代一久，敕令愈积愈多，其中重复、前后不一致、失去时效之处甚多，因此，每隔若干年政府必修订一次。

唐文宗即位以后，命尚书省郎官各删定本司有关皇帝的制敕，而由尚书省左、右丞与各部侍郎复视，报中书、门下两省审查上奏。大和七年（833年）十二月，大理寺丞谢登新编《大和格后敕》六十卷。文宗命再次删落详定为五十卷，颁下施行。开成三年（838年），刑部侍郎狄兼_稷采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文宗开成年间的制敕，删其繁者，编成《开成详定格》。开成四年（839年），中书、门下两省审定《开成详定格》

^① 《旧唐书》第17卷上，《文宗纪》上。

为十卷,经文宗批准,颁下施行。

唐文宗针对审判机关办案迟缓拖拉的弊病,多次下诏疏理禁囚,尽快结案。大和四年(830年)四月,丁丑(初四),文宗下诏说:

如闻时稼甚滋,人心望岁。近者时雨稍乏,忧怀载深,虑有留狱,致伤和气。应京城诸司见禁囚徒,宜令御史台选清强御史二人,各就司疏决处分,具轻重以闻。^①

六月,壬申(三十日),文宗再次下诏说:

如闻御史台、大理寺、京兆府及诸县囚徒,近日讯鞫,例多停滞。自今以后,宜令所司速详决处分。其诸司应推狱有稽缓稍甚、与夺或乖者,仍委尚书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纠举以闻。^②

大和七年(833年)春正月,唐文宗下诏说:

议狱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冤滞,即伤阳和。应在城诸司诸使有囚徒,限七月内处分讫奏闻。河南府八州县,敕到,准此处分。^③

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唐文宗又下诏说:

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年,推鞫未毕,盖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狱,鬱蒸在候,冤滞难堪。宜付御史台委中丞高元裕及强明御史三两人,各就本司,应见禁囚,分阅案牘,据理疏决闻奏。^④

唐文宗还强调加快大理寺复审州府刑狱的速度。大和八年(834年)五月,唐文宗下诏说:

①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②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③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④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如闻大理寺所覆诸州府刑狱，皆盘勘微细节目，不早详断，道路遐远，往返经年。非惟囚禁多时，有伤和气，兼以颀望恩泽，故涉稽留。为弊颇深，须有提举。宜令御史台切加纠察，准笔限较科推。状中有赃数异同及罪人伏款未尽者，即须移牒盘问，其他烦碎事条不关要节者，并不得更令移牒勘覆。^①

唐文宗在执法的过程中，坚持轻刑慎罚的原则。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布赦令，赦免罪犯。

大和元年（827 年），唐文宗更换年号，大赦天下。赦令规定在大和元年（827 年）正月十三日以前，大辟罪（死刑的一种）以下，罪无论轻重，已发觉或未发觉，已结案或未结案的在押囚徒，即使是一般赦令所不赦免的，都一律赦免。只有“十恶”、“五逆”及故意杀人、官吏贪污，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贬职降级的官员，适当减轻处分，将他们调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已经减轻处分的，再给予适当的减轻。应当官复原职的，五品以上由中书门下两省尽快安排，六品以下，可根据常例选用。官员因有丧事离任或因丧事没去被贬的地方，服丧期满后，也适当减轻处分。如有故吏旧友在中央政府任职，经本司说明情况，不必再等候州府申请。犯罪被流放的官吏，即使赦文不许减轻处分，迁徙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以及说终身不再任用的官吏，也可以按照上述原则处理。丢官失爵，各予以重新任用；长期关押的囚犯，一律赦免。但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因参与谋害敬宗事件而犯罪者，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大和三年（829 年），唐文宗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仪式

^① 《册府元龟》第 151 卷，《帝王部·慎罚》。

结束后,发布大赦令,大赦天下。自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前,大辟罪以下,罪无论轻重,一般赦令所不赦免的,都一律赦免。只有犯“恶逆”以上罪,以及故意杀人,掌管官物监守自盗,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贬职降级的官员,适当迁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已经迁移的,再次予以迁移;即使原来说终身不再任用的官员,也适当地加以任用;在各种罪犯中,如以前说即使遇到皇帝的恩赦也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以及有另外处理的敕命,也都可以委托中书、门下两省根据罪行的轻重,做不同的处理。常参官及诸州刺史,因任期已满或因病解职以及服丧期满未授官者,委托中书、门下两省量才任用;其有伪官出身人,近已被流放,可迁移近处;未处理者,减轻处理。没有发现的卖官买官人,都以赦书到后一个月为限,于所在地投案自首,可以免罪;如不自首,不在免罪的范围之内。

大和六年(832年),唐文宗下令,天下所有判处死刑的罪犯,除贪污犯、故意杀人犯以外,一律降为流刑,流刑以下,递减一等治罪。

大和七年(833年)八月,唐文宗为册立皇太子又发布大赦令说,自大和七年(833年)八月七日以前,天下所有判处死刑的罪犯,一律降为流刑,流刑以下,递减一等治罪。只有贪污犯、故意杀人、劫狱夺囚以及持械抢劫的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贬职降级的官员、被流放的官员,都适当减轻处分,将他们迁移到较近的地方;如因流放、贬职及其他原因犯罪而死亡的人,都准许归原籍安葬。

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病情有所好转,发布《疾愈德音》说,自大和八年(834年)二月九日以前,天下判处死刑的罪犯,降为流刑,流刑以下,递减一等治罪。只有贪污犯及各

种破坏国家财产、故意杀人、“十恶”等罪，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贬职降级被流放的官员，按照去年八月十日的敕令，予以处理。

同年（834 年）十二月，唐文宗又发布《曲赦京畿德音》，再次颁布轻刑的命令，强调尽快疏理狱囚。凡京城百司及京畿内各县现在押的囚徒，判处死刑的，降为流刑，流刑以上，递减一等治罪。如欠负国家赋税，情节轻微的，可以找保人限期缴纳，不要逮捕入狱。只有故意杀人及官吏贪污，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仍委托京兆尹及各司长官，在诏令下达后立即贯彻落实，并向皇帝报告执行情况。

开成元年（836 年）正月，唐文宗更换年号，大赦天下。敕令规定自开成元年（836 年）正月一日以前，大辟罪以下，罪无论轻重，一般赦令所不赦免的罪犯，一律赦免。贬职降级被流放的官员，可迁移到较近的地方，应当官复原职及才用足以称职的官员，由中书、门下两省处理。被流放贬职的官员，原来的敕令规定不许迁移到较近的地方以及终身不再任用的官员，都可以迁移近处。其去年因受朋党牵连、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变（甘露之变）中犯罪而被贬职流放的官员，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其身亡或被处死的官员，委托所在州府负责安葬，准许其亲人收葬服丧。

开成二年（837 年）三月，唐文宗下令，天下死罪囚降为流刑，流刑以下的罪犯全部释放。只有故意杀人、贪赃枉法、主管钱谷监守自盗，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开成三年（838 年）十一月，唐文宗下诏宣布，京城、各道在押罪犯，自十二月八日以前，死罪减为流刑，流刑以下，递减一等罪，“十恶”、“大逆”、杀人劫盗、贪赃枉法，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从上述敕令来看,唐文宗主要打击那些犯上作乱、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卖官买官、故意杀人、破坏国家财产、持械抢劫、劫狱夺囚等重大犯罪,除此之外,一律采取轻刑原则。

唐文宗对于执法也是比较谨慎的,注意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以刘克明、苏佐明为首的二十八名宦官阴谋杀死了唐敬宗,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全部处斩,宗族籍没。但唐文宗对于那些“情非奸恶,迹涉诬误”者,“一切不问”。大和三年(829年)五月,平定沧景之乱。叛乱的首领李同捷被柏耆杀死,而对参与叛乱的将士一律从宽处理,都不处死,分配到各个边州充防秋兵,并按正式编制由度支发给衣粮。李同捷的母亲、妻子等被押到京城后,文宗下令赦免,令于湖南管内空闲处安置。李同捷的弟弟李同志早已被朝廷贬官,没有参与李同捷的叛乱,特受宽宥,不受连坐之罪,允许他随其母到湖南居住。在讨伐李同捷的过程中,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暗中援助李同捷叛乱,最后,稍有悔罪的表示,唐文宗立即恢复了王庭凑的官职和爵位。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对朝廷也是三心二意,也没有受到处罚。

大和三年(829年),唐文宗认为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下令禁止铅锡钱流行,必须上缴官府,允许检举纠告,一钱赏百钱,这项法令有些过分。因此修改为:今后用铅锡钱进行交易的人,一贯以下,州府决杖二十;十贯以下,决杖六十,判处徒刑三年;过十贯以上,集众决杀。能纠告者,一贯赏钱五十文。

大和六年(832年)五月,兴平县人上官兴因喝醉酒杀了人,并且逃跑,官府把他的父亲抓起来,上官兴不得不向官府投案自首,等候判罪。京兆尹杜绾、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上

官兴投案自首,使他父亲免受囚禁之苦,他的孝心值得嘉奖,请求免他一死。唐文宗下令中书、门下两省参议,所有的官员都说,杀人者死,这是古今共同的法律,上官兴不可以免死。可是,唐文宗最后还是听从杜□等人的建议,赦免上官兴的死罪,决杖八十,发配灵州。

大和七年(833年)二月,均王的老师王堪之子王桢,在国忌日于家中私设公堂,惩罚罪人。御史台将此事报告文宗,请示如何处理,文宗下诏说:

按照法令的规定,国忌日禁止饮酒、举乐,决罚人吏是否有罪,没有明文规定。今后即使发生此类事件,也不必举奏。王桢应当释放。

开成三年(838年),刑部向唐文宗报告:大理寺申报判决和州刺史徐登加征税钱,根据他贪污的赃款数目,应处死刑。文宗特敕徐登赦免死罪,决杖四十,发配潮州。又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郎卢允中犯贪污罪,文宗大怒,将要杀之。侍御史卢弘贞说:“宇文鼎是京畿近辅的刺史,犯了贪污罪,判处死刑本来是可以的。但应当区别主犯、从犯,卢允中是首犯,宇文鼎应当连坐。”文宗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减轻宇文鼎三等治罪。

唐文宗在闲暇的时候周览国史,看到唐太宗因读《明堂针灸书》中写有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于是,在贞观四年(630年)下诏,命从今以后不得鞭答囚犯的后背。文宗读到此处大有感触。人所以有生命,主要是因为有五腑六脏,针灸如果扎错地方,尚能使人死亡或者受伤,如果鞭答人的后背,能不造成严重后果吗?何况五刑之中,笞刑为最轻,岂能以最轻的刑罚,伤害人的生命呢!文宗想到这里,大动恻隐之心,因此下诏天下州府,对那些犯有轻微罪行或寻

常公事违法的人,都应贞观四年(630年)四月十七日的诏令处分,不得笞打囚犯的后背。唐文宗重申太宗的这一禁令,有效地防止了执法人员对囚犯滥施刑罚。

唐文宗还规定判处死刑的罪犯,在执行前两天向皇帝五次复奏,皇帝没有异议,然后再执行。开成四年(839年)十月,唐文宗为太子被陷害事一时怒起,下令杖杀人教坊乐官刘楚材等四人和宫女张十等十人。事后,宰相杨嗣复等对文宗说:“伶人贱类,出入宫禁,定刑议罪,有异平人,若不痛绳,即难简肃。准宣各决痛杖,一处死事,亦相缘宣下之事,未有正敕,府司准宣处置,又不复奏,稍乖常例,有惑众情。”^①文宗诏答说:“宣下之时,不令复奏,稍乖旧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诏。”^②

唐文宗执法比较谨慎,轻刑慎罚,但由于宦官专权,文宗力不能制,致使宦官诛杀大臣,夷灭其族,滥杀无辜者不可胜数。文宗心里明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不能救止。

第五节 重农惠民,赈灾减赋

唐文宗在位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兴修了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文宗朝,水、旱、虫灾频仍,唐文宗采取了一些赈灾、减免赋税的惠民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没有发生较大的农民起义。

^①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② 《册府元龟》第151卷,《帝王部·慎罚》。

大和二年(828年)二月,李绛进呈《兆人本业记》三卷,唐文宗下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兆人本业记》是武则天编成的一部农书,当时颁行天下,以后唐朝皇帝将进呈她的农书定为制度。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僚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进奉,用以指导百姓进行农业生产。

大和四年(830年)三月,唐文宗颁布《禁弋猎敕》。当时正是春夏之交,庄稼生长正茂。可是在京畿之内及关辅近地,有些权豪之家在田野里射鸟打猎,放纵鹰犬,伤害田苗。文宗为保证农作物不受损害,特下此诏,令地方长官经常认真地察禁,有人如果违令,严加惩处。

大和七年(833年)正月,襄阳节度使裴度奏请罢临汉监牧,除其使名。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在襄阳置临汉监牧,废百姓田四百余顷,牧马三千二百余匹。裴度认为牧马数少,虚废民田,罢之为便,因此奏请,文宗表示同意。废罢监牧,还田于民,有利于农业生产。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大和元年(827年)六月,唐文宗命中使到京兆府宣令修高陵界白渠斗门,任百姓取水灌溉田地。大和二年(828年)闰三月,唐文宗让内廷拿出水车样式,令京兆府派人依样制造水车,发给沿郑白渠百姓,用以车水灌溉水田。大和七年(833年)六月,河阳修防口堰,役工四万,可以灌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五县田五千余顷。同年(833年),明州一带人民在它山地方,运用都江堰的施工经验,于河中垒石作它山堰,宽四十二丈,左右各砌三十六级石阶,上游水顺石阶下泻,分别流入大溪和鄞江之中。流入大溪的水,引到宁波的南门,汇合为日湖和月湖水库,再凿干渠和支渠,可以灌溉附近七乡的农田数十万亩。开成二

年(837年)七月,天旱不雨,根据京兆尹崔珙的请求,减少供应宫廷生活用水十分之九,赐百姓灌田。

唐文宗在位期间,水、旱、虫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朝廷对受灾的农民多次进行赈济。

大和二年(828年)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县发生水灾,山东郛、曹、濮等州也相继发生水灾。唐文宗下诏说:

朕抚有四方,子育兆庶,虔恭夕惕,罔敢自暇。庶乎天地交感,人神洽和。如闻山东降灾,淫雨泛滥。岂政理有所未明,人情有所未达邪!中宵待旦,惕然疚怀。应是诸州遭水损田苗坏庐舍处,宜委所在吏切加访恤,如不能自济者,宜发义仓赈给,普令均一,以副朕怀。^①

大和三年(829年),五月,唐文宗又下诏说:

去年以来,水损处郛、曹、濮、青、淄、德、齐等三道,宜各赐米五万石,兖海三万石,并以入运米在侧近者逐便速与搬运。仍以右司员外郎刘茂复充曹濮等道赈恤使,户部员外郎严誉兖海等道赈恤使。^②

大和四年(830年)七月,太原发生饥荒,朝廷赈济粟米三万石。许州上言:去年六月二十一日遭受水灾。唐文宗下令免除当地今年的田租,委本道官吏将受灾情况向朝廷写出书面报告。并且令宣慰使李祿与本道官吏调查实际受灾人户,每人量给米一石,其当户人多,亦不得过五石,令度支就近支送。受赈人数及粮数要分别向朝廷报告。并且免除本道应送上供钱二万。八月,汴州发生水灾,淹没居民三百余家。太原柳公绰奏报云:代、蔚三州山谷间的石头化成面,人取食之。

①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②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朝廷从内库出绫绢三十万匹，交给户部用来购买粮食。舒州上言：当州太湖、宿松、望江等县，从今年四月以后，江水泛滥，淹没百姓六百八十二户。受灾百姓都躲到高处避水，饥寒交迫。朝廷以义仓米赈贷。十月，唐文宗下诏说：

朕以寡德，临御万方，宵旰忧勤，匪敢自暇。然仁未及物，诚不动天，阴阳失和，水潦为败。顾兹灾剝，害及生灵。江淮之间，润、和两州，应水损县数，据所申奏。漂溺人户处，宜委本道观察使与本州刺史仔细检勘，全放今年秋税钱米，仍以义仓斛斗逐便。据淹损田苗、漂坏庐舍及虫螟所损，节级矜减，诣实奏闻。如闻没溺甚处，亦以义仓量事赈赐。其京兆、河南府所损县，即据顷亩，依常例检覆，分数蠲减。州县牧宰，各务抚安，必令均齐，用称朕意。^①

大和五年（831年）正月，太原发生旱灾，朝廷赈济粟米十万石。唐文宗下诏说：

河东兵戈之后，亢旱逾年，仓廩空虚，黎元困乏，若无救恤，恐至流亡，宜借便粟十万石。^②

六月，苏州、杭州、湖南发生水灾，影响收成。东川节度使奏报：玄武江水涨两丈，梓州罗城漂人庐舍。七月，剑南东川、西川都发生水灾，朝廷遣使宣抚赈济。

大和六年（832年）正月，唐文宗下诏说：

应京畿诸县，宜令以常平义仓斛斗赈恤。京城内鰥寡癯残无告不能自存者，委京兆尹量事济恤，具数以闻。言念赤子，视之如伤。天或警予，示此阴譴，抚躬夕惕，

①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②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予甚悼焉。^①

二月，苏、湖二州发生水灾，户部侍郎庾敬休上奏：二州米价极贵，百姓流亡至多，请出售二州缺官职田禄米，以救济穷人。文宗批准他的奏请，赈米二十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供给。文宗的诏令说：

浙西诸州，皆有水灾，苏湖两州，漂没尤甚。须有赈恤，以救疲人。两州共赐米二十万石，先从贫下户给，并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充。^②

五月，浙西观察使丁公著奏报：杭州八县发生灾疫。唐文宗赐米七万石赈济百姓，并下诏说：

如闻诸道水旱害人，疾疫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今长吏奏申，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于蒸人，精诚未格于天地，法令或爽，官吏为非。有一于兹，皆伤和气。并委中外臣僚，一一具所见闻奏，朕当亲览，无憚直言。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歿者，官给凶器。其余据其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疫疾未定处，官给医药。诸道既有赈赐，国费复虑不充，其供御所须及诸公用，量宜节减，以救凶荒。^③

大和七年（833年）正月，唐文宗以久旱不雨下诏说：

朕承上天之眷佑，荷列圣之丕图，宵旰忧劳，不敢暇逸，思致康甯，八年于兹。而水旱流行，疫疾作沍，兆庶艰食，札瘥相仍。盖德未动天，诚未感物，一类失所，其过在予。载怀罪己之心，深轸纳隍之叹。如闻关辅、河东，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时，农务又切，若不赈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②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③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救，惧至流亡。京兆府赈粟十万石，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物充。^①

委托本州府长吏明确划分等级，当面向百姓宣布皇帝的诏令，先从贫下户起赈济。

冬十月，扬州、江都等七县发生水灾，影响收成。

大和八年（834年）正月，扬、楚、舒、庐、寿、滁和七州奏报：去年遭受水灾，损失四万余顷农作物。九月，唐文宗下诏说：

江淮、浙西等道，仍岁水潦。遣殿中侍御史任畹驰往慰劳。以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长吏，以军州自贮官仓米减一半价出粜，各给贫弱。如无贮蓄处，即以常平义仓米出粜。^②

唐文宗又下诏说：

诸道有饥疫处，军粮积蓄之外，其属度支户部杂谷，并令减价以出粜济贫人。^③

九月，陕州、江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河南府、邓州、同州、扬州同时奏报：旱灾、虫灾伤损秋稼。淮南、两浙、黔中大雨成灾，民户流亡，京城物价暴涨。十一月，襄州发生水灾，损害庄稼。滁州奏报：清流等三县从四月至六月连雨，山洪暴发，漂溺民户一万三千八百。

大和九年（835年）三月，唐文宗下诏说：

朕以寡德居于兆民之上，虽兢兢业业，思理不怠，而政道多阙，和气仍伤。旧岁水旱，黎民艰食，为之父母，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②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③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斯心郁陶。如闻魏博六州阻饥尤甚，野无青草，道殣相望。及山东道陈许、郢、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于饥疫，屡乏种饷。其魏博宜赐粟五万石。山南东道陈许、郢、曹濮等三道各赐糙米二万石，充赈给。委度支逐便支遣。淮南、浙西两道委长吏以常平义仓粟赈赐。^①

开成元年（836年）冬十月，扬州江都七县水旱成灾，影响收成。

开成二年（837年）六月，魏、博、泽、潞、淄、青、沧、德、兖、海、河南府等州并奏蝗虫成灾，损害庄稼。郢州奏报当地蝗虫遇雨自死。七月，唐文宗遣使下诸道巡察蝗虫灾情。外州李绅奏报蝗虫入境，不食田苗。唐文宗下诏褒奖他的德政，并将此事刻石记载于相国寺。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唐文宗下诏说，去年秋天遭受蝗虫灾害的地区，以本处常平仓赈贷。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雨成灾，田稼漂尽。唐文宗下诏说：

大河而南，幅员千里，楚泽之北，连互数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溃溢，既坏庐舍，复损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灾沴，或生业荡尽，农功索然，困喂凋残，岂能自济。宜令给事中卢弘宣往陈许、郑滑、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瓘往山南东道、鄂岳、蕲黄道宣慰。^②

魏博六州蝗虫把秋苗全部吃光。十一月，唐文宗下诏说：

今年遭水、蝗虫处，并宜存抚赈给。^③

开成四年（839年）五月，天平、魏博、易定等地内蝗虫食

①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②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③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秋稼。六月，唐文宗因久旱不雨，命向上天祈祷，满脸愁色。宰相等奏说：“水旱之灾，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请陛下不必过于忧虑。”唐文宗脸色骤变，说：“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兹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①宰臣们听后大为感动，呜咽流涕，各自请求皇帝罢免自己的职务。当时，文宗和宰相们的虔诚似乎感动了上天，立即下了一场大雨。秋七月，西蜀发生水灾，影响收成。沧景、淄青也发大水。沧景节度使刘约奏请用义仓粟赈济遭受水灾的百姓。唐文宗下诏说：

本置义仓，只防水旱，先给后奏，敕有明文，刘约所奏，已为迟晚，宜速赈恤。^②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唐文宗还采取赐麦种、耕牛以及减免赋税的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

大和三年（829年）七月，齐、德州向朝廷奏报：当地百姓自用兵以来，流移十分只有二分，请求赐麦种、耕牛等。唐文宗下令赐麦三千石、牛五百头，共给绫一万匹充价值。并且委托本州刺史自己就近购买分给当地农民。十一月，唐文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大赦天下。《大和三年南郊赦》规定：

其京兆府来年夏青苗钱，宜放一半，应度支盐铁户部三司所管，诸司官吏所由人户等，节级疏理放免；天下除两税外，辄不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严加访察。^③

大和七年（833年）八月，唐文宗册立皇太子李永。甲申朔（初一），颁布诏书说：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② 《册府元龟》第106卷，《帝王部·惠民二》。

③ 《唐大诏令集》第71卷，《典礼·南郊赦》。

……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仍委京兆府约每年时价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守当夫，宜委京兆府以价值送陵司，令自雇召，并不得差配百姓。寒食杏仁、鸡子，月进土苏白麦树栽选场棘樨修桥梁木等，便于本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诸州县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除准式每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仍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御史切加访察。^①

大和八年（834年）二月，唐文宗的病情有所好转，颁布《疾愈德音》说：

为政之要，必在去烦，厚下之恩，莫先己责。应度支户部盐铁积欠钱物，或囚系多年，资产已尽；或本身沦殁，展转难征；簿书之中，虚有名数；囹圄之下，常积滞冤。言念于斯，所当矜恤。其度支户部盐铁应有悬欠，委本司具可征放数条闻奏，不得容有奸滥。在京诸司使食利钱，已纳利计数五倍以上者，本利并放。其有摊征保人纳利两倍以上者，其本利亦放免。京邑之内，本无榷酤，属贞元用兵之后，费用稍广，始定店户等第，令其纳榷。况万方所聚，私酿至多，禁令既不可施，榷利自无所入，徒立课额，殊非惠人。其长安万年两县，见征纳榷钱一万五千十贯八百文。若先欠者，并宜放免。其榷酒钱，起今日亦宜停……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

^① 《唐大诏令集》第29卷，《皇太子·册太子敕》。

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①

唐文宗的这些政策不仅使普通百姓得到某种好处,而且使城市工商业者、外国商人也得到一定的实惠。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壬申朔(初一),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上奏说,征收茶税不便于民,请求废除榷茶,唐文宗批准了他的奏请。

开成元年(836年)正月,辛丑朔(初一),唐文宗登宣政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宣布改年号为开成,大赦天下。《改元开成赦》说:

其户部度支盐铁应有诸色欠负,大和五年以前者,并放免。诸道贺正、端午、诞降、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其钱充纽放百姓,两税所在,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辄有进献。百司及诸道应宣索制造一物以上,并停三年。京畿百姓两税已下,凡一岁之内征取者,并百官职田,并全放一年。其京兆府一年所支用钱物斛斗草钱等,并勒盐铁使以开成元年直进绫绢充还。同州、河中、绛州三州旱歉,赋税不登,宜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同州赐杂谷六万,河中、绛州共赐十万石,委度支部以见贮粟麦充赐。^②

诏令颁布后过了几天,唐文宗登紫宸殿,宰相李石上奏说:“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悦,全放京兆一年租赋,又停四节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唐文宗说:“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李石说:“赦书须内留一本,陛下时看之。又十道黜

① 《唐大诏令集》第10卷,《帝王·痊愈》。

② 《唐大诏令集》第5卷,《改元》下。

陟使发日,更付与公事根本,令向外与长吏评择施行,方尽利害之要。”^①

开成二年(837年)三月,唐文宗下诏说:

诸道遭水旱处,并蠲租税。^②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唐文宗下诏说:去年秋天遭受蝗虫灾害的地区,免除过去积欠的赋税。

从以上可以看出,唐文宗在位期间,重农惠民,赈恤百姓,蠲免赋税,省用公费,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些实事。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②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第四章 同捷拒命，柏耆争功

唐代疆域辽阔，一直在边境上驻扎着重兵，这一部分军队称为镇兵，也叫边兵。统率镇兵的大将，由朝廷任命，授予旌节，称为节度使，表示拥有专断军事的权力。唐代的藩镇，也叫方镇、节镇，指的就是节度使和他率领的镇兵。

节度使本来只是军事长官，地方上另外还有行政长官。到唐玄宗时期，边境陆续增设到十个节度使，把好几个州划为一个军镇，归节度使管辖，辖区内所有地方官都成了他的属下。于是，节度使就不只掌握军权，也掌握了政治、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①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政府安排安史集团的降将在河北地区分别担任节度使。在这批降将中，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三人势力发展得最大。魏博镇，军镇设在魏州，由田承嗣开始割据，领有魏、博、贝、卫、澶、相等州。成德镇，又名镇冀、恒冀，军镇设在恒州，由李宝臣开始割据，领有恒、定、易、赵、深、冀、沧等州。卢龙镇，初名范阳，又名幽州，军镇设在幽州，由李怀仙开始割据，领有幽、蓟、营、涿、平、檀、妫、瀛、莫等州。魏博、成德、卢龙在唐史上称为“河北三镇”。

一些镇压安史之乱的“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第20卷，《唐节度使之祸》。

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当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①

节度使大多在所辖地区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把辖内的财赋完全掌握在手，不向中央上缴，从而在经济上创造了维持和发展割据的条件。在军事方面，他们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割据的工具。河北三镇和其他一些怀有野心的节度使就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的藩镇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长期战乱不息，在唐史上名为藩镇之乱。

第一节 同捷拒命，诸镇进讨

文宗即位之初，力图克服藩镇不服从朝廷命令的弊病。大和元年（827年）三月，忠武军节度使王沛去世。庚申（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太仆卿高榘为忠武军节度使。此举非同小可，因为自唐代宗大历年间以来，藩镇节度使大多出自禁军将领。禁军将领凡是资历较高者，都愿出百分之一的利息向富豪借钱，用来贿赂神策军护军中尉，请求授任节度使。贿赂的钱数巨大，动不动就是数万，所以，往往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上节度使，而不用经宰相和皇帝的批准。他们赴任以后，再加紧用重税盘剥百姓，以便偿还所借的本息，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第20卷，《唐节度使之祸》。

故当时人戏称这些节度使为“债帅”。王沛去世后，宰相裴度、韦处厚奏请文宗由高榘继任。于是，朝廷内外的官员都相互庆贺说：“从今以后，‘债帅’就少了！”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三月，横海节度使李全略死后，他的儿子副大使李同捷未经朝廷允许，擅自代理节度使，一直到文宗继位，割据沧景将近一年，而朝廷仍然不闻不问。李同捷寄希望于文宗即位后或许会宽容自己，于是，他于大和元年（827年）三月壬戌朔（初一），派遣掌书记崔从长携带他给文宗的奏章，和他的弟弟李同志、李同巽一起到京师长安，朝见文宗，表示愿意遵守朝廷的命令。

横海军辖沧、景、德、棣四州之地，以前是乌重胤任节度使，对朝廷非常恭顺。重胤后改任山南两道节度使，横海军节度使由杜叔良接任。叔良被免职后，朝廷起用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全略。不久，朝廷授命李光颜兼镇横海军，另授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李光颜兼镇不久，请求朝廷让他还镇忠武军。敬宗末年，李光颜与李全略先后死去，忠武军节度使由朝廷任命王沛、高榘先后继任，而横海军副大使李同捷不听朝命，擅自代理节度使。

大和元年（827年）五月，丙子（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任命前横海军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这时，朝廷仍然担忧河南、河北的藩镇节度使煽动李同捷抗拒朝廷任命，于是，加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丁丑（十六日），分别授予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平卢（淄青）节度使康志睦、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为检校官，以便笼络他们为朝廷出力。

李同捷宣称横海军将士强行挽留，不接受朝廷的诏书，拒绝调任兖海军节度使。乙酉（二十五日），武宁节度使王智

兴上奏,请求率本军三万人,自备五个月的粮草,出兵讨伐李同捷,得到文宗的批准。平卢节度使康志睦,也表示愿意先驱往讨,奏章连续入京。

八月,庚子(十一日),唐文宗下诏撤消李同捷的所有官职和爵位,决心讨伐李同捷。《讨李同捷诏》说:

王者之御天下也,推其至诚,格以大顺;臣子之奉君父也,效以奔走,竭其忠贞。故能上下交感,家邦用宁。其有专上周旋,干纪悖戾,怠弃彝典,矫诬当时,固人神之所不容,古今之未能救者也。朕以菲德,祇荷鸿业,将跻俗于至厚之域,致人于无过之地,永用劳虑,惻然于怀。李同捷幸席旧勋,不思缵绪,斩焉未几,私行墨□,毒杀忠良,扰惑部校,稽之国宪,难逭常刑。朕以顷在前朝,已稽中旨,实遵成命,未议改图,庶乎舞阶以服有苗,因垒而降崇国。使臣旁早,优诏指明。而又越留务之权,授之戎帅,拔负海之地,置之中华。推恩念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怀迷执,闭境练兵,大垢邻封,拒捍中使,遐迩愤怒,中外惊嗟。叛命既彰,大义当绝,事非获己,良用怆然。其李同捷在身官爵,并削夺。朕以沧景之地,凶魁窃据,今若怒兹小丑,遽至大刑,虑金革一挥,玉石同碎,吊人之义,深置未安。宜令四面节度使,各蓄兵锋,共固疆守,绝其窥伺之路,抚其离叛之人。严戈矛之备,以待其穷;据山川之要,以张我武。如叛徒惊扰,潜有侵軼,当随机御遇,以自保完,勿使凌犯,为虞堤防或弛。其沧景将士,如有能奋扬忠义,执戮渠魁者,先是六品以下官者,便授三品正官员;其先是五品以上官者,节级超奖,仍赐庄田各一区,钱二万贯文,并列加宠任。如能率所管兵马以州郡来降者,超三资与官,便授岳牧,

赐钱一万贯；以一身降者，亦与改转，仍赐钱帛。其同捷如能知义悔过，束身归朝，并与洗雪，仍加宠奖。若不能悛悟，自取诛夷，罪止一身，其余胁污，一切不问。呜呼！佳兵者，圣祖之所诫；文德者，前哲之所崇。肆余寡昧，敢忘丕训！然以齐庶方者号令，立人纪者君臣。斯制苟逾，大伦安设！是用绝其奔轶，戒以申严，伫无战于文告，庶有瘳于迷复。特此来远，谅非初心，布告内外，咸使知悉。^①

同时，唐文宗命令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和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各率本镇兵马讨伐李同捷。

李同捷派他的儿子和侄儿用珍贵的玩赏物品、歌舞妓女贿赂河北各藩镇，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戊午（二十九日），幽州节度使李载义逮捕了李同捷的侄儿，连同所贿赂的物品一并呈献朝廷。

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与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是儿女亲家。李同捷叛乱后，史宪诚暗中运送粮食，援助李同捷。宰相裴度不知道史宪诚已与李同捷相互勾结，认为他对朝廷绝对忠贞。而宰相韦处厚却非常怀疑史宪诚的所作所为。这时，史宪诚派遣他的亲信部属到中书门下省向宰相请示工作，韦处厚对他说：“裴晋公在皇上面前，用他全家百余口的性命为你的上司作保，保证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史宪诚对朝廷到底是否忠心，要看他以后的实际行动。如果你的上司暗中援助同捷，自有国法，怎么能轻饶他呢？如果真是那样，恐怕让裴晋公为难，回去告诉你的上司，

^① 《唐大诏令集》第120卷，《政事·讨伐下》。

辜负朝廷不行，辜负裴晋公更是不行！”史宪诚得知后，心中十分恐惧，不敢再与李同捷秘密来往。

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上奏朝廷，请求授予李同捷节度使的符书，而未得到文宗的批准。于是，他开始大力援助李同捷叛乱，屯兵边境，以阻挠魏博讨伐李同捷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用厚重礼物，贿赂沙陀部落酋长朱邪执宜，想和沙陀连兵叛乱，但遭到朱邪执宜的严词拒绝。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自唐太宗时起入修朝贡，世世代代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唐廷发生内乱，北庭都护府与唐朝中央政府失去联系。沙陀酋长尽忠降附吐蕃，不久，回鹘攻取吐蕃凉州，吐蕃怀疑尽忠为回鹘的向导，命其徙居河外。尽忠畏惧，因与其子执宜率三万人，仍来归唐。途中被吐蕃兵追袭，尽忠力战身死，执宜率残众至灵州，叩关请降。节度使范希朝据实奏闻，诏令在盐州设置阴山府，令执宜为府兵马使，率众安顿下来，至此，执宜拒绝王庭凑连兵之请，遣归来使，退还所贿赂财物。王庭凑也无计可施。

十月，天平兼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军进攻李同捷，屡战屡胜。十一月丙寅（初八），乌重胤病死于军中，庚辰（二十二日），唐文宗根据王智兴的推荐，调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

十二月庚戌（二十三日），唐文宗加封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同平章事的职务。

大和二年（828年）三月，己卯（二十三日），王智兴率兵攻打棣州，纵火焚烧三面城门。

闰三月，丙戌朔（初一），史宪诚向朝廷奏报，他已派遣他的儿子、魏博节度副大使史唐、都知兵马使元志绍率领二万五千人，直进德州，讨伐李同捷。当时，史宪诚本来打算援助

李同捷，但史唐一边哭泣，一边劝阻，请求遵循朝廷命令，发兵讨伐。史宪诚不得不接受，只好同意。

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暗地里援助李同捷兵器、食盐和粮草，唐文宗打算讨伐王庭凑。秋季，七月甲辰（二十日），文宗下诏，命中书门下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讨伐王庭凑的事情。宰相和百官没有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有卫尉卿殷侑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王庭凑虽然附合李同捷叛乱，但此事还不太明显，所以，朝廷应当暂且容忍他，而且应当全力以赴讨伐李同捷。”

八月十六日，唐文宗下诏宣布王庭凑的罪状，命邻近成德的各个藩镇严阵以待，等候王庭凑改过自新。《招谕王庭凑诏》说：

朕初抚天下，实在便安，故委同捷节旄，处以华壤。顾彼童孺，岂克当之？然蔑弃君亲，不容覆载，忠臣义士，咸同忿嫉。非朕生事，致于兴戎。庭凑累承朝恩，荣据四郡士众，将谓率先问罪，以图勋名，而乃影援逆寇，干犯王旅。诸道使命，系为累囚；内兵沧州，抗战四境。交支郡之管蒿，弃邻好之姻亲，无恩于家，忘义于国。而独特降中使，许其转环，词旨坚执，曾无少悛。近者又令宰臣遣书，许其效顺，王诰一去，寂尔无闻。朕以成德一军，代建勋力，聆风拭目，待之实殊，岂为庭凑一人，致使伤及百姓！今迫藩臣，恳请连章寄来，朕犹不能独断，宣示群公卿士，参详可否，以观众情。义不容诛，列状斯在。今亦酌其简便，以适事机。亦以尝在先朝，曾效忠款，宠奖逾等，骤至三公。开其自新，以全臣节，朕之恩义，也不负矣！其诸道与镇州邻接处，宜并绝其进奉，严加警备。其有突犯及随指挥，并宜依诏旨处分。诸道须

有移军出界，并不得焚毁庐舍，横加残害。归授者抚之，拒命者御之，如有忠臣义士以一州或城镇降者，并依讨沧州例处分。其上都进奏院，宜令御史台、京兆府切在守捉，禁其出入，待后敕处分。如庭湊翻然改悔，乞效忠勤，上表阵诚，须有闻奏，亦委邻界当时转与进止，不得停留。於戏！朕示以帝王至仁，以安兆庶；以黄老清静，用宁寰宇。文告屡施而不从，兵戈在郊而未戢。德不能洽，诚有未孚，致费厥词，良多愧叹！

大和二年八月^①

九月丁亥（初四），王智兴向朝廷报攻克横海军管辖的棣州。

新任横海军节度使李寰从晋州率兵东下横海。赴任，对士卒不加约束，一路上听任士卒奸淫烧杀劫掠。到达前线后，又迟迟不肯前进，却向朝廷和地方政府索取粮饷供给。庚寅（初七），朝廷改任李寰为夏绥节度使。

甲午（十一日），唐文宗下诏，削夺王庭湊的成德节度使职务及其爵位，命令诸道兵马从四面围攻讨伐。《讨王庭湊诏》说：

雷霆霜雪，上天所以成物；明刑飭法，圣人垂之易象。岂春阳不可以独化，将辅理固在乎刑威乎？则遏乱禁非，法天齐俗，谅有为而然也。李同捷罪暴寰宇，告之则悖，宠之益陵。乱君臣父子之纪纲，弃覆载生成之恩义，则绥讨之命，盖不得已焉。而王庭湊作我蕃臣，久膺宠命，致爵位于扰叛之际，齐恩泽于忠义之伦。而首扇同捷，使起墨□，党恶之心，剧于虎兕，负德之丑，逾于梟

^① 《唐大诏令集》第118卷，《政事·招谕》。

境。藩方统帅，飞疏互来，朝右公卿，呈章继奏，皆期鸣鼓问罪，奋戈启行。朕道希包荒，志在含垢，多端曲护，大开坦途。逾之使致奇功，告之将酬重位，而傲恨弥甚，凶肆不悛，形恶言于报章，资盗粮于狡寇。屡有降卒，备验奸踪。潜军入援德、棣，纵燎以焚瀛、莫、河东、易定，被毒骚然，若尚为包容，则孰分逆顺！其王庭凑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应诸道与镇州接界处，各宜逐便攻讨。其镇州将士，如有枭斩庭凑者，六品以下，便受三品正员官。先是五品以上官者，节级超奖，仍赐庄田各一区，钱二万贯。如有能率所管兵马以州来降，超三资与官，仍便正授刺史，钱一万贯。以城镇来降者，超两资与官。仍赐钱五千贯。如庭凑束身归朝，并与洗雪，若执迷安祸，罪止其身，其余胁污，一切不向。呜呼！原野陈师，虽前王之不免；干戈屡动，谅菲德之所施。咨尔辅弼之臣，暨于藩守群帅，尔尚悉乃忠力，匡予寡昧。^①

唐文宗加授王智兴司徒官衔，任命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十月，魏博军在平原击败横海叛军，接着，乘胜攻占了平原县城。

十一月癸未朔（初一），易定节度使李公济向朝廷奏报在沧州的西面击败横海叛军，攻克了李同捷设置的坚固寨，接着，又在坚固寨东面再次击败横海叛军。

当时，河南、河北诸道出兵讨伐李同捷，一直没有多大进展，他们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就向朝廷虚报斩杀及俘虏敌军的人数，邀求丰厚的赏赐。朝廷竭尽全力供给诸军粮

^① 《唐大诏令集》第120卷，《政事·讨伐下》。

饷，以致江淮地区的百姓民穷财尽，不堪负担。

傅良弼赶赴横海上任，走到陕州时死去。

乙酉（初三），唐文宗又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为横海军节度使。

十二月丁巳（初六），王智兴上奏说，他所属的兵马使李君谋率兵渡过马颖河，攻破横海军管辖的无棣县。

李同捷在各路官军的四面围攻下，不断挫败，军势日渐紧迫。王庭凑也无法救援，于是又生一计，派人去游说魏博兵马使、大将元志绍，唆使他诛杀节度使史宪诚父子，夺取魏博镇。元志绍于是背叛史宪诚，率领本部兵马二万人大杀回马枪，还军反攻魏州。

丁丑（二十六日），唐文宗派谏议大夫柏耆前往魏博安抚慰劳将士，并且命令义城、河阳两道出兵讨伐元志绍。

辛巳（三十日），史宪诚向朝廷报告：叛将元志绍已率兵马进驻永济，向朝廷告急，并请求紧急援助。唐文宗下诏，命义成节度使李听率领讨伐李同捷的沧州行营各道兵马，前往魏博征讨元志绍。

第二节 沧景平定，柏耆争功

大和三年（829年）正月，元志绍与成德兵联合劫掠贝州。

义成参加讨伐李同捷的行营兵三千人先前驻扎在齐州，后奉命调防禹城，途中溃散叛变，新任横海节度使李□出兵截击，三千士卒全部被诛杀。

李听和史唐联合率军进攻元志绍，打败了他的军队，元

志绍率五千人投奔镇州。

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奏报攻克沧州所属的长芦镇。

甲辰(二十三日),昭义节度使奏报:元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来本道请降,已安置在閤州。

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领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的叛军,接着,进攻德州。

史宪诚听说沧景(横海)叛军即将被消灭的消息,大为恐惧。他的儿子史唐劝他前往京城朝拜,归顺朝廷。丙寅(十六日),史宪诚派史唐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批准他入朝参拜,同时,请求以自己管辖的魏博六州听从朝廷的诏令。

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眼看大势已去,当然惶恐,写信给李□,表示悔罪请降。李□派部将万洪进入沧州城安抚民众,从李同捷手中接管防务,并将李同捷的请降书上奏,等候朝廷旨意。

这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前来安抚慰问行营将士,他喜好张大自己的威势,用苛刻的军法控制各将领,诸将已对他有强烈反感。等到李同捷向李□请降,李□派大将万洪代守沧州时,柏耆怀疑李同捷请降有诈,怕发生变化。于是,他亲自率领几百名骑兵赶赴沧州城,诱使李同捷入朝,并让他携带眷属,即日启程赴京。万洪对柏耆说:“这件事应转告李□。”柏耆怒斥道:“我奉天子之命来取同捷,就连你主帅李□,也不敢违抗命令,你有什么权力敢来阻拦!”万洪不肯服气,抗争道:“同捷拒命,已是三年,多亏我主帅努力破贼,才使得叛臣畏服,献地归顺朝廷。否则你虽远道而来,仅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说降一贼吗?你凭什么借天子的威信,

藐视功臣，不请示我主帅呢？”话音刚落，那柏耆已拔刀向万洪砍去，万洪猝不及防，竟被砍倒，接着又是一刀，万洪被柏耆所杀。

柏耆立即押解李同捷及其眷属出城，也不再入李□行营，急急忙忙向西进发。走到将陵，听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准备策划出奇兵劫取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他的首级送往京城。至此，历时三年之久的沧景叛乱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

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围攻李同捷，苦战了三年，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无勇无谋，竟借天子之威径入沧州城，抓获李同捷，当作他一个人的功劳，几乎把诸道节度使的功劳一笔抹煞。那诸道将帅岂肯甘心忍受！因此，诸将都很憎恨柏耆，争相上表予以抨击。你上一表，他陈一疏，都说柏耆在沧州城内抢了许多财宝，怕李同捷入京后向皇帝告发，因此将他杀死灭口。文宗不得已，为了平息众怒，下令贬柏耆为循州司户参军，将李同捷的母亲、妻子流放到湖南。

李□因柏耆返回京师，于是，整顿军队进入沧州城。这时，李□已抱病，入城后听说万洪惨遭柏耆杀害，心中愈觉悲忿，病情加剧。李□上奏朝廷请求派人来接替他的职务，并说柏耆擅杀大将万洪，有功被戮，愧对将士。唐文宗看过奏章，不禁愤慨道：“李□前平淮蔡，今平沧景，为国立功，功勋卓著。今因柏耆擅杀有功大将万洪而病情加重，假如一旦不测，岂不是柏耆杀了他吗？”于是，文宗下诏，再流放柏耆至爱州。不久，李□病死，消息传到京城，文宗又赐柏耆自尽。另外有一种说法：宦官马国亮又向文宗反映柏耆从李同捷那里取奴婢九人，文宗再命柏耆长期流放到爱州，不久，赐其自

尽。

壬寅(二十四日),暂时代理魏博节度副使史唐奏请改名为史孝章。

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令镇州行营兵马各守疆界诏》:

门下 圣人之教,先德后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所以体人经远,要终贵实,导利天下,端由一人。情虽获己,务臻其道。朕以寡昧,嗣守丕业,威不能禁暴叛、戢干戈,德不能济生灵、完物力,以至于起师戎之役,陈原野之刑,然谓有功,固已多愧。始者逆贼同捷,统戎专地,弄兵恃宠,不受文告,不服朝廷。本归清静,唯务含弘,常欲安其反侧,惠其瑕秽。曾不悔祸,是用徂征。赖天地降灵,中外协力,凶渠就戮,沧海甫安。我本兴师,事止于此。言念士众,以及里闾,并遭胁从,久陷涂炭,杀伤之外,残瘵可哀。已各有奖录,及令赈恤,仍委长吏,更加绥戢。王庭凑因缘同捷,遂此沉迷,及交锋刃,益纵豺豕。今沧德既已平殄,庭凑犹未悛惩,合乘兵威,便图攻讨。然欲更令思省,未忍重有伤残。又以行营诸军,久劳于外,悯其暴露,且议旋归。况兵有可用而不用,谓之不武,则失柄;有不宜用而用,谓之黷武,则兴乱。弛张在我,岂止一途!其镇州四面行营兵马,并宜各归本界,且自休息。使耕农不废,储峙有常,见存者苟获阜安,未来者亦将焉往。朕志已安,姑务保宁,诸道纵有能指期攻取镇州者,亦非朕意。何者?庭凑一身,负累三军百姓,皆是吾人,岂忍非辜,罹其杀害。朕为父母,义切生成,每念迫以凶威,不得保其生命,或使役夫,远念家业,或割剥资粮,或朝夕不免于饥寒,或冤滥以致

其愁痛，寢食之际，未尝暂安。其幽州、河东、易定、齐德、昭义、魏博等道，但要保境，勿相往来。若庭湊以四郡之地、三军之众，率诚归阙，翻然效顺，则不独弃其旧恶，兼亦别议新恩。以至自反，计力穷尽，而能束身请命，亦当待以不死。唯此一事，与达表章，其余并勿听信。镇州四面节将，或功勋已茂，或感愤方深，皆欲乘此，以图尽敌。然国家之本，爱人为先，纵能翦平，岂负杀伤！今但环境设备，使之不能侵轶，须以岁月，自当诛除。此所谓不战之功，不劳而定也。其应讨沧州行营将士，并已遣使，各加赐劳。其死事之后，伤痍之人，及滨河州县，兵戈所聚，水潦为败者，并有制命，悉令惠养优恤，副我意焉。然忧虑长吏未能将明，或有漏落，委中书门下准五月十三日敕，询访事实，务令周给。於戏！我理天下，但恐道化未至，不虑寇孽不平。若宗社之灵，风教所及，则四海八蛮，犹当梯山航海，慕化而来，岂山东四郡独能拒命？夫退修教而降崇，不戮人而克敌，予之所尚，今也其时。凡在中外庶僚、群帅，悉力竭忠，尚弼予理。

宣示遐迩，各体朕怀，主者施行。^①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报说，接到王庭湊的信，请求把景州交还朝廷。李程又奏报说，元志绍已经上吊自杀。

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以后，骸骨遍地，城池一空，郊野荒凉，户口流失，仍活着的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八月，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到任以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

^① 《唐大诏令集》第118卷，《政事·招谕》。

鼓励他们种田养蚕，流散在外的百姓渐渐回到家乡，社会生产力才渐渐恢复。在此之前，横海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侗任职一年以后，依靠当地租税收入，已能支付一半军需；两年以后，已可以完全自己负担，请求朝廷度支停止供给军需；三年以后，户口大大增加，仓库充盈。

王庭凑因李同捷伏罪，不免忧惧。他通过邻近的藩镇透露出愿意归顺朝廷的意图。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官职和爵位。至此，河朔一带总算勉强平定下来。

第五章 文宗亲策,刘蕡埋名

自元和末年以来,宦官日益骄横跋扈,皇帝的废立都由他们掌握,权威远在天子之上,满朝文武官员敢怒而不敢言。

大和二年(828年)三月,唐文宗下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诸士。文宗亲自主持这次制举考试,命题发问,主旨是如何端正社会风气,如何明教化,如何选拔和考察官吏,如何理财等条目。

唐文宗问:

朕闻古代圣人贤哲治理天下,元默无为,有条不紊。以清静简约陶冶民心,不干涉百姓的日常事情。建立国家的根本大业,给万民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对于百官推诚相待,君臣之礼适宜。由此天人相通,阴阳相和,社会风俗朴实,万物都能健康成长。达到如此盛德,真是不容易啊!夏、商、周三代的明主,变换各种治国的方法,结果,伪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风气越来越衰败。自汉以下,值得借鉴的治国之术恐怕很少了。朕自己感到不明于治理天下的道理,但既然已经登上宝位,不敢怠于政事,任用贤人,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不想赶上三皇五帝的业迹,只想继承并巩固列祖列宗所开创的大唐王朝。但是,我心里想的有些还不周到,做的事情还不能使人信服。朝廷内外,缺政很多。因此,百姓不明教化,人心不和。水旱灾荒连年,农桑失

时,国家的仓库没有九年的积蓄。选官用人的制度不健全,官吏三年考绩平平。京师是国家的根本,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的程度,但是,豪猾之徒经常违犯法律。太学是明教化的本源,职在宣传礼教,但学生大多惰于学业。各州郡的长官负责政令的实施,很多人用各种方法追求刺史的职务。百工在于按制度生产,但淫巧之物尚未减少。社会风气衰败侈靡,腐蚀人的灵魂。选拔官吏治理国家,听人以言,不辨主次。用法律约束臣下,则臣下没有廉耻之心。理财方面,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颁布的法令多而效果少。我想纠正这些毛病,使天下大治,因此,前诏有司广泛地延揽有识之士,启发我的愚昧,希望达到天下太平。你们这些人都识达古今,志在治平天下,来到朝廷等待考问,不要辜负我虚心求谏。你们要规谏我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过失,指出国家政策的失误,考察富国富民的急务。采取什么措施改革以前的弊病?采取什么措施使百姓得到实惠?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治理好国家,人心和睦?推其本源,逐条回答。至于管仲《轻重》之权,哪些有助于治理;严尤底定之策,哪些符合于实际;八元八凯之考课以什么为先;叔向、子产如何治理国家。总结这些历史经验,选择其合理的因素。我期待着你们的回答,我将亲自审阅你们的试卷。

当时,对策者有一百多人,所对只不过是一般的治国常务。只有刘_訇对宦官专权十分痛恨,借天子策问之机,深刻地指出宦官的专横将要危及宗庙社稷,言辞激烈,直言不讳,痛斥了宦官专权。

刘_訇,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居于梁州、汴州之间。通晓《春秋》经义,能言历代兴衰治乱之事。富于谋略,胸怀大

志,浩然有救世安民之意。进士及第。他在回答文宗的对策中首先深刻地指出,由于宦官专权,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那就是宫廷即将发生变乱,国家即将出现危机,天下即将倾覆,海内即将大乱。他说:

臣闻不应该忧虑的事情而忧虑,国家必将衰弱;应该忧虑的事情而不忧虑,国家必将危险。现在,陛下不以国家存亡之计、社稷安危之策考问我们。臣不知道陛下以为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吗?或是陛下日理万机而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为什么应该忧虑的事情而不首先忧虑呢?臣以为陛下所忧虑的事情是:宫廷即将发生变乱,国家即将出现危机,天下即将倾覆,海内即将大乱。此四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征兆。因此,我认为陛下应该首先考虑到,大唐帝业艰难而成,岂能容易而守之?以前,高祖起兵太原打天下,太宗奠定了帝王之业,玄宗继承发展帝业,至于陛下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其间有圣明之君代代相传,但也出现过一些宫廷动乱。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继承和发扬先祖的辉煌业绩的。有时,一时疏忽,则颠覆国家政权,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于体会一元之意以居正位。以前,董仲舒已经为汉武帝概括地说过,他没有说到的,臣再为陛下详细地说明。继承死去的国君,一定要书即位,以表示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皇帝驾崩一定要书驾崩的地方,以表示堂堂正正地终了一生。因此,作为一国之君,所说的话一定是正言,所走的路一定是正道,所处的位置一定是正位,所亲近的人一定是正直的人。臣又按《春秋》,阉寺弑吴子余祭,书其名,《春秋》讽刺他疏远贤士,亲昵宦官,不符合为君之道。

陛下应该思念祖宗开国之勤、《春秋》继故之戒，如果真想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行正道。如果真想杜绝有人可能篡夺皇位或弑君的野心，就应该端正自己的言行，亲近正直的人，疏远被阉割过的宦官，任用耿直忠正的大臣做宰相，主持朝政，使朝廷各个部门的官吏都能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为什么现在却放任身边的五六个宦官专制朝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不敢指责他们，天子不能制其心，祸起萧墙之内，奸生帷幄之中。我担心汉桓帝时宦官曹节、侯览专权的局面又可能在今天重演。这就是宫廷内部将要发生变乱的原因。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春秋》以为先君不能堂堂正正终了一生，则继位之君不能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因此说鲁定公无正。如今忠正贤良的大臣得不到朝廷的信用，而宦官小人却夺取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使敬宗皇帝惨遭杀害，不能堂堂正正地终了一生，而陛下又被宦官所拥立即位，也不能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况且，皇太子未立，郊祀之礼不完备，将相的职责尚未落实，名分之宜不定，这就是国家将要出现危机的原因。臣谨按《春秋》，王札子弑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而此处书者，重其尊王命。国君是天授予的，君主掌握的是权力。国君掌握的权力失去了，就不是国君；侵犯国君的权力而专之，就不是臣子。君不君，臣不臣，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臣谨按《春秋》，晋国的赵鞅以晋阳之兵叛，进入晋国的都城。书其归者，以其能驱逐国君身边的恶人，以安其君，因此，《春秋》褒奖他。现在，朝廷威信扫地，藩镇骄横跋扈，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不懂儒家人臣礼

义的武夫悍将,就可能以安定皇位为名,首先举兵发动叛乱,而不明白孔子在《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节将大臣,也可能以清君侧为旗号,举兵发动内战。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政方针就由不得陛下作主,征战讨伐都出于藩镇的好恶。这就是海内将要大乱的原因。

其次,刘洎在对策中总结了历史经验,告诫文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他说:

臣闻尧、舜为君治理天下非常成功,主要由于能任用九官、四狱、十二牧,选官得人,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百官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尧、舜左右的人都是贤人。八元八凯虽在民间,出身微贱,但一定能受到提拔重用;四凶虽在朝廷,势力强大,但一定要受到惩罚。考察国家的安危,明确取舍。至秦二世、西汉的元帝、成帝,都想把国家治理得像唐、虞那样,使自己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国君,但是终于败国身亡,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国家的安危因素,不知取舍之道,不信任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良,不远离谄佞。陛下应当认真考察唐、虞为什么兴盛,从而向他们学习;借鉴秦、汉为什么灭亡,从而接受教训。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百官没有贤士。如果纪纲未绝,典刑犹在,谁不希望身为王臣,出现太平盛世。陛下为什么忽视而不用他们呢?又有做官的没有真正的才能,陛下身边的人又不是贤人,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畏惧而不能罢黜他们呢?国家政权本来自有所归,天命本来自有名分,祖庙本来自有灵验,忠臣本来自有诚心,陛下应该认真考虑。过去秦朝的灭亡,是由于皇帝过于强暴;汉朝的灭亡,是由于皇帝软弱无能。皇帝过于强暴,秦

朝的乱臣贼子惧怕被杀，而千方百计地谋害皇上；皇帝软弱无能，则朝廷大权容易被奸臣窃取，威震皇上。先帝敬宗皇帝未能汲取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把可能发生的事情消灭于萌芽之中，从而导致自身被害。所以，陛下应当深入地总结汉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根绝朝廷大权可能旁落的根源。这样，不仅能够真正继承祖宗的宏图大业，而且，也可追随三皇五帝所开创的圣贤大德。

刘訥建议唐文宗在听政之余，经常在便殿召集当时的贤相和有威望的老臣，向他们访求制止变乱、挽救危机、稳定天下、防止海内大乱的谋略。从而下决心杜绝奸邪小人往上爬的门路，罢黜身边那些阿谀放纵的臣僚，制止当权宦官的凌辱和威胁，恢复以往宦官不得干预朝政，只能在宫中守门扫除的制度。警惕应当警惕的事情，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要想做到这些，就应当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引以为戒，同时和朝廷大臣一起制定周密的计划，并注意保守秘密，设身处地替他们的处境考虑，以免遭受当权宦官的诬陷迫害。因此，我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未能在此之前有效地治理天下，也应当在今后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已经未能在即位之初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也应当在今后堂堂正正地执掌朝政。如果这样，也就算是真正的奉行儒家经典，继承祖宗所开创的宏图大业了。

接着，刘訥在对策中为文宗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治国方略，主要是以民为本、用人、执法、军队建设、教化百姓、增加国家的积蓄、施惠于民等问题。他说：

我在前面所说的，陛下心里所想的有些还没有达到，这是由于下情阻塞而不能上通；陛下所做的事情有些还不能让人信服，这是由于陛下的恩泽阻塞而不能普

施天下。并且,百姓的涂炭之苦,陛下无法知道,这样,陛下虽然有抚育之心,但是百姓无法相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攻取它的人,意思是说梁自取灭亡。因为梁国国君思虑昏昏,闭目塞听,上出恶政,人为寇盗,都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说它是自取灭亡。臣闻国君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以国家为重,国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百姓能够生存。如果百姓不能生存,则国家的重要性就失去了。如果国家的重要性失去了,则国君就不能保持尊贵。所以,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的情况。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当让仁慈的人抚育他们,就像保姆那样,就像母亲乳哺婴儿那样,就像老师教育学生那样。因此,百姓相信圣上,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现在却不是那样。陛下亲近贵幸,让他们做官,给予他们很大的政治权力,大者统领藩镇,小者为州刺史。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因此,百姓对于圣上,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穷困,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生存,老幼疾病不得扶养。加上国家的权力,被陛下左右的宦官所掌握,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错乱。朝廷大门远在万里,而不能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吏混乱,人民贫困,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如果再有天灾凶荒,恐怕陈胜、吴广不只起于秦,赤眉、黄巾不只起于汉。因此,这是臣为陛下最担心的事情。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怎么能知道呢?陛下有抚育之心,百姓怎么能相信呢?致使陛下心里想的还不周到,所做的事情有些还不

能让百姓信服,这就很自然了。

我听说过去汉元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就大刀阔斧地革除朝廷弊政七十多件,励精图治,内心十分虔诚,由此而获得朝廷内外对他的美好赞誉。然而没过多久,朝政却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盛,百姓日益贫困,原因在于他未能选拔德才兼备的大臣予以重任,以至朝廷大权落到奸臣手中的缘故。陛下统御天下,为百姓操心,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兴高采烈,自喜死里复生。我希望陛下善始善终,以满足万方之望。如果陛下真的能够把朝廷大权交还宰相,把军权交还大将执掌,革除贪臣聚敛之政,奸吏因缘之害。亲近忠正贤良的大臣,信用正直的大臣,内宠便僻之人的谗言,一概不听。选择清廉谨慎仁惠的官吏,对于百姓,以利养育他们,以和温暖他们,以孝慈德义教导他们。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使万国欢康,兆人苏息。这样,陛下心里想的就没有什么不周到的,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让人信服的。

吏道多端,原因是选用失当,国家取人不尽其才,任人不明其要。今陛下用人,求其名而不得其实,因此,人们追求功名,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希望陛下认真地考核官吏,建立升迁的制度,这样,多端之吏就可以减少了。

想要使百姓服从教化,国君必须首先进行自我修养。臣闻以德进行自我修养,用教育的方法引导别人。国君首先进行自我修养,百姓不用劝说就会自动服从教化。所以,君子想要使政令行得通,必须以身作则,想要人们服从教化,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今陛下以身作则

而政令未必行得通,采用正确的方法而人们未必服从教化,岂不是立教的宗旨未尽其方。立教的方法,在于国君以明智统治,臣以忠诚行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纠正时弊为忠,知人则任用贤人而驱逐邪恶之人,纠正时弊则巩固国家的根本而守法。贤人不加以任用,则重赏不足以劝人为善,邪恶之人不加以驱逐,则严刑不足禁止为非作歹,国家的根本不巩固,则百姓就要流离失所,法不守,则政令不行,而想要让百姓归顺、服从教化,是办不到的。陛下能斥退奸邪之人,不把他们留在身边,推举贤良正直的人,不遗漏关系疏远的,则教化可以遍及朝廷。爱民以敦本,分职而奉法,进行自我修养,并且教育别人,开始于朝廷之内而成于朝廷之外,则教化可以行于天下。

想要使人气和顺,在于顺从物性而逐渐引导,应当使人既讲仁义又健康长寿。想要使人既讲仁义又健康长寿,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教化修则竞争息,竞争息则刑罚轻,刑罚轻则人安。既然人们富足,自然就讲仁义;既然人们安定,自然就会健康长寿。仁寿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吉祥的征兆纷至沓来,四方康宁,万物都称心如意。

救灾旱在于致精诚。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七月之中,三书不雨,是因为其人君有恤人之志。鲁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是因为其人君无悯人之心。因此,僖公致精诚,发生了旱灾,但不损害庄稼,文公无悯人之心,发生了旱灾,则成为灾害。陛下如果真能有恤人之心,则不会有成灾之变。

农业生产主要看农民的积极性。臣谨按《春秋》，作为国君，必须经常观察人之所苦。人苦于力，则很难负担国家的徭役；人苦于财，国家的赋税就减少了；人苦于食，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现在，人们既无力，又无财，也没有饭吃。愿陛下废除百事之忧，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就不会出现问题。

国家仓库的粮食储备少，原因在于吃闲饭的人还多。臣谨按《春秋》，鲁国大夫臧孙辰向齐国借粮。《春秋》记载此事是讽刺鲁国没有九年的积蓄，一年不丰收，百姓就要挨饿。臣愿陛下斥责游手好闲、懒惰的人，督促他们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生产；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费用，以赡养百姓。这样，国家仓库的粮食就不匮乏了。

豪强不法地主超越国家法律约束，是由于朝廷内外的法律不一样。臣谨按《春秋》，想要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不记载日期，而葵丘之盟特别记载日期，这是赞美齐桓公能宣明周天子的禁令，率领诸侯遵守王宫之法，因此，《春秋》详细地记载，官者，是由五帝、三王建立的，法者，是由高祖、太宗制定的。朝廷执法应当内外统一，设官任职应当名正言顺。现在朝廷的官制区分为外官、内官，设置南衙、北司分别统辖。有人在南衙犯法，就逃往北司躲避，同一罪行在南衙被判刑，在北司却枉法被释免，以致法出多门，人们不知所措。原因在于国家自从府兵制度崩溃后，兵农分离，宦官执掌军权，因而对中官、外官法律不一的缘故。臣闻古时候利用井田以制定军赋，利用农闲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按区域征集一定数量的士卒和兵车，在公卿大夫中任命将帅。因此，兵农合一，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家卫国，制止暴乱。自从唐

太宗建立国家制度以来，也设置府兵，台省军卫，既管文，又管武。平时，府兵从事农业生产；战时，放下锄头，拿起戈矛。这是恢复古代的制度。现在，朝廷的兵部不管军队，仅仅上朝时充数装装门面，禁卫六军大将不统帅兵马，仅仅靠勋爵领取俸禄而已。而由宦官担任的观军容使掌握军权，藩镇军将都依附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宦官一旦身着军装，就视文官如同仇敌；脚一踏进军门，就视农夫如同草芥。他们在朝廷用兵伐叛时毫无谋略，而耀武扬威时却诡计多端；保卫国家时胆怯无勇，而侵掠百姓时却凶狠残暴。他们在地方钳制和欺凌节度使，在朝廷凌辱宰相，败坏法纪，搅乱朝政。他们倚仗掌握军权的威势，在朝廷挟制皇上，同时，又假借皇上的诏命，对下驾驭百官和藩镇。他们有藏奸怀诈、待机而发的祸心，却没有赴汤蹈火，为国死难的节义。朝政弄到这个地步，难道是古代的圣王所倡导的用文治武功治理天下的本意吗？臣愿陛下贯通文武之道，均衡兵农的作用，正贵贱之名分，统一朝廷内外的法律，把军权交还大将执掌，把朝廷大权交还宰相掌握。近崇贞观之政，远复成周之制。自京畿以治于万国，始天子而达于诸侯。则可以制止豪猾之徒的强暴，而无超越法律不受约束的祸患。

学生不努力学习儒家经典，是由于学校之官不负责任。国家给予官吏优厚的俸禄，而不重视他们是否有才能；考察官吏先看他们的办事能力而后看他们的德行。因此，百官缺乏通经之学，诸生无修业之心。

人们用各种方法追求州刺史的职务，是由于选用州刺史不当。臣以为刺史之任，是理乱的根本所系。朝廷

的法制存在,就可以权力抑制豪猾;可以恩泽惠及孤寡;可以强力抵御奸寇;可以政令移风易俗。其将校有曾经战阵及功臣子弟,各请适当酬赏。如无治人之术者,不应当授任此官。这样,就可以杜绝人们用各种方法追求州刺史之患。

百工淫巧,在于没有建立制度。臣请以官位等级制定其享用日常生活用品、车马、衣服的规格,禁止私藏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之物。这样,就不会出现迷惑人心的奇技淫巧了。

臣闻君王的政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政令经过国君的审查然后颁布,臣下应当遵奉君王的政令,并认真贯彻落实。如果违背君王的旨意,罪在不赦。今陛下颁布的政令烦多,但效果很少,莫非是执行政令的人蒙蔽和欺骗陛下吗?

刘洎在对策中最后说:

陛下广泛地招揽群彦,希望陛下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来到朝廷,等待策问,小臣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臣闻晁错为汉景帝筹划削弱诸侯之策,并不是不知道将要招致祸患。忠臣之心,壮士之节,如果对国家有利,死无悔恨。现在,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毫无顾忌地抨击宦官后,必然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即使皇上采纳我的意见,我也难免被迫害致死。只是由于痛感国家面临危机,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岂能眼看着这些丑恶的现象,为了牟取陛下的一官半职,而不闻不问呢?从前,龙逢死而殷兴;比干死而周兴;韩非死而汉兴;陈蕃死而魏兴。如今我来到朝廷参加制举,有关部门或许不敢推荐我的文章,陛下又无法考察我的心,回去以后

必将遭到权臣的迫害而致死。我有幸与上面所说的四个人在阴间相会,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但不知道杀死我以后,杀死我的人将怎样开导陛下?至于陛下的缺点,政令教化的毛病,前日的弊病,我都说过了。如果想给百姓带来恩惠,把国家治理得像远古时代那样,和睦太平,就在于陛下如何去做而已。然而,我上面所说的,的确是因为我按照圣上的策问,敢不逐条回答。但是,我很愚笨,自己觉得还没有完全说明教化的大端、皇王的要道。我希望陛下事天地以教人尊敬,奉宗庙以教人孝顺,养活年龄大的人以教人友爱兄长,抚育百姓以教人慈爱幼小,调和元气以温暖养育,提倡大和以达于仁寿,这样,就可以逍遥无为,垂拱而化。至于念陶钧之道,在于选择宰相而任用,使他掌握朝廷大权;念保定之功,在于选择将帅而任用,让他们掌握军权;念各项工作尚未做好,在于选择百官而任用,使他们专职业之守;念百姓的愁痛,在于选择官吏而任用,使他们懂得给百姓带来实惠的方法。这样,陛下所说的话足以教诲天下的人,陛下的行为足以为天下人效法;陛下的仁义足以劝善禁非,又何必废寝忘食,劳神忧虑,然后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呢?

当时,担任考策官的右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阅读了刘_訥的对策,都赞叹不已,十分佩服他的才能和胆识。只是因为王守澄、梁守谦等宦官盘踞宫禁,手握兵权,气焰逼人,一旦让刘_訥及第,必将遭受祸患,因此,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与刘_訥同时参加这次制举考试的有二十二人中第,全部授予官职。皇帝的诏令刚一颁布,就引起一阵轩然大波,人们纷纷为刘_訥喊冤叫屈。谏官、御史想要

向文宗上奏反映，被当权的宰相所制止。道州人李□，也在这次制举考试的中选之列，得授河南府参军，而他却独愤然道：“刘訥落选，而我们却中第了，难道我们这些人能不感到脸红吗？”于是，他邀集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的考生裴休、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人联名上书，认为：

刘蕡对策的水平，自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现在，主考官考虑到刘蕡的对策毫无顾忌地抨击了陛下左右的亲信宦官，不敢把他的对策上报陛下，我担心这样一来，忠正贤良的读书人今后入仕再也没有什么指望了，朝廷的法纪至此将会荡然无存。况且，我的对策远不如刘蕡，请求朝廷把授予我的官职转授给刘蕡，作为朝廷对他的表彰。

文宗看过李□等人的联名奏疏，认为言之有理，但又怕宦官为难自己，不好批答，只得将原疏搁置在一边，不再理会。于是，刘訥一直未能在朝廷任职，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只是在藩镇担任幕僚。

刘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没有担任朝廷的任何职务，没有领得朝廷的一点儿俸禄。但是，他怀着对皇帝无限忠诚和对宦官无比愤怒的心情，直言不讳地指出宦官专权给国家带来的祸患，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面对刘訥这样的人，当时满朝的文武大臣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圣人顺应天理感化人心，搜寻天下的贤者，聚集于朝廷，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为国家所用。这样，贤人没有不得到应有的地位，贤人得到应有的地位，则百姓也会得到应有的地位；百姓得到应有的地位，则万物尽其所用。像刘訥这样正直的人，任用他在朝廷担任谏诤之职，纠正之任，让他担任高级职务，这样，刘訥的所有才能都为朝廷所用。然而，唐文宗终因受宦

官挟制而不敢任用刘_訥。罢黜直言之士,使天下之人都为刘_訥喊冤叫屈。刘_訥的声名充塞天地,然而却身老于偏远之处,终不为朝廷所用。这样,难道不违背天理、逆于人性吗?文宗虽然也有心把国家治理好,但这样做能治理好天下吗?范祖禹在《唐_程》中为刘_訥埋名一事发表了上述一番议论。

第六章 南诏入寇，德裕固边

南诏在今云南省，原分蒙舍、僂阁、施浪、浪穹、越析、蒙骞等六诏，六诏均为乌蛮部落，当地称王为诏，六诏实即六个部落。蒙舍诏处五诏之南，后并五诏，故独称南诏。唐朝初年，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就很亲密。其王继位，均受唐朝皇帝册封。唐玄宗天宝末年，由于边将的贪暴和朝廷的腐败，激起了南诏的反抗，引起对南诏的战争，促成南诏和吐蕃的联合，形成西南边疆的严重局势。但吐蕃对南诏的征敛非常苛重，引起了南诏的反抗，因此，南诏王异牟寻又再跟唐朝讲和，联唐以抗吐蕃。贞元十年（794年），唐德宗派御史中丞袁滋，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从此，南诏与唐朝又言归于好，互相间聘使往来不绝，民间的友好往来也很频繁。

89

第一节 南诏入寇，元颖被贬

南诏国王异牟寻病歿以后，传位劝龙晟，不久，便被部落酋长嵯颠所杀，嵯颠拥立龙晟的弟弟劝利为南诏国王。劝利非常感激嵯颠，赐姓蒙氏，号为大容。蛮人称兄为容，表示尊敬的意思。劝利又传位给弟弟丰□，丰□勇敢过人，怀有大志。

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丙申（二十日），剑南西川节

度使杜元颖向朝廷奏报 南诏军队侵入大唐边境。

杜元颖曾在穆宗朝当过几年宰相，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却自以为文才高雅，风度高贵。他不懂军事，却专门会贪污聚敛，因此，西南边境的边防军将士的衣服和粮食经常发生短缺，无法充分供应，边防士卒只好进入南诏国掳掠抢劫，用以自救。因此，四川的虚实动静，南诏人了如指掌。

南诏自从嵯颠执掌朝政以后，就密议计划向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入寇四川。西南沿边各州多次向杜元颖反映南诏的动向，杜元颖一概不信。嵯颠率兵临境，边塞毫无防备。南诏军队以西川的降卒为向导，长驱直入，很快就攻陷了□、戎二州。甲辰（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兵和南诏军队在邛州以南交战，西川士兵不堪一击，刚一接战，便溃不成军，南诏军队乘胜攻占邛州。

唐文宗下诏：命令剑南东川、兴元、荆南三道派兵马前往西川救援。十二月，丁未朔（初一），又征发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再往增援。

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剑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暂时兼管剑南东川节度使事。

嵯颠从邛州继续进兵，径直抵达成都城下，庚戌（初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将士退守内城抵抗，其间，他三番五次想弃城逃跑。壬子（初六），唐文宗下令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同时，征发太原、凤翔两道兵马增援西川。这时，南诏军队又侵犯东川，进入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的西城。郭钊兵少将寡，无力抵抗，只好写信给嵯颠，斥责他背盟入寇。嵯颠回信说：“杜元颖百般骚扰我国，所以

我才兴兵报复。现在,唐朝皇帝既然已经撤消了杜元颖的职务,任命你为节度使,我自当退兵修好。”于是,嵯颠和郭钊重新订立盟约,率兵退去。

南诏军队驻留成都西城十天。开始时,还对蜀人十分和善,百般安抚,因此街市店铺照常开业,社会秩序安定。可是,蛮兵将要撤退时,却大肆掠夺青年男女,以及各种行业的手工匠人,约几万人,连同所有的金银财货,然后退出成都,向南而去。西川百姓大为恐惧,很多人投江自杀,尸体塞满江面,翻滚而下。嵯颠亲自率军担任后卫,阻止唐军追击和防止俘虏逃亡。走到大渡河时,他对俘虏来的西川人说:“从这里再往南走,就进入我国境内,你们不可能再回来了。现在,我允许你们哭别祖国故乡。”大家都放声痛哭,阴风怒号,天空一片灰暗,投大渡河而死的达一千多人。由于大批手工匠人被掠入南诏,从此以后,南诏的工艺技术水平可以和巴蜀地区媲美。

嵯颠在撤退的途中派使者向唐朝皇帝上表说:

我国近年来一直恪守职责向贵国称臣纳贡,岂敢擅自侵犯贵国边境!只因为杜元颖不体恤他的士卒,让他们到我境内劫掠,我写信告诉他,他也置之不理。蜀中的士兵都对他恨之入骨,争相做我们的向导,请求我们出兵诛杀杜元颖。不料此行未能如愿以偿把他诛杀,我实在已无法安抚西川士卒的军心,履行自己的诺言,请陛下把杜元颖杀掉。

西川节度使监军小使张士谦来到京城,也向唐文宗诉说杜元颖的过错,于是,唐文宗再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判官崔璜为连州司马,纥干泉为郢州长史,卢并为唐州司马,皆以辅佐杜元颖无方而受牵连。大和六年(832年),杜元颖死在被

贬的地方。临终前，上表请求赠官，朝廷赠他为湖州刺史。

唐文宗同时下诏，命令董重质和诸道增援西川的兵马都返回本道。

新任西川节度使郭钊抵达成都后，和南诏签订双方友好条约，规定今后两国互不侵犯。于是，唐文宗派宦官携带朝廷的信件前往南诏国，递交给嵯颠。南诏与唐朝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第二节 德裕固边，蜀地粗安

西川自从遭到南诏侵掠以后，残破凋敝，川中士民离心涣散，节度使郭钊患病在身，无力收拾残局，因此，他向朝廷请求辞职，请朝廷派人来接替他。大和四年（830年）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李德裕上任后，修建筹边楼，每日登楼眺望，观察山川形势。派人绘制西川的地形图，南方包括南诏国，西方包括吐蕃国。他又每天召见那些长期在军队中供职、熟悉军事和边防情况的人，即使是挑担赶车做小生意的人，乃至蛮族人，也都一一延见，向他们仔细询问山川形势、城市位置、道路远近分布情况，以及险易、宽窄。不到一个月，他就对该地区了如指掌，熟悉得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为了防止南诏和吐蕃的侵扰，确保西川安全，他决心重整旗鼓，加强边防。李德裕首先对西川邻近南诏、吐蕃的地理形势作了周密调查，同时，还掌握了对对方部落的分布情况和运粮道路，为布防役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根据。

唐文宗命令李德裕派人堵塞清溪关，以断绝南诏入侵西川的要道，如果没有土的话，就用石头堆积。李德裕上疏说：

西川通往南诏国的小路很多，所以，不能堵塞清溪关，只能派重兵防守，才可万无一失。同时，只要从黎州、雅州招募一万人，从成都招募两万人，加强训练，这样，南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但边防戍兵也不宜太多，关键在于能够驾驭，听从指挥。过去，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张岷驱逐节度使张延赏，所依靠的都是边防戍兵。从军事上说，李德裕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朝廷最后收回成命。

这时，北方各道援救西川的兵马大都已返回本道，只有河中、陈许三千人仍留在成都，朝廷让他们在次年三月也一并撤回。于是，西川人都恐惧不安，担心各道兵马撤走后，南诏军队会再度乘虚进犯。李德裕上奏朝廷，请求留郑滑五百人、陈许一千人，继续镇守西川。他强调：

西川兵士本性懦弱，最近，又刚刚被南诏军队打败，都胆颤心惊，颇有谈虎色变之感，已经不能再胜任征战和戍防。如果北方各道救援西川的兵马全部撤走，那就和杜元颖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边防空虚一样，西川肯定难以保全。我担心朝廷议论纷纷，有人可能说，西川自从遭受南诏侵犯以后，本道已经增加兵力。事实上，前不久，直到南诏大军压境时，杜元颖才开始招兵买马，招募成都市井小民当兵，总共得三千多人，勉强凑够数目，但未经训练，实际上毫无作战能力。郭钊在任时，招募北方人当兵，仅招募了一百多人。我到任后，只招募了二百余人，此外都是杜元颖原来的兵力。我担心朝廷中有人听信蜀道险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认为只要堵

住清溪关,就可以阻挡南诏国的侵扰。我曾访问过巴蜀的一些老将,得知清溪关的附近,就有三条大路,小路不计其数,这都是东蛮为南诏国临时开通的道路。如果认为只要堵住清溪关,就能阻挡南诏国的侵扰,那是欺骗朝廷。我认为必须在大渡河的北岸,多修一个城池,用一连串的堡垒和黎州连绵相接,用重兵守卫,才能真正抵挡住南诏国的侵扰。同时,我得到情报,南诏国把他们俘虏的二千西川人和大批金银绸缎送给吐蕃王国作为贿赂,如果吐蕃和南诏知道西川内部如此虚弱,两国联合入侵,实在是令人忧虑。现在,朝廷有些人所以高谈阔论,只是因为灾祸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我希望朝廷责令他们把自己的建议写成条子,留在政事堂存档,将来一旦听从他们的建议,招致失败,不应由我一个人承担罪责。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时,蜀中兵力空虚,要真正确保蜀中的安全,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为此,李德裕首先对西川的军队进行整顿,实行精兵政策。过去,西川军队中的老弱病残士卒,从来终身不进行淘汰,现在,李德裕下令按照五尺五寸的标准,淘汰了四千四百多名年老体弱的士卒。同时,从淘汰的士兵家属中招募年轻力壮者一千人,以便安抚他们。其次,选择旧僚与州兵中能胜任征战者而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又在北方各道招募士兵一千五百人,与西川士卒掺杂在一起,互相学习,加强训练,战斗能力日益精强。另外,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过去西川工匠制造的兵器,只讲究装饰而不堪使用。现在,李德裕请来安定(今甘肃泾川县)的能工巧匠制造铠甲,聘请河中(今山西永济县)的工匠制造弓箭,招浙西(今江苏

镇江县)的巧手制弩,由此,所造兵器无不坚韧锋利,剑南的边防军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了。李德裕还组织广大民众,进行训练。“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 骑兵曰飞星、鹞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一军。”^①

为加强边塞的防御能力,李德裕决定筑城设防。在南部边界筑杖义城,以防南诏从南方经清溪关过大渡河入侵蜀地 在与南诏、吐蕃交界处筑御侮城,南防南诏,西御吐蕃 在西部筑柔远城,以震制吐蕃的进袭 又修复邛崃关,以占据险要之地。总之李德裕在要道、关隘、咽喉地段都设置了城防和关隘,占据非常有利的地势,守卫十分严紧,南诏和吐蕃很难进越。

蜀中为丘陵地带,道路险阻,运输不便。往边区运送军粮也是一个棘手问题,特别是往接近南诏地区运送军粮,酷暑炎热,更是困难。“旧制,岁杪运内粟赡黎(今四川汉源县南)、□州(今四川越□县),起嘉眉道(今四川乐山县至眉山县)、阳山江(系大渡河下游支流、约当今四川汉源县南),而达大渡(今四川汉源县西北),乃分饷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犍夫多死。”^②川民所急需者,就是改善运输路线。李德裕入川后,深知民间疾苦,经过详细的勘查研究,除改善嘉眉道的运输条件外,并决定另辟运输路线,“命转邛(今四川邛崃县)、雅(今四川雅安县)、粟,以十月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阳山之运,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③李德裕此举

①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②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③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是以新邛雅道与旧嘉眉道结合,双轨并运,则蜀道艰难之虞,自可大为减少。并且改变了运粮时间,以十月为漕运的开始时间,避开酷暑,使劳役者免受其苦。另外,十月又是秋收以后,正可利用农闲时间,而不妨碍农时。

杜元颖任剑南节度使时,贪污无能,专事盘剥百姓,士民怨恨。继任的郭钊又是抚理无术,民不聊生。派遣这样的节帅,则川民自然对朝廷不满。李德裕上任后,深知当年蛮军侵掠时,给西川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父子相别的苦难。为了收回民心,必须解除人民的这种痛苦。大和五年(831年)五月,丙辰(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 本道派遣使者到南诏国,索要其掠夺的西川百姓,总计有四千多人返回家乡。此为杜元颖之所失,而为李德裕之所复。仅此一举,足以振奋西川民心士气,树立朝廷的威信,提高李德裕的声望。

李德裕治川期间,还会革除西川民间的一些陋习:“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①“毁属于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②如此等于鼓励农民,增加生产。蜀先主祠旁有獠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③由此可见,李德裕为政,相当严肃,蜀地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李德裕治蜀不到三年,成绩斐然。他整顿军队,训练士卒,修补城堡边障,积储军粮,使剑南西川的军事实力空前加强,西川人民初步安定下来。边防巩固,南诏和吐蕃不但不敢进犯,反而畏惧起来。

①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②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③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第七章 谋诛宦官，申锡蒙冤

宋申锡字庆臣。少时家境孤贫，有文学之才。进士及第后，多次被节度使府聘用。穆宗长庆初年，任监察御史。长庆二年（822 年），提升为起居舍人。敬宗宝历二年（826 年），改任礼部员外郎，不久，任翰林侍讲学士。在长庆、宝历之际，社会风气败坏，朋党大兴，宋申锡在朝廷为官，清慎廉洁，不参与党争。

文宗即位后，宋申锡任户部郎中，知制造。大和二年（828 年），正式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唐文宗忧虑宦官的权势过于强盛，自宪宗元和至敬宗宝历年间屡次发生宫禁之祸。这时，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的凶手仍有的在文宗左右侍从。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跋扈，招权纳贿，文宗无法驾驭。但是，唐文宗不甘心受制于家奴，总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大臣，与之商议诛除宦官的大计。宋申锡当时在内廷，文宗观察他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委以大任。一次，文宗秘密地召见宋申锡，对他谈及宦官专权的问题，宋申锡认为应当逐渐翦除宦官的势力。文宗认为宋申锡性情深沉宽厚，忠正谨慎，可以信任依靠，于是，令他与外廷大臣密谋诛除宦官，并答应任命他为宰相，宋申锡顿首向唐文宗表示感谢。

大和四年（830 年），唐文宗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十一日），任命宋申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宋申锡推荐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并把文宗打算诛除宦官的意图透露给他。王□竟然将文宗的意图泄露给郑注，郑注转告王守澄。王守澄得此密报，急忙与郑注商议对策。郑注想出一计，先发制人，令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李湊。漳王李湊是文宗的弟弟，德才兼备，很有声望。

大和五年（831年）二月，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李湊的信交给文宗。信中说，十六宅宫市典晏敬则，朱训与宋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朱训对王师文说：“圣上多病，太子年幼，若立兄弟。依次应是漳王。”为了事先结托，王师文送给朱训白银五铤，绢八百匹。晏敬则从十六宅宫拿出漳王的吴绫汗衫一件，熟线绦一匹，以报答宋申锡。这完全是由郑注策划、编造，由豆卢著出面诬告宋申锡的不实之词。但是，唐文宗却信以为真，大为恼怒，当时命令王守澄立即查讯此事。王守澄随即要派二百个骑兵去靖恭里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存亮，虽然也是宦官，倒有些天良，他一再劝阻王守澄说：“宰相宋申锡罪状还不明显，马上就加以杀戮，岂不要引起众怒！这样，京城肯定要大乱，如何应付？最好还是召集其他几位宰相一起商议这件事。”王守澄无言以对，这才作罢。

这一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体宰相到中书省东门。宰相到齐后，宦官说：“皇上召集宰相的名单上没有宋申锡。”宋申锡这才明白自己被人诬告得罪，于是，眼望延英殿，手执笏板叩头后回到家中。宰相李宗闵、牛僧孺、路隋等进入延英殿后，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折让宰相看。宰相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很久才说：“此事非同小可，请陛下确实查明，方可给宋申锡定罪。”

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卢著所诬告的管理十六宅官员晏敬则、朱训及宋申锡的亲信侍从王师文等人，押到宫中由宦官审讯。王师文得知消息后逃跑。

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锡被革除宰相职务，担任太子右庶子，文宗在诏令中说：

君臣之道，义切初终 股肱之良，任存正直。苟涉邪径，自紊宪章，既亏恪慎之心，难委辅弼之任。正议大夫，行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宋申锡，学习儒门，职参翰苑，备我顾问，洽兹宠光。谓其后沃竭忠，擢登鼎铉，而乃践修不慎，自抵愆尤，知臣之规，俾予增愧。欲遏奸回之路，宜先惩劝之源，岂可犹秉枢机、仍可考辖？罢居台席，列位龙楼，诚谓宽恩，用全至体。朕以事状之间，虑其冤滥，鞠验之际，须务详明，尚伫得情，以申后命。可行太子右庶子，散官勋封如故。^①

从宰相到文武百官，几乎没有人敢上书为宋申锡申辩，只有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书，请求将宫中审讯的结果交付御史台复核。于是，宦官对此案的审理才稍微放缓。晏敬则等人承认豆卢著所诬告的全是事实，并声称确是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李凑转达他的意向，将要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这是晏敬则等人被抓到神策军监狱后，经过多次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

审讯结束后，壬寅（初四），唐文宗召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大理寺的官员当面询问审讯的情况。快到中午时，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

^① 《唐大诏令集》第56卷，《宰相·罢免》下。

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再次请求在延英殿面见文宗，乞请将此案交付御史台复审。唐文宗说：“此事我已经和朝廷大臣们商议过了，不要再多言！”

于是，多次让这些谏官退出，崔玄亮等人坚决不退。崔玄亮一边给皇上磕头，一边哭泣着说：“孟子说过，众人都说可杀，尚不可以杀；卿大夫都说可杀，尚不可以杀；天下所有的人都说可杀，然后还要再进行调查，才可以依法惩处。现在是至圣的朝代，杀掉一个普通的百姓，还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何况无辜杀掉一个宰相呢！臣为陛下珍惜天下之法，的确不是为宋申锡辩护。”文宗的怒气逐渐缓解，说：“我再和宰相们商量商量。”

唐文宗再次召集宰相来延英殿。宰相牛僧孺说：

“作臣下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宰相，现在，宋申锡已经官至宰相。假如他真地想拥立漳王而谋反，那么，他又能得到什么呢？我认为宋申锡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

牛僧孺不谈宋申锡一案的具体事实，而以人之情理、行为动机委婉地劝说文宗，使文宗有所醒悟，并且使王守澄、郑注等诬告者闻之丧胆。郑注担心此案交付外廷复审会揭穿他们的阴谋，于是，劝王守澄见好就收，奏请文宗尽快结案，只将主要案犯贬黜，以免引起大乱子。

癸卯（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漳王凑降封巢县公制》说：

王者教先立爱，义不遗亲，岂于同气之中，可致异词之间。如或慎休不至，注误有闻，构成厉阶，犯我邦纪，未加殛窜，尚屈彝章。漳王凑，手足之亲，磐石是固，崇居宠秩、列在戚藩。顷多克顺之心，亦有尚贤之志。而

满盈生患，败覆是图，奸凶会同，谋议滋及。污我皇化，彰于中外，初骇余衷，载惊群听。尚以未具狱词，犹资审慎，建候之命，姑务从宽。於戏！朕嗣守宗祧，敷弘至教，自家之训未立，掩义之私敢忘。是用降封，有丑朝典，凡百多士，宜谅朕怀。可降封巢县开国公。^①

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宋申锡开州司马制》说：

敕 正议大夫、新授太子右庶子、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宋申锡，顷由艺文，擢处近密，谓能洁己，可以佐时，遂越常贤，超开大任。自参枢务，骤易寒暄，嘉谋蔑闻，丑迹斯露。致兹狱诉，实骇朝听，俾穷根本，亦具对词。犹以左验之间，有所漏网，正刑之际，姑示宽恩。於戏！朕自君临，推诚宰辅，常务仁恕，以保和平。岂意鱼水之期，翻贻胡越之虑，抚事兴叹，中宵耿然。是用重难，亲临鞠问，谋及耆德，偏于名卿。庶其尽忠，颇为审克，屈兹彝宪，俾佐遐藩。凡百具僚，宜知朕意。^②

晏敬则等近百人因宋申锡一案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或被流放。飞龙厩使马存亮明知宋申锡被冤枉，而自己又无法为他申辩，同时憎恨王守澄等人的专横跋扈，于是，他当天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唐文宗不甘心受制于家奴，遂与心腹之臣宋申锡谋诛宦官，主观动机是积极的。但是，自唐玄宗以来，宦官在朝廷中的势力逐渐膨胀，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手握重兵，口衔天宪，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可以生杀废立皇帝。由于唐朝中后期宦官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

① 《唐大诏令集》第39卷，《诸王·降黜》。

② 《唐大诏令集》第57卷，《宰相·休致》。

足够的实力作后盾，轻言翦除宦官，冒然采取行动，犹如以卵击石，没有不失败的。唐文宗只以宋申锡正直、忠厚，很少与朝官交往，便骤然提拔他为宰相，交付他诛除宦官的非常大任。殊不知宋申锡的分析判断能力很一般，只是一个平庸之辈，绝非可图大事之才。而宋申锡又不会用人，误以王□为心腹，提拔他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并把文宗谋诛宦官的意图透露给他。王□在穆宗朝是李逢吉的党羽，此次官拜京兆尹是由于宰相宋申锡的提拔，以后，他又倾心于李训、郑注，甘露之变被宦官所杀。王□完全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反覆无常的小人。当他得知唐文宗与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的消息后，立即向郑注告密，致使王守澄、郑注事先有所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诬告宋申锡与漳王李湊谋反。结果，唐文宗与宋申锡谋除宦官的计划尚未付诸施行，就遭到失败。唐文宗用人不当，宋申锡知人不明，王守澄、郑注指使豆卢著恶人先告状，导致这场谋诛宦官的计划流产。宋申锡一介儒生，仅凭唐文宗的密旨，手无一兵一卒，冒然就欲诛除宦官，必败无疑。王□知其必败而见风转舵，实属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足为奇。遗憾的是唐文宗既然想要诛除宦官，而又轻信宦官的诬告，实在是太愚昧无知了，可悲可叹！如果不是由于马存亮、崔玄亮等人犯颜谏诤和宰相牛僧孺的婉言相劝，漳王李湊和宰相宋申锡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当初，宋申锡虽然被诬告得罪，但他问心无愧，神态自若不以为意，从中书省回到家中，止于外厅，穿上素服，等候皇上的处置。他的妻子走出来对他说：“公为宰相，人臣位极于此，为什么还要辜负天子而谋反呢？”申锡说：“我从一个书生，得到皇帝的恩典，被提拔为宰相，不能锄去奸人乱党，反而被人罗织罪名陷害，夫人，你看我难道是谋反的人吗？”说

完以后，夫妻抱头痛哭。

宋申锡自从到内廷任职，直到做宰相，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尤以公正廉洁为己任，四方贿赂之物，一无所受。得罪后，被有关部门审查，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贿赂之状，朝廷内外的人都为之叹息。

大和七年（833 年）七月，宋申锡病死于开州。文宗下诏说：

申锡虽不能周慎，自抵宪章，闻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恻。宜许其归葬乡里，以示宽恩。^①

大和八年（834 年），夏季，唐文宗因为久旱不雨，下诏征求祈雨的方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认为：

“现在连年大旱，并非陛下的品德不高尚，而是由于前宰相宋申锡被贬的案件太冤枉，郑注的行为奸邪不轨。因此，现在求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处死郑注为宋申锡平反昭雪。”

李中敏的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李中敏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辞职回到东都洛阳。

大和九年（835 年）正月，巢县公李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齐王。

开成元年（836 年）九月，丁丑（十一日），宰相李石上言文宗，认为前宰相宋申锡忠厚正直，被奸臣诬陷，贬逐死于荒远的边地，至今未蒙平反昭雪。文宗听后低头无语，沉默了很久，心里非常难过，泪流满面，说：

“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宋申锡受到冤枉。当时奸臣逼迫我，我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连自己的亲兄弟李湊几乎都保护不了，何况宋申锡呢！最后，也就仅仅保全他的性命而

^① 《旧唐书》第 167 卷，《宋申锡传》。

已。当时，不仅宦官诬陷宋申锡，外廷百官也有人帮助宦官。这个冤案都是由于朕不贤明所造成的，假如宋申锡遇到汉昭帝，肯定不会如此冤枉而死！”

郑覃、李固言也一同称宋申锡冤枉，文宗感到十分痛心，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庚辰（十四日），唐文宗下诏恢复宋申锡所有的官职和爵位，任命他的儿子为成固县尉。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丁卯（初八），唐文宗可怜漳王李凑被诬陷，至死未得以平反昭雪，追赠已故齐王李凑为怀懿太子。《齐王赠怀懿太子制》说：

夫褒善饰终，王者常典。况我友于之爱，手足之亲，永言痛悼之怀，用锡元良之命。故齐王凑，孕灵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于孩提，惠怀洽于亲爱。将固磐石，遂分茅社。学探蚁术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书乐善，造次不失其清规；置醴尊师，风雨不忘其至敬。方期^考。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歼我同气。念周宜好爱之分，长恻莫追。览魏文荣乐之言，轸怀无已。繇是稽诸前典，式展追荣，特峻彝章，表恩泉壤。虽礼命之仪则尔，而天伦之恨何遽？遐想幽魂，宜膺宠数。可憎怀懿太子。仍命有司择日备礼追册。^①

① 《唐大诏令集》第32卷，《皇太子·追赠》。

第八章 拒纳维州，僧孺进谏

维州（今四川省理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年）初置，在四川西北边境。其州位于高山绝顶之上，北、东、南三面江水环绕，形势十分险要。西面邛崃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

维州本为唐朝故土，因其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所以，成为唐蕃必争的战略要地。吐蕃曾多次引兵入寇维州，但始终没有得手。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河西、陇右地区全部被吐蕃侵占，唯此州独存，为大唐固守。吐蕃因其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于是，暗中把一名吐蕃妇女嫁给维州看守城门的人为妻，生了两个儿子。二十年后，她所生的两个男孩都已长大成人。广德元年（763 年），吐蕃兵临维州城下，二子为内应，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打开城门，引吐蕃兵一拥而入，汉兵还在睡梦之中，维州遂陷。吐蕃称之为“无忧城”。

吐蕃自从得到维州以后，南路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得以全力以赴侵扰唐朝西北边境，甚至严重威胁唐朝京城长安的安全。此后，唐朝西北边境扰无宁日，历代皇帝都为此而寝食不安。同时，维州又是成都的西大门，维州一失又直接威胁成都的安全。巴蜀与关中遥相应援，相互依存，两者必须兼固并保，才可以确保整个国家的磐石之固。因此，收复维州，不仅可以捍卫成都、确保巴蜀安全，而且关系到整个唐朝

江山的稳固与唐室的兴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在蜀达二十一年。他对吐蕃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贞元四年（788年），韦皋派遣判官崔佐时出使南诏，规劝其归顺唐朝，离间其与吐蕃的关系。南诏国王异牟寻欣然接待唐使，并表示愿意与吐蕃断绝关系，遣使向大唐朝贡。从贞元五年（789年）以后，韦皋屡次出兵进入蕃界，打败吐蕃的军队。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北寇灵州、朔州，攻陷麟州。唐德宗下令韦皋出兵深入蕃界，以牵制吐蕃北路的兵力。韦皋奉命出十路大军进攻吐蕃，大破吐蕃兵，生擒六千人，斩首万余级，遂进攻维州。吐蕃救军再至，转战千里，蕃军连败。于是，北寇灵、朔之众引兵退回，赞普派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人而来解维州之围。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先出动千人向蕃军挑战，莽热见我军人少，指挥全部人马追击，我军埋伏的将士四起，杀声如雷，蕃兵不战自溃，生擒论莽热，蕃兵十万被消灭将近一半。但是，维州城高地险，蜀军最后也没有攻下。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入寇西川，大掠而去。大和四年（830年）十月，唐文宗任命原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入川时，西川残破凋敝，民心不稳。他对外宣扬国威，对内经武整军，加强战备，蜀地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吐蕃和南诏对唐朝越来越畏惧。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虽是杂虏，但羡慕中国的文化，表示愿意归降大唐。大和五年（831年）九月，悉怛谋写信给李德裕，请求归降唐朝。李德裕怀疑他是诈降，托言须请示朝廷后再作答复，以探其真伪。可是不久悉怛谋就率领一城的兵马，携带州印、甲仗，塞途相继，来到成都，归降于唐。

李德裕见悉怛谋是真心实意投降，便欣然接纳，举行隆重的仪式，大出牙兵，接受悉怛谋的投降。同时，派遣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暂时代理维州刺史。

庚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将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投降一事向朝廷作了汇报，并且建议：

维州是我西川屏障，自维州陷落，川境随时都有吐蕃侵扰之患。今幸故土重归，内足以屏蔽全局，外足以抵御吐蕃，即使吐蕃来攻，维州可战可守，亦足以控制防御吐蕃。我打算派遣三千没有开化的羌人，焚烧十三桥，随后出兵直捣吐蕃的腹心之地，可以雪除大唐长久以来所受的羞辱，实现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终生努力而未能实现的目标。

唐文宗接到李德裕的奏报，感到很疑惑，于是，将奏章交付尚书省，下令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大家都赞成李德裕的策略，纷纷要求唐文宗批准李德裕的建议，接纳维州副使悉怛谋归降。只有宰相牛僧孺表示反对，他说：

李德裕说得不对。吐蕃疆域辽阔，四面的边境各达一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对他们的国势丝毫没有影响。近年来唐朝与吐蕃结盟修好，双方约定共同撤除边防戍兵。朝廷对戎夷族的政策，一贯以信义为上。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吐蕃就会派人来责问朝廷说：“为什么失信于我？”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出兵直上平凉阪，然后用一万骑兵布置在回中山，怒气冲冲，直逼长安，不用三天就会抵达咸阳桥头。这时，京师长安就会出现危急。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处呢？按照李德裕的建议去做，只能使我国背信弃义，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同

意这样做，何况陛下身为天子呢！

唐文宗性情本来就很懦弱，牛僧孺正是抓住文宗这一弱点，利用其惶惑的心理，而大加恫吓之辞。文宗经他这么一吓，自然胆怯起来，便应声道：“那么，依你之见，不如遣还悉怛谋吧！”牛僧孺高兴地说：“陛下圣明，臣很敬佩！”

唐文宗不顾百官的反对，竟然认为牛僧孺说得有理，于是，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同时把悉怛谋和随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全部遣返。

李德裕在接受悉怛谋归降时，曾指天发誓，当面保证要向朝廷上奏，对悉怛谋等人加以酬赏。李德裕自与锦袍金带，等候朝廷的诏命。如今接到朝廷命令，李德裕感到很为难，因此，他又多次上奏朝廷，请求赦免悉怛谋等人，但朝廷诏书答复严厉急切，态度十分坚决，命令必须将悉怛谋等人送还吐蕃。李德裕只好把悉怛谋等人捆绑起来，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放进竹筐。当抬他们上路时，他们齐声喊冤，哀号痛哭，西川的将士官吏面对着这情景，无不哭涕。吐蕃将领还向押送悉怛谋等人的西川将士嘲笑说：“他们既然已经投降唐帝国，为什么又送回来？”随即就在唐蕃边界上，用残忍的手段，把悉怛谋等三百多人全部杀害，就连婴儿也不放过，先把婴儿抛向高空，然后用刀尖在下面承接，目的是恐吓那些已经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

中国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历来采取羁縻政策。李德裕未曾用兵攻取，悉怛谋是受感化自愿投唐，朝廷理应欣然接纳。当时，汉州刺史薛元赏就认为应当安抚悉怛谋，以此打击吐蕃，不可失去这个有利时机。这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公论。何况朝廷百官集议时，都请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议。然而牛僧孺当朝，独排众议，竟令执还。牛僧孺身为宰相，从政已

久,对于朝政边情非常清楚。只是由于他心中无策,对内乱外患采取姑息政策,苟且偷安所致。并且嫉妒李德裕收复维州之功,企图阻塞李德裕以边功入相之路,借以维持其在朝廷中的地位,竟然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如果文宗英明果断,当机立断,批准李德裕的建议,朝廷百官又与李德裕共鸣,则牛僧孺亦无计可施。但文宗既懦弱又糊涂,当断不断,以致给牛僧孺可乘之机,造成决策的严重失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牛僧孺放弃维州,则曲笔为之强辩说:

以往凡评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保留还是放弃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不然。春秋时,晋国大将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国,鼓国有人暗中跟荀吴联络,表示将要投降,献出城池。荀吴拒绝,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鼓励他们的奸邪。”并且,通知鼓国国君杀掉叛变的人,让他们重新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刚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是大事;从吐蕃对国家的危害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灾祸稍缓而京畿灾祸急速。那么,为唐朝着想,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应该选择哪一项?悉怛谋降唐,对唐朝而言,他这样做是归化;但对吐蕃而言,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吐蕃诛杀,又有什么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强调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强调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认为是耻辱,

何况身为天子！好像邻居家的一头牛，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归还原主，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当作己有。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讲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留下来可以发财。”从这个角度观察，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就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司马光的评论与牛僧孺之议如出一辙。在牛僧孺和李德裕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论中，赞扬牛僧孺，斥责李德裕，司马光是第一人。司马光认同牛僧孺的观点，用以打击李德裕的主要一句话就是诚信。一旦用“诚信”作号召，就可以封住天下所有人的口，使他们无法解释。司马光和牛僧孺都以唐朝新与吐蕃结盟修好为理由，拒绝接纳维州悉怛谋的降唐。事实上，维州本是大唐帝国的失地，唐帝国收容主动归降而来的军民，对“诚信”有什么伤害？八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吐蕃乘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之机，侵占了从陇右直到安西、北庭的大片土地，何“诚信”之有！而维州悉怛谋主动回归唐帝国，好比邻居从前偷了我们数十只羊，现在不过有一只羊逃回来而已。司马光却把它比喻成邻人的牛闯入我们家门，诚属牵强附会、不伦不类。因维州本是大唐故土，而被吐蕃侵占，并不是邻人之牛逸入我家，而是我家之牛被吐蕃窃去，其自己逃回。再说维州归降的军民三百多人，他们的老爹、祖父都是唐民，现在竟然把他们押送吐蕃，任其惨杀。司马光认为对他们的死不必同情，然降者何罪？悉怛谋既然归降于我，便为唐臣，而又把他遣送吐蕃惨遭杀害，实际上，悉怛谋是死于唐廷和牛僧孺之手。唐朝和吐蕃曾先后四次结盟，而吐蕃多次背盟失信。就在悉怛谋归降的（大和四年，830年），吐

蕃仍在围攻鲁州。以此而言，吐蕃岂是守盟？破坏唐蕃友好关系的正是吐蕃一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9年），四川节度使杜□再次以武力收复维州，距大和五年（831年）李德裕初复维州，相隔十八年。司马光说李德裕初复维州是见利而忘义，而对杜□之再复维州，则默许而不责，岂不自相矛盾！所谓“维州缓而关中急”者，亦属似是而非之论。吐蕃夺取维州后，得以全力以赴侵略唐朝的西北疆域，而无南路后顾之忧，直接威胁唐朝京城的安全。而我们收回维州，与结交南诏一样，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的策略。不收复维州，则西川与西山八国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唐帝国的屏障完全丧失。李德裕说，刚刚接纳悉怛谋的归降，南诏国就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威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久苦吐蕃的征役，都表示只要得到他的信件，便前来归附，作大唐之人。吐蕃国的合水、栖鸡等城，在失去维州作为屏障后，自然会退兵。这样，我国不仅可以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出兵，即可收复一千多里的失地。并且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派遣没有开化的三千羌族人，焚烧十三桥，直捣吐蕃的腹心之地，正是确保关中安全的积极战略。牛僧孺危言耸听，说吐蕃军队三日即可抵达咸阳桥，这是长吐蕃志气，灭大唐威风。事实上，悉怛谋归降以后过了一个月，吐蕃没有一使进入唐境，更无实力向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从此以后，吐蕃已被我朝吓破了胆，难道还担心它以后会报复吗？维州事件本来已有损于大唐帝国的声威，而司马光又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百般为牛僧孺辩护，更有失史家的公正立场。

司马光所以有这种见解，是因为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北宋当权者不断调动军队，惹事生非，使中国疲敝，也使边疆不断地发生战事，所以强调应跟邻国和平相处，用以提醒当时的

帝王。南宋的理学家朱熹也说：

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来降，盖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温公（指司马光）之言，及以义利断之，直牛而曲李者，其意盖有所为。宋神宗在位，喜于论兵，富郑公尝云：“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郑公之意也。^①

大和六年（832年）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前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四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调回京城担任枢密使，多次对文宗说：“朝廷命令西川节度使把吐蕃将领悉怛谋捆绑送还，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理方法实在有害。”唐文宗也感到有些后悔，抱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决策失误。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对文宗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嫉妒、阻挠李德裕为朝廷立功。”唐文宗为此事对牛僧孺越来越疏远，牛僧孺内心十分不安。一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是不是有意于此！”牛僧孺回答说：“天下太平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现象。现在的形势是：周边蛮夷族没有侵犯中原，广大人民没有流离失所，虽然谈不上是太平盛世，但也勉强可以说是小康了。陛下如果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还要追求什么天下太平，那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退朝之后，牛僧孺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如此责备抱怨，对我们要求如此之高，我们怎么能长久地坐在宰相的座位上！”于是，他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日，乙丑（初七），唐文宗将牛僧孺调出京城，以同平章事头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① 《丛书集成》：《通史它石》卷下，引朱子《纲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君主圣明，臣下忠诚，在上位的人发号施令，在下位的人服从执行，提拔重任德才兼备的人，罢黜放逐奸邪小人，严格遵守执行国家的礼乐制度，推行教化，刑罚清正廉明，政令平和公允，盗贼消失，战乱平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地方政府听命于朝廷，四方蛮夷归顺降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给人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在唐朝的后期，宦官专权，在宫廷中威胁皇上，皇上却无法疏远他们。藩镇割据，在朝廷外无视中央，中央却不能控制他们。士卒驱逐杀害主帅，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节度使，却从未有人过问制止。战乱连年不断，赋税横征暴敛。血肉白骨，纵横原野，纺纱织布的机杼，村落中再也找不到。牛僧孺竟然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岂不是弥天大谎！当唐文宗孜孜不倦地追求天下太平的时候，牛僧孺身为宰相，被提拔时苟且偷安、阿谀奉承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蒙蔽人民以便盗名窃誉，谁的罪行比他更大呢！

第九章 兵变迭起,朝廷姑息

兵变,主要指藩镇军队中出现的士兵哗变、溃散、掠劫,将校争夺军权以至于杀逐主帅和节度使残杀将士的各种行为,是藩镇军队脱离主帅、失去控制的变乱现象。地方藩镇公开以武装形式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也属于兵变的范畴。

唐朝藩镇的兵变非常频繁,据有人统计,从安史之乱以后到唐朝灭亡,大约发生了二百多起。如此频繁的兵变,情况各异,不能一概而论。综合考察唐代藩镇兵变的形式,大体上有四种情况:

第一,士兵哗变。这类兵变是由于节度使治军残暴,虐待将士,严重损害将士的人格尊严和经济利益,从而引起将士的不满。另外,将士不愿意调防、戍防、出征,思归擅自离开军队,索求优厚的赏赐而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不满情绪也可能引起士兵哗变。

第二,将校为夺取节度使的位置而煽动士兵作乱,杀逐主帅,取而代之。这是为争夺军权而发动的兵变。

第三,节度使为除去威胁自己的骄兵悍将而残杀其部下。

第四,藩镇公开以武装形式与唐朝中央政府对抗。

前三种情况都是发生在藩镇内部,并且多半由藩镇自己解决,有时朝廷也派专使干涉。后一种情况发生在藩镇外部,朝廷征调其他藩镇的兵力,对反叛中央政府的藩镇加以

镇压。从数量上看,士兵哗变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将校作乱,争夺兵权。再次是藩镇反叛中央政府,而主帅残杀部下的事件最少。由此可见,唐代藩镇的动乱大多发生在藩镇内部,而发生在藩镇外部,与中央政府公开的武装冲突不占主要地位。

兵变往往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造成藩镇军队乃至部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恶化。一些规模较大的兵变还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动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兵变的结果往往造成藩镇军队脱离朝廷的控制,助长了藩镇与朝廷的对抗。此外,也有一些脱离割据藩镇、归顺朝廷的兵变,或由兵变转化为农民战争。

唐朝中央政府对不同形式的兵变采取不同的对策,主要打击那些不服从朝廷命令、公开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藩镇内部的动乱大都采取姑息政策。这是由于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力量。某些节度使的废立生杀完全由骄兵悍将操纵,唐朝中央政府受兵力、财力的限制,无法进行干预,往往只是在兵变后承认既成事实,加以任命追认。这种姑息政策进一步助长了骄兵悍将的嚣张气焰,造成兵变迭起的恶性循环。

唐文宗时期,共发生各类兵变十三起,未遂兵变一起。

1. 李同捷叛乱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三月,横海节度使李全略病死,他的儿子,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擅自为留后,篡夺了横海军的军政大权,并用重金贿赂邻近藩镇,以求正式继任节度使。大和元年(827年)五月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前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任命原横海军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声称将

士强行挽留，拒绝调职，不肯接受诏书。八月十一日，唐文宗下诏撤销李同捷所有的官爵，命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平卢节度使康志睦、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以及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率本镇军队讨伐李同捷。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李同捷请求投降，被柏耆杀死，沧景（横海）全部平定。

2. 王庭凑拒命

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援助李同捷叛乱。大和二年（828年）九月，甲午（十一日），唐文宗下诏，撤消王庭凑担任的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及其爵位，命令诸道兵马四面围攻讨伐。李同捷叛乱被平定以后，王庭凑又归顺朝廷。

3. 安南兵变

大和二年（828年）六月，庚辰（二十六日），峰州刺史王升朝背叛中央政府，九月，庚戌（二十七日），容管观察使奏报安南发生兵变，驱逐都护韩约。韩约出兵讨伐，把王升朝斩首。

4. 方志绍倒戈

大和二年（828年）十二月，魏博大将方志绍倒戈，率领本部兵力二万人回军反攻魏州。唐文宗下诏，命义成节度使李听率领讨伐李同捷的沧州行营诸军，前往魏博征讨方志绍。大和三年（829年）正月，李听和史唐率军联合进攻方志绍，打败了他的军队，方志绍率五千人逃往镇州，其余众一万五千人到昭义军请降，安置在閤州。

5. 义成军乱

大和三年（829年）正月，义成军参加讨伐李同捷的行营兵三千人驻扎在齐州，后来奉命调防禹城，走到半路，发生兵

变，溃散逃回。横海军节度使李□出兵截击，三千士兵全部被诛杀。

6.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残杀部下

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非常勇敢，而且爱护士卒。节度使王智兴对部下残忍暴虐，军中将士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消息后，利用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大和三年（829年）二月，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石雄离开武宁军后，王智兴杀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四月，戊午（初九），王智兴上疏指控石雄图谋不轨，动摇军心，请求朝廷把他杀掉。唐文宗明知道这是一种诬陷，但迫于王智兴的压力，只好认定石雄有罪，但下令免除石雄死刑，终身流放白州。

7. 魏博兵变

大和三年（829年）六月，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原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任侍中，调任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任魏博节度使。同时，下令把魏博管辖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

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宪诚河中节度使的旌旗符节。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达魏州。这时，李听率军从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馆陶县，扎营逗留，拖延而不再前进。史宪诚竭尽魏州库存的所有金银财宝、绸缎布匹，准备全部运往河中，引起将士的愤怒，私下有人议论说：“主帅无故求代，卖地邀恩，现在又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拿走归己，难道我们这些士卒就该活活饿死吗？”甲戌（二十六日），魏博将士发生哗变，乘夜闯入军府，杀死史宪诚及监军史良佐，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为留后。何进滔说：“诸君既然强

迫推我上台,就必须听我的号令,这样,我才答应任职。”众将士唯唯从命。何进滔查出带头闹事的祸首,斥责他擅杀军使及监军,将他斩首示众。接着,为史宪诚发丧举哀,何进滔穿着丧服临哭,并让全军将士吊唁。同时,向朝廷上奏,详细说明事情的经过。

李听得知魏州发生兵变,方率军抵达魏州城下,遭到何进滔的阻拦,不得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的军队,李听毫无准备,何进滔率军杀入营中,一阵冲突,李听的军队大败崩溃,士卒四散。李听在慌乱中率残兵败将日夜不停地逃奔,到了馆陶县浅口镇,士卒死伤、逃亡过半,辎重、兵器全部丢弃。多亏昭义节度使出兵救援,李听才侥幸活命,回到义成节度使的治所滑台,向朝廷报告被何进滔打败的情况。御史中丞温造弹劾李听接到朝廷命令后不立即执行,拖延行事,导致魏博军发生兵变。唐文宗倒是宽宏大量,只是召李听入朝,免去他魏博节度使的职务,改任太子少师。

自从大和元年(827年)朝廷出兵讨伐横海军李同捷以来,长期在河北地区用兵伐叛,军需供应一直难以为继,朝廷为此十分厌烦苦恼,不愿再生事端,对藩镇内部的斗争,无力干预,只好采取姑息政策。大和三年(829年)八月,壬子(初五),朝廷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史孝章自请为父守丧,因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划归魏博管辖。何进滔抚治兵民,颇有权术,人皆听命,现在,又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更加高枕无忧了。

8. 兴元兵变

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国侵犯西川的时候,朝廷诏命山南西道派兵前往救援。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兴元府的兵力太少,因此,节度使李绹临时招募新兵一千人前往,还没有走

到西川，南诏兵已经退走，新兵于是返回兴元。

兴元府的兵力编制历来有严格规定，因此朝廷下令把这批新招募的兵士一律遣散。大和四年（830年）二月，乙卯（初十），李绛召集全体新兵，传达朝廷的诏令，每人各给麦子数斗，命令他们回家。新兵们大失所望，闷闷不乐而退，前去监军杨叔元那里辞别。杨叔元向来痛恨李绛不阿谀奉承自己，就借口说赏赐的东西太少，故意挑拨新兵对李绛不满，新兵果然被激怒，顿时哗变，嘶喊呼叫，抢夺武器，直向节度使衙门冲去。这时，李绛正和自己的幕僚在一起饮酒欢宴，没有任何戒备，闻听兵变，慌忙逃到北城，有人劝他从城上缒下逃走，李绛说：“我身为节度使，岂能离城逃走，你们只管听便”。僚佐见大势不妙，多半散去，只有牙将王景延、推官赵存约在他身旁。李绛挥手令他们速速离开，牙将王景延和乱兵拼力厮杀，力竭而死，赵存约还紧跟李绛。李绛急语道：“乱军将至，何不速行！”赵存约说：“我以前身受你知遇之恩，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岂能临难自己苟且偷生！”话刚说完，乱兵一拥而上，可怜李绛与赵存约、观察判官薛齐都被乱兵杀害。接着，乱兵屠杀了李绛的全家。

戊午（十三日），监军宦官杨叔元上奏朝廷说：“李绛擅自收取招募新兵用的财物，因而导致新兵哗变。”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前往平定兵变。这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联名上疏，申诉李绛冤枉，谏议大夫孔敏行把杨叔元如何激怒新兵作乱的事实经过详细向文宗作了报告，文宗这才明白李绛被害的事实真相，追赠李绛为司徒，授予谥号为“贞”。

温造赶赴山南西道上任，走到褒城时，遇到兴元都将卫志忠刚刚讨伐蛮人回来，温造和卫志忠商议秘密诛讨新兵哗

变的计划,于是,以卫志忠所率领的八百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另外五百人作为前锋,到达兴元后,进入节度使衙门,分别把守各门。三月,己卯(初五),温造登堂处理公务,在军营大门摆设酒席,犒劳全体将士,他对部下说:“我想亲自问一下新兵是愿走还是愿留,请把他们全都找来!”那些乱兵依恃杨叔元的势力,毫无惧色,大摇大摆地进入府门,温造不动声色,向新兵表示慰劳,命他们入席饮酒。这时,卫志忠秘密地布置的亲信兵将他们团团围住,一声令下:“杀!”顿时,新兵八百多人全被杀死,只有一百多人逃走。杨叔元正与温造叙谈,温造接到卫志忠的报告,便对杨叔元说:“监军是朝廷命官,你身为监军,为什么唆使乱军杀死主帅?”杨叔元无法抵赖,急忙起身,抱住温造的靴子哀求饶他一命。温造说:“待我表闻朝廷,恐怕朝廷未必能饶恕你哩!”当即命令将杨叔元拘禁起来,等候朝廷发落。当时亲手杀死李绛的凶手,被斩成一百段,其余的新兵,都被斩首,尸体都被投到汉水中。温造命用一百个新兵的首级祭奠李绛,三十个首级祭奠其它死难的人。然后,把以上情况向朝廷报告。乙丑(十五日),唐文宗下诏,将杨叔元流放到康州。

9. 幽州兵变

兴元兵变后不到一年,大和五年(831年)正月,庚申(二十一日),卢龙(幽州)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招待朝廷派来的钦差宦官,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部众,呼叫呐喊,发动兵变。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害莫州刺史张庆初。

唐文宗召集李宗闵、牛僧孺、路隋、宋申锡四位宰相,同至殿前,商议如何应变。牛僧孺说:“幽州自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穆宗皇

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以所部九州之地归顺朝廷，朝廷费钱八十万缗以赏将士，实际上将士没有得到斗粟尺帛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取幽州节度使，与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形相似。朝廷不必干涉，而应当承认其合法地位，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顺逆，何必兴师动众去讨伐他呢？”李宗闵本是牛党，意见当然一致，路隋是个老好先生，宋申锡刚任宰相，当然也不加异议，于是，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李载义从易州奔赴京城，唐文宗考虑到他曾出兵参与平定横海军节度使李同捷叛乱，立有战功，而且一直对朝廷恭敬顺服，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带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又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调温造镇河阳，进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121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发表评论说：

从前，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深知天下身份相同的普通平民不能相互约束，所以设置官吏进行治理；深知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设置诸侯加以控制；深知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服从，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天子对天下万邦能够奖赏善行，消除邪恶，抑制强暴，扶持弱小；安抚顺从的人，惩戒叛逆之徒；禁止暴虐，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四海之内，就不可能有不顺从的国民。《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驱逐，这正是天子应当过问，必须处理的事情。如果连一声都不问，而顺势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

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还有什么事可做?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只是为了搜刮财赋吗?像牛僧孺这样的论点,不过是一种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的手段而已,岂是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

10. 幽州兵变

大和八年(834年)十月,辛巳(初四),幽州发生内乱,将士驱逐节度使杨志诚和监军李怀恡,推举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守事务。

杨志诚被将士从幽州驱逐后,路过太原,河东节度使李载义逮捕了他,亲自动手殴打,并想把他杀死,以解心头之恨。李载义的幕僚竭力劝阻,杨志诚才幸免一死。但李载义仍诛杀杨志诚的妻子儿女和随从他的将士,朝廷因李载义曾参与平定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叛乱有功,因而不追究责任。在此之前,李载义的母亲和兄弟去世后埋葬在幽州,杨志诚掘开他们的坟墓,拣取墓中的陪葬财宝,并上疏请求挖出杨志诚的心脏来祭悼他的母亲,唐文宗没有允许。

史元忠把杨志诚擅自织造的皇帝袞龙黄袍以及其他各种帝王用的器具呈献给朝廷。十一月,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杨志诚流放到岭南。走到半路,被朝廷派人杀死。十二月,癸未(初七),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留后,大和九年(835年)三月,丙辰(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节度使。

11. 莫州兵变

大和八年(834年),幽州向朝廷奏报:莫州发生兵变,刺史张无去去向不明。

12. 河阳兵变

开成二年(837年)六月,河阳发生兵变,节度使李泳逃奔怀州,变军焚烧节度使官署,杀死李泳的两个儿子,大肆掠夺数日。李泳是长安的市民,在禁军中取得兵籍,然后,贿赂当朝权贵,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他上任后,依恃自己交结当朝权贵的势力,贪赃枉法,残忍凶暴,部下无法忍受,终于激起兵变。丁未(十五日),唐文宗贬李泳为澧州长史。戊申(十六日),任命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河阳的军士驱逐节度使李泳以后,一直没有安定,每天相互煽动,准备再次发动叛乱。九月,新任节度使李执方抓到带头闹事者七十多人,全部斩首,接着,把他们的余党分遣外镇,然后才得以安定。

13. 义武兵变

义武节度使张璠在任十五年,和他邻近的幽州、镇州两个割据藩镇都对他十分敬畏,张璠患病,上疏请求前往京城朝见皇上,朝廷还没有作妥善安置,张璠已经病重。临终前张璠告诫他的儿子张元益率全族人返归京城,不准效法河北藩镇的惯例,继承节度使的职务。张璠去世后,义武的将士打算拥立张元益为节度使,观察留后李士季反对,被将士杀死,同时,又诛杀大将十余人。开成三年(838年)九月,壬申(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侯何清朝率兵逃出定州,投奔朝廷,癸酉(十八日),被任命为仪州刺史。

十月,义武监军奏报:“军中将士不接受新任节度使李仲迁,请求任命张元益为留后。”

宰相商议发兵征讨义武,文宗说:“义武地方狭小,百姓贫困,军队经费一半靠朝廷度支调拨供给,如果急于攻讨,那么,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如稍稍延缓反应,则内部必定

发生分化。现在,只要命令它的四邻藩镇严加戒备,等待事态的发展。于是,任命张元益为代州刺史。不久,义武军中果然产生分歧,他们上疏说李仲迁不适宜担任义武节度使,朝廷于是罢免了李仲迁节度使的职务。十一月,唐文宗下诏,等张元益从定州出发,赴代州上任后,凡义武最初密谋拥立张元益的将士,一律赦免不再问罪。

丁卯(十三日),张元益离开定州。

甲戌(二十日),唐文宗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

开成四年(839年)七月,癸未(初四),唐文宗任命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封他的母亲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赏赐绢二百匹。此前义武发生兵变的时候,侯莫陈氏劝说将士,同时告诫张元益听从朝廷命令,所以文宗予以赏赐。

另外,武宁未遂兵变一起:

大和六年(832年)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以原□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提拔自己的一个奴仆为牙将。这时,李听接到任命后,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侍从到徐州去慰劳将士,那个奴仆出身的牙将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当节度使,于是,煽动士卒杀死李听派来的亲信侍从,并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借口自己身体有病,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榘为武宁节度使。

第十章 强藩扬威,杜牧谈兵

大和七年(833年)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幽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幽州驻京城的进奏官徐迪面见宰相说:“军中将士不了解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由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也是升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的敕使到达那里,恐怕就会被拘留。”徐迪言辞傲慢无礼,可是宰相们却没有放在心上。

杨志诚因为没有得到仆射的职务而大发雷霆,于是,拘留了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三月,甲午(初七),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来京城拜谢并辞让朝廷所授予的检校吏部尚书的职务。丙申(初九),唐文宗再次将检校吏部尚书的任命书和对杨志诚辞让的批答公文一并交给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离开京城返回幽州。

八月,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骜不驯,感到非常愤怒。而朝廷在商议对策时,又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的对策。于是,杜牧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自己的对付藩镇的具体方策,名曰《罪言》。大略认为:

国家大事,我因不在其位而不应当随便议论,说出

来实在有罪，故作《罪言》。

一般来说，人们常常害怕战争。战争往往首先起于山东，充满天下，不得山东，战事不会停息。山东之地，大禹规划九土时，统称为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分冀州为冀、幽、并三州，划定其水土，与河南相等，占天下十分之一二。山东之人沉鸷多材力，讲信用，能吃辛苦。自魏晋以后，世俗败坏，羡慕浮华淫乱，意态百出，人愈来愈脆弱。唯有山东重视耕战，不受世俗的冲击而镇定自若。当地又产健马，下等的也能日驰二百里，所以，山东之兵常常可以抵挡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并州，力足以并吞天下。幽州，幽阴惨杀，故圣人因其风俗，以为之名。

黄帝时，蚩尤与黄帝曾大战于此地。以后，帝王多居于此。岂不是崇尚其地的风俗而建都于此吗？周朝衰落以后，齐桓公称霸，不过一世，接着，晋文公称霸，常佣役诸侯。至秦国以劲旅进攻三晋，经六世才占领韩国，于是折断了天下的脊梁，又占领了赵国，因而攻灭六国，统一天下。秦末韩信攻占齐地，故蒯通通知楚汉相争成败在于韩信。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上谷而称帝于■。魏武帝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三分天下有其二。西晋灭亡后，五胡乱华，至宋武帝刘裕号为英雄，得蜀，得关中，尽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还不能使一个人渡河以窥测胡人。至于北齐荒荡，被北周宇文氏所灭，隋文帝代周灭陈，五百年间，天下才为一家。隋文帝并不是宋武帝的对手，但由于宋武帝未得山东，隋得山东，所以隋文帝成为帝王，而宋武帝只为霸主。由此言之，山东之地，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

得之，便招致天下不安。

我朝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起，出入成皋，函谷关、潼关之间，若涉无人之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常率兵五十万而不能过邺城。从此以后，黄河以北一百余座城池，全部丧失，朝廷不能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不敢窥测。国家因此沿黄河修筑防御工事，阻塞河北贼的大街小路。黄河以南，齐鲁梁蔡诸地藩镇，也受其影响，跋扈难制。以河北贼为中心，割据叛乱向外幅射，外围的藩镇支持了河北贼的割据，相互影响，颠倒横斜，未曾有五年间不发生战争。百姓日益困顿疲敝，周边的少数民族乘机进犯中原，日益猖獗，天子因此而逃到陕州、汉中躲避，焦焦然七十余年了。呜呼！宪宗皇帝穿洗过的衣服，每天吃一次肉，不外出打猎，不饮酒作乐，从出身贫贱的下层中选拔将相，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雪以前的耻辱，变革制度，没有不顺从的，只有山东不服。虽亦再攻之，皆没有取得胜利，无功而返。难道是天使老百姓不能达到太平吗？难道是宪宗的谋略不足吗？消除藩镇割据，是多么地艰难啊！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代的帝王，立志理平天下。如果想使百姓平安无事，关键在于首先消除战争。不得山东，战争就不能消除，这是由于战争杀人无已。今上策莫如自治，为什么呢？德宗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有大量戍兵，凡此十余所，仅能自卫，实在抽不出一兵一卒为朝廷出力。遂使朝廷的兵力分散，对于叛乱不轨的藩镇无可奈何。由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都看风使舵，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已

二十九年了,朝廷得蜀得吴得蔡得齐,凡收郡县二百多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余城。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有余吗?亦足以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真自治了吗?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真自治了吗?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真自治了吗?井闾阡陌,仓廩财赋,果真自治了吗?如果没有自治,这就是帮助河北贼为虐。河北三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又有天下阴为之助,怎么能攻取呢?所以说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集中力量取魏。魏对于山东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河南来说也很重要。魏在山东,因其能阻挡赵地,既不能越过魏以取赵,也不可越赵以取燕,因此,燕、赵常重魏地,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的位置最重要。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壁垒相望,朝驾暮战,此二津,虜能击溃其一,则驰入成皋,不用几天的功夫。故魏对于河南来说也很重要。元和年间,举天下兵诛蔡、诛齐,用兵五年,不担心山东藩镇,因为朝廷得魏。大和元年(827年),讨伐李同捷,用兵三年,不担心山东藩镇,亦是因为朝廷得魏。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是因为朝廷失魏。昨日诛赵,无功而还,也和长庆时一样,朝廷失魏而致。所以说,河南、山东之轻重在于魏。并不是由于魏强,而是由于其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因此,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所谓浪战,就是不计地势,不审攻守,盲目对藩镇征伐。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虜常困于守。山东叛者,已历经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不觉得是叛,而以为事理正应当如此,沉酣入骨髓,不以为非,至有围急

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之决一胜负？自十余年凡三收赵，贼粮尽将被攻破。但郗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昕败，赵复振。所以说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为最下策。

杜牧身在幕府，心忧天下，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但是，他并不专门强调对藩镇用兵，而认为朝廷应当检查自己政治上的缺点，加以改进。如果朝廷在已收复的地区内，也并不能治理得很好，则是等于帮助河北藩镇为虐。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自以为治。其次，才是讲究用兵的策略，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杜牧作《罪言》，固然是为朝廷出谋划策，希望能削平藩镇，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也看出藩镇割据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引起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想减少这些祸害。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到惋惜，于是，他撰写了《原十六卫》，认为：

国家在建国初期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将军共三十员，属官共一百二十八员，署守分部，夹峙禁省，从开始到现在，未曾改变。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而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贞观年间，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开始出现和平、统一的局面。唐太宗在朝廷内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一旦发生不测，方二三百里为寇土，数十百万人为寇兵，蛮夷戎狄，践踏四作。此时，则武将提兵出征在外，天下

太平无事,或战争结束以后,则武将列居朝廷。武将在朝廷时,官为将军,绶有朱紫,章有金银,千百骑趋奉朝谒。房宅车马,歌儿舞女,念功赏劳,出于皇帝的恩赐。他们所统率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府兵从事农业生产,冬季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田亩之间,力量分散,人人必然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军队的统帅,也不可能使他们跟随叛乱。当武将领兵出征时,他所统辖的兵马都是根据朝廷的诏令征调而来的。府兵受命于朝廷,离开妻子儿女,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廷爵赏的激励。以首争首,以力博力,在短兵相接中,哪有闲功夫考虑其他的事情。这时,即使蚩尤作军队的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末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皇帝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及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迂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了,应当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诏曰:“可。”而武将们向玄宗奏曰:“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夷,开拓疆土。”诏曰:“可。”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地区,内地空无一兵。这样,便出现了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起辽走蜀,络绎不绝,抵御五个强大的外族,十余年中,亡百万人。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

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生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使军队出外不叛,居内不篡呢?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度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还是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家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用行贿的办法打通了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围有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可得。他们中间那些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使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杀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兴兵作乱,对抗朝廷。另外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位便不断地升迁,或由卿大夫而升任国公,或由一般的州郡升迁到重要的城市。他们在所管辖的区域内,俨然像住在自家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其毒害于天下。所以,天下往往战乱纷纷,齐民百姓消耗疲敝,社会风俗衰薄,教化恩泽,壅抑不能下施,召来灾难,祸及牛马。啊!自己虽然愚蠢,但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吗?并且,武者是用来诛暴的,如天时之有秋天,文者是用来施教化的,如天时之有春天。天不能倒转春秋,豪杰也不能文武并用。有一些人是受命用武力诛暴吗?有。有人施教化吗?有。要想让天下没

有祸患，是不可能的。当年太宗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府兵制度呢？府兵制度的确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故作《原十六卫》。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

战争并不是危险的事情，粮食并没有完全用光，可是，战必败北，这是由于不遵循战争的规律。因此，作《战论》一文。

天下对于河北来说，就像珠宝一样。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即使没有珠宝，人岂不是还能活着吗？如果人失去了四肢，我不能想象他还是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擅长作战和农耕。名城坚垒，络绎不绝；高山大河，相互交错。加上那里牧草繁盛，适合生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兵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以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然没有珠宝，但生活依然富足。可是，国家没有河北却不行，失去了河北，就失去了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如果周边的夷狄突然侵犯边境，朝廷用什么来抵御呢？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藩镇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是坐享朝廷的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

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得干干净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西北的边防地区，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部被调往西北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这样一来，国家的经费不足，不得不经常地向百姓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没有办法施惠于齐民，没有办法接纳四夷，礼乐刑政无暇修治，品式条章不能备具。国家的四肢失去了，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朝廷如果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已经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为个人积累财富。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车马软弱，但不加以检查、整顿，天下突然出现盗贼，便驱赶着士卒立即奔赴战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军队，怎么能不打败仗呢？这是朝廷不重视对士卒进行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有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名字。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卒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队中真正能够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修筑的堡垒还没有干，公费已经用完。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奔走相告，向朝廷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两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

班师，而军将的官爵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宅、金银财宝，甚至连他们的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肯再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三个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许多重要的城市，但一旦只身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无惧色，神态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四个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休。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五个原因。元和时，天子急于求得太平，严格要求士卒，经常汇合数十万军队进攻淮西，天下消耗，用了四年时间才取得了胜利。这大概是由于上述的五种过失没有克服的缘故吧！长庆初，幽州节度使刘总归顺朝廷，其兄弟子侄全部授官，这是由于内地无事，天子宽刑省罚，广施厚恩，与民休息的结果。不久，幽州、成德两镇发生叛乱，朝廷派军队征讨。上述五种弊病更为严重，领兵将帅自顾不暇，怎么能竭尽全力反击逆虏呢？现在，如果朝廷真地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求得万世太平，而又仍然沿袭过去的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古时候，政治上有不善之处，允许士大夫议论，庶人也可以抨击，发表评论的人，也可以将他们的意见写在谤木上，在士大夫当中传

看，而不仅仅是在背后议论而已。

杜牧又因往年两河盗起，屠杀囚禁大臣，劫戮地方官吏，朝廷却不议诛讨，束兵自守，反而按照大历、贞元时的做法，实行姑息政策。于是，叛逆的藩镇更加骄横，终将带来大祸，故作《守论》，大意是说：

现在天下的形势如何呢？朝廷不修武备，干戈铁钺朽钝，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助长了割据势力的发展，几乎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执掌朝政的宰相、大臣不作周密的计划和慎重的考虑，以制定长远的策略，反而盲目地骄傲自大，自以为广大繁荣昌盛，谁也比不上自己。呜呼！岂不知一旦发生叛乱事件，再临时应付吗？并且，天下几里，列郡多少，而自黄河以北，雄城数百，精锐的兵戈遍布，角逐为寇，乘我疲敝、天时不利，则将与其同党，联合周围的郡国发动叛乱，惊扰我民于掌股之上。现在，趁我们还有力量时，不谋擒取，反而苟且偷安，相互推诿，以为后世子孙留下祸患，这又是为什么呢？

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用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又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又不至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本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

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尊大。天子顾及自己的尊严,视而不见,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彩色绸缎和金玉首饰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扩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泚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们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

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呜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的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杜牧又为《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其序曰:

用兵征伐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这个意义。现在,根据案情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直,用手铐脚镣拘禁有罪的犯人,用刑杖处死犯人于集市,这都是狱吏之事。率领数万军队,攻占对方的城郭,俘虏其妻子,斩杀其有罪的人,这也是军吏之事。木板绳索与刀剑兵器没有什么不同,用刑杖笞死犯人与用兵器斩杀罪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规模小而且容易制服罪犯,用力少的,是用木板绳索笞打犯人;规模大而且难于制服对方,用力多的,是用兵器斩杀罪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除去恶人,使好人安全地生活。对于国家来说,是为了使教化通流,不允许任何人为所欲为,为非作歹。选取狱吏或军吏,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的道理,都是要选用仁义、忠信、智勇、严明的人。具备其中一两个条件的人,可以让他做小吏;完全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可以让他做大吏。因此,用力少的狱吏,容易得到,他的功劳也容易看到;用力多的军吏,不容易得到,他的功劳也不容易成就。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的道理。自夏商周三代以下,都是如此。

子贡歌颂孔子的道德说:“文武之道,没有坠落在地上,都是由人传述的。贤德的人记述了它的大的方面;不贤德的人记述了它的小的方面。”季孙氏问冉有说:

“你对于战争一事,是通过学习懂得的,还是出自你的本性,内心省悟的?”对方回答:“是通过学习懂得的。”季孙氏问:“你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不喜欢谈论战争,你怎么能学习呢?”冉有回答说:“我就是向孔子学习战争的。”孔子是一个大圣人,博学多闻,文武并用,但如果想听到他讲如何进行战争,是不能得到的。又不知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辱,如果有人谈论军事,则被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啊!现在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周公当周成王的宰相,制礼作乐,尊崇光大儒术,有淮夷叛周,则出兵征讨之。孔子作鲁国的宰相,鲁公与齐王会于夹谷,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责、污辱齐侯,因鲁国事先有准备,所以,齐国的伏兵不敢动。这两个大圣人难道能说不懂得战争吗?周朝有齐太公,秦国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汙、虞诩、段颖,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亮,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北魏有崔浩,北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这些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制定的战略战术计划,都是总结古今的经验,神秘莫测而有远见,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那些强健的不怕死的善于击杀的士兵,只不过供他们招呼驱使而已,这些士兵难道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以及怎样打仗吗?我小时候读《礼记》,那上面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安营扎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我认为这话有道理。年十六时,我亲眼看到,盗起于方圆二三千里的地方,捆绑、杀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

属，尸体塞满了城郭。山东崩坏，战乱不堪，人们殷切地期望重振朝纲。当时，率领军队讨伐叛乱的，都一定是强健善于击刺的人。而朝廷中的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则不为辱。并不是应当感到耻辱而不感到耻辱，而以为山东叛乱之事不是我们这些卿大夫所应当知道的。我从此事中感到小时候所读的《礼记》，那上面的话简直是妄人之言，不足为信，不足为教。及二十岁，开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观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或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靠军队而能成功的。而主管军队的，都是圣贤、有才能的人，多闻博识之士，他们一定能创建他们的国家。但如果由那些壮健善于击刺而不学习的人主管军队，则一定灭亡他们的国家。从此以后，我才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军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贤德的卿大夫不能胜任主管军队的工作。如果有因战败而亡国的，真是卿大夫的耻辱。此话真不是虚言。因此，我寻求自古以来的兵书，传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共十数家，近一百万言。其中，孙武所著的十三篇，自孙武死后，将近一千年了。率领军队的人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检查他们的事迹，都与孙武所著的兵书相符合，犹如印圈模刻，丝毫不差。孙武所论，大约用仁义，使用谋略。孙武所著兵书，共数十万言。魏武帝曹操删其繁剩，书其精华，共十三篇，成为一编。曹操亲自为之作注，并自为序。我读的兵书战策太多了，孙武所著的兵书太深奥了。但是，曹操所作的注释，十不释一。这大概不是因为曹操不能全部为《孙子》作注。我翻阅《魏志》，见曹操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都以曹操所作的《新书》为指

导,从令者就能打胜仗 ;违教者就要打败仗。曹操自于《新书》中发挥他的学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想随孙武后尽解其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难道曹操不能为《孙子》一书全部作注吗?现在,曹操所著的《新书》已经失传了,不可再知道它的内容。因此,我取孙武所著兵书,详细地为其作注。曹操所注,也全部保留。分为上、中、下三卷。以后的人有读孙武兵书及我的注释,可以用此学习。这就好比在盘子里滚动一个圆珠,圆珠在盘中如何滚动,停在何处,都是不可预测的,能知道的是圆珠不能滚到盘子外面去。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中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刘邦所说的“指出猎物踪迹的是人,而捕获兔子的是猎狗。”那些作宰相的人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尸位素餐当宰相!”

第十一章 议立太子,诸王出阁

唐文宗有两个儿子,即长子李永和次子李宗俭。当初,因为晋王李普是敬宗的长子,性情诚实,处事谨慎,文宗打算立他为皇太子。不幸,李普于大和二年(828年)六月病死,朝廷追赠他谥号为悼怀太子。唐文宗非常痛惜哀悼,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考虑立太子的事情。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唐文宗封他的长子李永为鲁王。鲁王李永的生母是王德妃。

大和六年(832年),唐文宗因鲁王年幼,打算选择一些有德行有学问的名儒做他的老师,培养教育他。当时,鲁王的老师是和元亮,他出身卒吏,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宗召见他,他什么也答不上来。后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唐文宗从容地说:“鲁王的天性素质很好,是可以教育的,应当选择贤士大夫做他的官属,不可再用和元亮之辈作他的老师”。因此,唐文宗以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鲁王傅;太常卿郑肃守本官,兼王府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马。

大和六年(832年)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决定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制文说:

礼重承祧,义承继体,恩崇守器,必务建储。王者,所以固大本而贞万国也。鲁王永,温仁宽明,聪敏孝敬,动合至性,居无放心;乐善承颜,旷度容众,恭勤《诗》、《书》之教,率由忠厚之风。懿兹猷徽,光我胤嗣。朕纂

承宝位，丕宁永图，钦若旧章，用建储贰，爰俾主鬯，以率问安，统正龙楼之荣，昭宣甲观之兆，宜膺茂典，允属元良。宜册为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①

大和七年（833 年）七月，宰相李德裕向文宗建议，请求让诸王离开宫廷出任各级政府职务。他说：

过去，玄宗以临淄王的身分，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对皇族子弟心怀猜忌，不准他们离开宫廷出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因此，天下人都议论说，这种做法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伤害人伦天理。回想当初，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泚叛乱时，如果皇族子弟四散全国各地，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泚杀害，原因就是皇族子弟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皇族子弟中年龄已大、血缘关系已疏的皇族成员离开宫廷，并任命他们为各州的高级幕僚，使他们得以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后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四海之内，人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

文宗说：

这件事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的诸王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贤能人才！只是还没有机会让他们施展才能。

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册文曰：

^① 《唐大诏令集》第 27 卷，《立太子》。

维太和七年，岁次癸丑，八月甲申朔，七日庚寅，皇帝若曰：“王者钦若天道，君临万方，必崇上嗣，以固邦本，所以尊守器而重祧也。我祖宗受天明命，光宅区夏，玄光被于生灵，利泽霈于遐荒。逮予寡昧，继缙洪绪，虔畏寅惧，不克负荷；思崇大典，用建元良，俾膺主鬯之重，式叶奉天之庆。咨尔元子，鲁王永，惟哲淑庄明，温文粹和，夙表岐嶷，生知孝敬；洎茅苴分社，磐石后藩，蕴东平乐善之心，慕河间大雅之操；天纵宏量，日新令猷，人神协志，蓍龟献兆。是用命尔为皇太子。往惟钦哉！修己有度，敬事无违，居必思义，动必率礼；讲道励学，亲师尚贤，则可以正耀于前星、配德于重海，以承列祖，以奉粢盛，恢弘懿图，无忝丕命。可不慎欤！”^①

同时下诏：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分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幕僚。十六宅宫的县主（亲王的女儿），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及时出宫嫁人。但是，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的职务时，意见不一致，结果议而不决而中止。

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度，天子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布列于天下。夏商虽然灭亡，但是他们的后代杞国和宋国仍然存在，与周并传，子孙历千百年而没有灭绝。后世的人主，猜忌自己的亲生骨肉，宁愿皇族子弟被他人侮辱，惟恐被同姓夺取皇位而代之。因此，禁锢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做官，简直就像囚犯一样。虽然他的国家没有灭亡，但翦除了枝叶，国家这棵大树的根基却不稳固了。所以，自魏晋以后，一姓有天下，远者百余年，近者数十年。他们的后代子孙

^① 《唐大诏令集》第28卷，《皇太子册文》。

灭绝,这都是由于猜忌自己的亲生骨肉所造成的。到了唐朝以后五代之际,唐朝皇帝的子孙已经找不到了,这都是他们的祖宗所造成的。

开成二年(837年),给事中韦温担任太子家庭教师,每天早晨到达东宫,一直到中午才能见到太子。韦温规劝太子说:“殿下年轻,每天应该早起,学周文王为太子时,在早晨鸡叫的时候向父母请安,察看皇上的饮食是否正常,而不应该整天游乐宴饮,起得这么晚。”太子年幼,不听他的劝告。于是,韦温请求辞去太子家庭教师的职务。七月,辛未(初十),唐文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仍保留本职。

皇太子李永的生身母亲王德妃不受唐文宗的宠爱,杨贤妃又不断向唐文宗进谗言,诬陷王德妃,王德妃心情忧郁而死。太子李永又不能克制自己,寻欢作乐,举宴饮酒,而且轻信身边的小人,杨贤妃乘机昼夜不停地在文宗面前诽谤太子。

开成三年(838年)九月,壬戌(初七),唐文宗在延英殿坐朝,召集宰相以及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御史台官员和尚书省各司的郎官,向他们宣布皇太子李永的罪过,提议废黜太子封号。文宗说:“像他这样的人,难道还适合继续当太子吗?”群臣都为太子说情道:

“太子年龄还轻,应当给他改邪归正的机会。太子作为陛下的继承人是国家的根本,至关重要,怎么可以轻易废黜!”御史中丞狄兼_轸尤其恳切,坚持不要废黜太子,甚至哭泣流涕。给事中韦温说:“陛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时不重视对他进行教育,以致使他变成今天这样,难道这仅仅是太子一个人的过错!”

癸亥(初八),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军和禁军六军军使十

六人再次联名上表劝阻，文宗才逐渐回心转意。当天晚上，太子才得以回到少阳院。以宦官张克己、柏常心担任少阳院使。如京使（采购官）王少华、判官袁载和及品官、白身（无官职者）、内园小儿（宦官）、宫女等数十人因太子之事受牵连而被流放或判处死刑。不久，唐文宗令太子的家庭教师窦宗直、周敬慎按以前规定每隔一天去少阳院一次，教太子读书。

皇太子李永仍不改过从善，其年十月庚子（十六日），太子突然得暴病而死，朝廷赠谥号为“庄恪”。《庄恪太子哀册文》说：

维大唐开成三年，岁次戊年，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子起薨于少阳院。十七日辛丑，迁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师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平章事郑覃，副使中书侍郎、平章事杨嗣复，持节册谥曰庄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骊山北原庄恪陵，礼也。玉棺岁穷，金壶漏尽，祖奠告撤，哀笳将引。□庭燎灭而月寒，路遥旻而风紧。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铜楼已闭，银榜徒悬。方追思于对日，遽冥寞而宾天。典册具举，文物咸备。爰诏侍臣，显扬上嗣。其词曰：皇矣帝绪，肇基绵古，种德尊道，宗文祖武。上圣开成，天下和平，储祉发祥，是生元良。覃讎之初，岐嶷用章，蕴才游艺，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维城于东鲁，锡介圭于上国。辞荣朱邸，正位青宫，尊师重保，养德含聪。畏驰道而不绝，问寝门而益恭。招贤警戒，齿胄谦冲，冀日跻于三善，奉天慈于九重。汉庄好学，既显于外，魏丕能文，方循于内。美不貳于颜过，嘉得三于鲤退。焜辉甲观，

铿锵瑜佩。方积善于为山，何反真而游岱？呜呼哀哉！忧兢损寿，沉痾遗遘，群望并走，百灵宜□。吴客之向徒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耀，知东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则言，人由己而何有？呜呼哀哉！税驾承华兮即宫夜台，凤笙长绝兮蜃辂徐来。后青门而东出，历玄湘之左回，度雕林兮魂断，入旷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云带翼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见新庙之方开。呜呼哀哉！援经兮曷期？执绋兮增歎，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还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无西园之盖飞，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宾客咸归。瑟彼玉简，闕于泉扉，用传信于文字，愿不泯于音徽。呜呼哀哉！^①

开成四年（839年）三月，丙戌（初四），裴度去世，朝廷追赠他谥号为“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没有给朝廷留下遗表，派人询问他的家属，找到一份没有写完的奏章，上面只说自己为皇上没有立太子而担忧，而没有提及个人的任何要求。

这时，杨贤妃请求唐文宗立自己的弟弟安王李溶为太子，文宗和宰相们商量时，李珣坚决反对。十月，丙寅（十八日），文宗立敬宗的小儿子李成美为皇太子。《立陈王为皇太子制》说：

门下：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尝不正国体而承天序，建储贰而主重器。朕以寡昧，祗荷丕图，严恭寅畏，思固洪业，慎择令懿，旷于旬时，而卿士献谋，龟筮告吉，以为少阳虚位，愿举盛仪。列圣垂休，俾合予志，选贤而立，式表无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陈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谦敬保和，裕端明之体度，尚《诗》、

^① 《唐大诏令集》第32卷，《皇太子·哀册文》。

《书》之辞训，言皆中礼，行不违仁，是以顺考旧章，钦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回朱邸之荣，俾践青宫之重。可立为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①

丁卯（十九日），文宗驾临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有一个小孩表演攀登高竿，下面有一个中年人来回盘旋奔走，好像发狂一样。文宗感到很奇怪，左右侍从说：“那个人是小孩的父亲，怕小孩摔下来，所以在底下进行保护。”文宗顿时伤心流泪说：“朕富贵而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己的一个儿子！”于是召见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十十等十人，斥责他们说：“当初设计陷害皇太子李永的都是你们这帮人。现在我又重新立了皇太子，难道你们还要陷害他吗？”随即命人把他们监禁起来。己巳（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文宗由于这件事而过度伤心，引起旧病复发，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147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己卯（初二），唐文宗下诏封鐕为皇太弟，所有国家军政大事，都由他全权裁决。强调皇太子李成美年龄还小，不能离开老师的教导，仍复封陈王。《文宗立颖王为皇太弟句当军国敕》说：

朕顾以眇身，获承丕构，严恭寅畏，十有五年。列圣鸿猷，朕岂能荷，涉冰匪惧，馭朽非难；虽宇内小康，而大道犹郁，方自砥砺，斯臻理平；天不佑予，夙婴疾疹，政虑多阙，心靡遑安。近日凝互所侵，久而寝剧；臣僚爱我，内外一心，禱祀毕为，药石备至；亟换旬朔，有加无瘳。惧不能躬总万机，日理庶政。稽于古训，谋及大臣，用建亲贤，以贰神器。亲弟颖王漼，朕昔在藩邸，常同师训，

① 《唐大诏令集》第27卷，《立太子》。

动成仪矩，性稟宽仁，俾奉昌图，必谐人欲。可立为皇太弟，应军国政事，便全权句当。百群卿士、中外庶臣，宜竭力乃心，辅成予志。陈王成美先立为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渐师资，每念重难，不行册命，回践朱邸，式叶至公，可依前复封为陈王。呜呼！万务不可以久旷，万方不可以乏统，惟义所在，朕不敢私。宣布中外，咸令知悉。^①

当时，文宗病情严重，召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宰相杨嗣复、李珣来到宫中，打算由两位宰相辅佐太子李成美代行皇上之权，处理朝政。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鉴于当初立皇太子李成美，是文宗亲自决定，而不是由宰官推荐，功劳不在自己，所以强烈反对，于是上奏文宗，声称皇太子李成美年幼无知，又有病在身，应该考虑更换太子。宰相李珣坚决反对，说：“皇太子的地位已经确定，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仇士良、鱼弘志坚持更换太子，于是假传唐文宗的圣旨，封颖王李𣵿为皇太弟，并且率神策军至十六宅宫，迎接颖王李𣵿到少阳院。接着，百官在思贤殿拜见颖王李𣵿。李𣵿性情深沉而刚毅，处理事情英明果断，喜怒不形于色。他就是继文宗之后的唐武宗。

^① 《唐大诏令集》第30卷，《皇太子监国》。

第十二章 真假国舅，冒名顶替

当初，唐文宗的生身母亲萧太后，家原来在福建，从小因战乱就离开乡里，只身一人辗转来到京城。自从进入王府以后，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离家时父母已经去世，家里还有一弟弟。唐文宗登极后，因母族的亲属很少，只有一个舅舅还在，于是下令福建观察使查访寻找，结果也没有找到。这时，正巧有一个运茶工人萧洪，说他有一个姐姐，从小失散，不知流落何方。茶商赵缙引萧洪见太后的近亲吕璋的妻子徐国夫人，她也不能分辨真假，于是一起去见萧太后。太后见了萧洪，以为真的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时感情十分激动，紧紧地搂住他，痛哭流涕，文宗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舅舅，又惊又喜。于是，唐文宗授予萧洪太子洗马一职，不久即升为金吾将军，后来任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又迁检校左仆射、□坊节度使。

后来，宰相李训发现萧洪是冒充太后的弟弟，萧洪大为恐惧，于是，为了讨好李训，就聘请李训的哥哥李仲京到自己的幕府从事，以免真相暴露。

在此之前，凡神策军军将出任藩镇节度使，军中都为她们出钱置办行装，军将上任以后，再用三倍的财物偿还。有一个左神策军军将曾出任□坊节度使，还未来得及搜刮到足够的钱偿还军中为他置办行装的费用就死了。接着，萧洪继任□坊节度使。左神策军的债主们不肯落空，便向萧洪索要

前任节度使的债务，萧洪依恃李训的势力，拒不接受。左神策军又转向已死节度使的儿子索要，萧洪指使死者的儿子在路上拦住宰相李训进行申诉，李训判定可以不再偿还这笔债务。因此，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十分痛恨萧洪。

事实上，萧太后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福建，性情懦弱，一直没有向官府申报自己和萧太后是姐弟关系。这时，又有一个福建人名叫萧本，打听到萧太后弟弟的消息，探听到他家族内外的亲戚姓名，于是，通过仇士良向文宗奏称自己是萧太后的亲弟弟，同时揭发了萧洪诈骗的内幕，萧洪因此获罪。开成元年（836年）八月，甲辰（初七），唐文宗将萧洪贬逐流放到■州，走到中途，下令让他自杀。赵缜、吕璋等人因引见萧洪而受到牵连，都被流放到岭南。

唐文宗这次又以为萧本是太后的真正弟弟，于是，任命他为右赞善大夫，赐绯龟，并追封他的曾祖父萧统为太保，祖父萧聪为太傅，父亲萧俊为太师，赏赐萧本很多财物。萧本历任卫尉少卿、左金吾将军等显要官职。

开成二年（837年）十月，福建观察使唐扶奏报：本道晋江县百姓萧弘自称是萧太后的同族，并已派人护送萧弘入京。唐文宗下诏，令御史台核实真伪。甲寅（二十四日），御史台奏报：萧弘虚妄，冒充皇亲，欺诈朝廷，理应重惩。唐文宗下诏，令将萧弘遣送原籍，并由沿途驿站供给食宿，不予处罚。文宗以此希望今后能找到萧太后的真正亲属。

开成四年（839年）八月，癸酉（二十四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奏朝廷说：

臣听说以假乱真者，一般百姓知道真相后都不肯答应，何况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呢！以疏为亲者，在一般老百姓家里都不允许，何况在大国的朝廷中呢！臣

受到皇上的恩惠很深，一心为公的心情十分迫切，知道有这种虚假的情况，怎么能不说呢！皇帝陛下的仁爱施及万方，孝顺敦睦九族，推心置腹，追求真理。所以，我才敢讲真话，深刻地谈论事情的真相。我看到金吾将军萧本自称是太后的亲弟，得到高官显职。现在，从京城到藩镇，全国上下，异口同声，都说萧弘是真国舅，而萧本是假的。臣广泛地了解情况，听取大家的议论，都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以正名分。今年二月，萧弘来找我，请求我向朝廷反映情况。他对我说，从前福建观察使唐扶及监军刘行立都已经审查了他的身份，已经向朝廷报告。当时，由于萧本是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引见给皇上的，御史台不敢追究，奏报萧弘虚妄欺骗朝廷。于是，圣上将萧弘遣送回原籍。自此以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臣亦派人到左神策军了解情况，想弄清事情的真相。而仇士良也从朝廷的利益出发，承认萧本是假国舅。这样，萧本自己也觉得在朝廷中势单力薄，失去了依靠。臣以为萧本名为国舅，位列朝班，而真假不分，会被朝廷内外的人所耻笑。并且忧虑皇太后受到迷惑，已对萧本有恩情。如果忍辱于一时，终将取笑于千古。我请求圣上追萧弘来朝廷，与萧本当面对质，详加审问，一定能辨别真假。

唐文宗诏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孙简、大理卿崔郾三司会审。十一月，三司会审萧本、萧弘二人，结果证明他俩都不是萧太后真弟弟。于是，唐文宗下诏曰：

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齐、梁之后，侨寓流滞，久在阍中。庆灵钟集，早归椒掖，终鲜兄弟，常所咨嗟。朕自监御以来，便遣寻访，冀得诸舅，以慰慈颜。而奸滥之徒，

探我情抱，因缘州里之近，附会祖先之名，频辜我国恩，假托我外族。萧洪之恶迹未远，萧本之覆辙相寻，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鞠，曾无似是之踪；宰臣参验，见其难容之状。文款继入，留中久之。朕于视膳之时，频有咨禀，恭闻处分，惟在真实。丐沐堕桑，既无可验；凿空作伪，岂得更容。据其罪状，合当极法，尚为含忍，投之荒裔。萧本除名，长流爱州，萧弘配流儋州。^①

从前，萧洪诈称国舅十余年，两度任节度使。萧本因仇士良引见，揭发萧洪的诈伪，连任显职。刘从谏奏论以后，萧本的伪迹也难以掩盖。后来的萧弘也是假冒之徒。因此，萧太后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亲弟弟。三个假国舅欺骗了唐文宗，而真国舅始终下落不明。

“元和、长庆中，两京闾巷间相见，多云：“合是阿舅。”及大和以来，文宗欲崇树外戚，而诈称国舅者数辈，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说，果有验矣。”^②

① 《旧唐书》第52卷，《后妃传下》。

② 《因话录》第6卷。

第十三章 甘露之变,血染朝廷

唐代宦官专权是唐中后期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之一。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中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唐文宗时期,大宦官王守澄掌权,他目无天子,为所欲为。文宗不甘心受制于家奴,立志谋诛宦官。但是,文宗是一个懦弱又不明智的皇帝。大和二年(828年),刘𦰩对策的本意在于赞助文宗下定诛灭宦官的决心,文宗慑于宦官的威势,未敢录用刘𦰩,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大和五年(831年),唐文宗曾和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但由于宋申锡用人不当,事机泄露,遭到郑注、王守澄的诬陷,文宗上当受骗,贬逐了宋申锡。

宋申锡事件以后,大宦官王守澄威震朝廷,大臣的任免和生死,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唐文宗并不甘心当傀儡,也想削弱宦官势力。鉴于朝廷中的朋党之争,文宗开始在牛李两党之外的朝臣中寻找资历较浅、官职较低的人作为依靠对象,再次发动对宦官的斗争。于是,郑注、李训等人便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节 郑李得宠，势倾朝野

郑注，绛州翼城人，出身微贱，以行医游于长安权豪之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当时人称他为“鱼郑”。郑注受宠当政时，人们把他看作是“水族”。

郑注身材瘦小，两眼近视，但却能善解人意，巧言谄媚。元和十三年（818年），李訢为襄阳节度使，郑注前去为李訢看病，治疗效果甚好，因而受到宠信，李訢让郑注做节度衙推。后来，郑注随从李訢移镇徐州，又为职事，军政大事可否，李訢都和他商议决定。郑注诡辩阴险狡猾，善于揣摩人家的意图，与李訢筹谋，未曾不中其意。郑注依靠李訢，在军中妄作威福，军中将士都对他侧目而视。宦官王守澄，时为监军，密将军中众人憎恶郑注的事情告诉了李訢，请求立即将他驱逐出去。李訢笑着说：“郑注虽然像你说的那样，不懂礼貌，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将军试与他谈一次话，如果你认为他一无所取，再驱逐他也不算晚。”王守澄默然而退。李訢立即让郑注前去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开始感到很为难，不愿意见他，但看在李訢的面上，不得已与郑注相见。王守澄勉强坐下来与郑注交谈，郑注思路敏捷，言辞机辩，尽中其意，王守澄惊喜交集，遂将郑注请入内室，与他促膝谈心。郑注说得王守澄十分佩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王守澄即对李訢说：“诚如您所说的那样，郑生的确是一个奇才。”于是，李訢便任命郑注为巡官。

后来，王守澄调入朝廷当枢密使，郑注又跟随王守澄来到京城。王守澄给郑注修建了住宅，厚加赠恤，郑注也竭尽

全力为王守澄出谋划策。接着,王守澄又向穆宗推荐郑注,穆宗也很器重他。

自从穆宗得病以后,王守澄专制国政,权倾内外。郑注频繁出入王守澄家,与他商议谋划,经常通宵达旦。二人串通一气,收受贿赂,外人都无法窥测他俩的踪迹。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些身世卑贱但善于钻营趋奉的官员通过贿赂郑注而求升迁。几年以后,达官贵戚也都争着和郑注来往,以致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工部尚书郑权在家中蓄养了很多妻妾,但由于俸禄少而无力供养,于是,通过郑注向王守澄推荐,求出为节度使。长庆三年(823年)四月,唐穆宗任命郑权为岭南节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唐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慎泄露消息,被郑注得知。郑注令神策军都虞侯豆卢革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李凑,文宗信以为真,大为恼怒。结果宋申锡被免去宰相职务,贬为开州司马,漳王李凑被贬为巢县公。郑注的这一阴谋手段后来被朝廷中大多数的官员识破,因此,众人都对他侧目而视。

大和七年(833年),金吾将军孟文亮镇□宁,聘用郑注为行军司马,郑注不愿赴任,御史中丞宇文鼎弹劾他,才勉强上路。过了奉天,又返回京城。御史李款在□内弹劾他说:“郑注在宫中勾结宦官,在南衙交结朝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受贿赂,白天躲藏不出,夜晚四出活动,窃弄权势,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天之内,李款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情势紧张。

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

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掉,等到他羽毛丰满以后,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有病,请他前来诊治。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只要您向我使一个眼神,我立刻就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向皇上求情。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受惩罚呢!”韦元素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派他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态度非常谦卑,像尺蠖一样弯曲着身子,像老鼠一样惊恐小心,对韦元素点头,毕恭毕敬。谄媚韦元素的话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表示敬慕之意,聚精会神地倾听郑注的谈话,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再三暗示韦元素应当动手,韦元素却不看李弘楚一眼。谈完话后,韦元素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对韦元素说:“您今天不能果断,失去诛杀他的机会,将来总有一天大祸临头,遭到他的陷害,逃不了一死!”李弘楚愤然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

当初,王涯升任宰相的时候,郑注曾在幕后通过王守澄为他活动,而王涯本人也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全部扣压下来,不在朝廷议论。王守澄又在文宗面前竭力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惊骇感叹。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向来憎恶郑注,不愿他在朝廷中做官,于是上表请求朝廷任命郑注为昭义行军司马,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郑注至府上任不到一个月,唐文宗突然中风,

不能说话。王守澄向文宗推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擅长医术。文宗立即召郑注来京城，吃了他开的药以后，病情大有好转。于是，郑注开始得到文宗的宠信。

李训，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训。萧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形貌魁梧，神态潇洒，敏于辩论，思路快捷，善揣人意。进士及第，补太学助教，后被河阳节度府聘用为掌书记。

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陈留人武昭被罢免石州刺史，朝廷任命他为袁王府长史。武昭郁郁不得志，怨恨朝廷的当权者。宰相李逢吉是李仲言的叔父，与宰相李程关系不睦。水部郎中李仍叔是李程的族人，故意激怒武昭说：“李程本来建议朝廷授予你官职，但被李逢吉阻拦而未成。”

一次，武昭饮酒正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说自己要刺杀李逢吉。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九月，庚辰（初十），敬宗下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此案。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对茅汇说：“如果你能证明武昭刺杀李逢吉是与李程同谋，还能保住性命，否则，就不免一死。”茅汇说：“我甘心受冤枉而死！但要我诬告别人来保全自己，我是绝对不做这种事的！”三司会审结束，十月，甲子（二十五日），武昭被判处杖责死刑，李仍叔被贬为道州司马，李仲言流放象州，茅汇流放崖州。

后来，文宗嗣位，遇朝廷大赦，李仲言回到东都洛阳。这时，东都留守李逢吉正想再次入朝担任宰相，并且深怨裴度，心情抑郁不乐。当时，郑注任昭义节度副使，李仲言慨然道：“当今朝廷中掌握大权的人都是齷齪之辈，我听说郑注好结交士人，又有宦官相助，可与共事。”于是，前往昭义投奔郑注，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李逢吉得知李仲言与郑注关系很好，因此，给李仲言金帛珍宝数百万，让他拿着这些厚

礼，西去长安向郑注行贿。郑注引李仲言拜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王守澄以郑注擅长医术、李仲言精通《周易》向文宗推荐。

唐文宗召见李仲言。这时，李仲言的母亲刚刚去世，李仲言还穿着丧服，难以公开入宫，于是，文宗便让他改穿平民服装，号称王山人，与郑注一起入内。李仲言身材魁梧，容貌清秀，潇洒豪爽，而且擅长文辞，口才流利，足智多谋。文宗见到他，大为喜悦，认为遇到天下奇才，因而对他的待遇日益隆重。

李仲言为母亲服丧期满以后，留在京师。大和八年（834年）八月，辛卯（十三日），唐文宗想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宰相李德裕说：“李仲言过去做的那种事，我想陛下一定全都知道，这种人怎么能安排到您的身边作侍从呢？”文宗说：“难道不允许一个人改过自新？”李德裕说：“我曾听说只有孔子的弟子颜回能不犯相同的第二次错误。颜回犯的错误是圣贤一时对问题考虑不周，偏离了中庸之道所犯的错误。而李仲言的过错，则是出自内心邪恶，怎么能改得了！”文宗又说：“李仲言是李逢吉向我推荐的，我已经答应，不想失信。”李德裕说：“李逢吉以前身为宰相，竟然不负责任地推荐李仲言这种奸人，以达到他危害国家的目的，所以，他也是罪人。”文宗说：“那么，就另外给他一个官职。”李德裕说：“那也不行！”文宗转过头看另一位宰相王涯，王涯立即回答说：“可以。”李德裕急忙摇手阻止王涯，正巧文宗转过头来，看在眼里，脸色十分不快，宣布退朝。在此之前，王涯听说文宗打算任用李仲言，急忙起草了一篇奏章，准备上疏劝阻，措辞十分激烈。后来，他看到文宗任用李仲言的态度很坚决，并且畏惧李逢吉党羽势力强大，因此，在文宗召集宰相讨论

此事时临时变卦。

不久,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国子监所属四门学校的助教,文宗召李仲言入内殿,面赐绯袍、银鱼。给事中郑肃、韩_愈封还诏书,驳回对李仲言的任命。这时,李德裕刚要走出政事堂,对王涯说:“幸好给事中封还诏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听后,随即召来郑肃和韩_愈说:“李德裕刚才留话,请你们二位不要封还诏书。”于是,二人署名通过。第二天,将此事报告李德裕,李德裕大吃一惊,说:“如果我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诏书,肯定会当面告诉你们,怎么会让别人传话!况且,给事中有行使封驳的权力和责任,难道还要向宰相请示吗?”二人这才明白被王涯欺骗,于是,满怀懊恼怅惘退出。

十月,甲午(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李仲言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入院之日,文宗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奏法曲,以示优宠。于是,给事中高铢、郑肃、韩_愈,谏议大夫李_益、郭承嘏,中书舍人高元裕、权璩等人共同弹劾李仲言,说他是奸邪之人,天下共知,不宜在皇帝身边作侍臣。但他们的意见没被文宗接受。

十一月,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隐然有训诲的寓意。

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谏议大夫郭承嘏多次上疏认为不可,文宗不听。于是,郑注上表,虚假地一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文宗又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郑注,郑注仍然不接受。

郑注天资狂妄,投机取巧,至于治国谋略,无可称者。最初,唐文宗召见郑注,向他访询使百姓富裕起来的方法,郑注提出实行茶叶专卖。其法,以江湖百姓茶园,由国家主持生产和销售,适当地给茶户一些报酬。文宗认为郑注的方案可

行,于是,命王涯兼管茶叶专卖。大和九年(835年)正月,郑注又上言朝廷,声称关中将要发生灾害,应征发劳役,大兴土木,以便消灾。唐文宗爱好诗歌,曾吟诵杜甫的诗句:“江头宫殿镇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以前,环绕曲江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中十分羡慕。现在,听郑注这么一说,立即命左右神策军派出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昆明二池,并允许公卿士大夫之家在岸边建立亭馆。当时,左右神策军在曲江岸边造紫云楼、彩霞亭,文宗亲自题写楼额以赐之。郑注所言,文宗无不听从。

大和九年(835年)四月,癸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这时才肯接受任命,可是,他又推荐强烈抨击他的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他说:“李款以前虽然弹劾过我,他强加到我头上许多罪名,现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那样做也是对圣上尽忠尽责。”听到的人都忍不住失笑,耻笑他假装宽宏大量。

当时,京城长安盛传谣言,说郑注为皇上配制长生不老的仙丹,必须用婴儿的心肝入药,说得绘声绘色,百姓为此而惊扰恐惧。文宗得知后十分恼恨。郑注一向憎恶京兆尹杨虞卿,于是,他和李训一起诬陷杨虞卿,说这谣言出自杨虞卿的家人之口。文宗大怒,六月,下令将杨虞卿逮捕,押在御史台狱中。此前,郑注曾经向宰相李宗闵要求做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没有答应,郑注因此在文宗面前诽谤李宗闵;而这时,正好李宗闵又竭力为杨虞卿辩解,文宗更是怒气冲天,呵斥李宗闵出宫。壬寅(初四),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七月,甲辰朔(初一),贬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这时,人们都纷纷议论郑注很快会被任命为宰相,侍御

史李甘在朝廷扬言说：“宰相是代替上天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官员，必须由德高望重并有才能的人担任。郑注是什么人，敢窃居此位？如果任命郑注为宰相的诏书颁出，我一定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它撕毁。”七月，癸亥（二十日），李甘因得罪郑注而被贬为封州司马。不过，李训也妒忌郑注，不希望让他当宰相，因此，郑注任宰相一事就被搁置下来。

七月，甲子（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国子监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诏书撰写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

八月，丁丑（初四），唐文宗任命太仆寺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喜好穿鹿皮缝制的衣服，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文宗把他作为老师、朋友看待。郑注开始得到文宗赏识的时候，一次，文宗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珣说：“你知道郑注这个人吗？有没有和他说过话？”李珣回答说：“我不仅知道他的姓名，而且深知他的为人。郑注是一个奸诈无比的小人，陛下宠信他，恐怕对陛下的圣德没有裨益。我作为陛下的亲信臣僚，怎么敢和这种人来往交结！”戊寅（初五），唐文宗贬李珣为江州刺史。

郑注在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时，是由中书舍人高元裕起草的任命制书，制书说郑注曾以医术精湛而侍奉皇上，郑注因此怀恨在心，向文宗奏称，李宗闵被贬时，高元裕曾出城到郊外为他送行。八月，壬寅（二十九日），唐文宗贬高元裕为阆州刺史。

郑注和李训对他们所厌恶的朝官都指控为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羽，每天都有人被贬逐。上朝时，百官的班列为之一空，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文宗也知道这种情况，郑注和李训担心被人控告，动摇自己的地位，于是，九月，癸卯朔（初一），二人劝文宗下诏宣布：

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台辅乖弼谐之道，而具僚扇朋比之风，翕然相从，实铢彝究。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咸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胙之气，堙郁未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肃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附之徒，匡飭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兹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以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①

诏令颁布以后，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李训虽然是通过郑注的推荐而被提拔起来的，但后来他的官职和权势日渐升高时，心中十分妒忌郑注。他表面上借口与郑注在朝廷内外互相配合谋诛宦官，所以建议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其实，李训另有阴谋，等到诛除宦官后，接着就诛杀郑注。于是，郑注向朝廷请求担任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同意。九月，丁卯（二十五日），唐文宗将李固言调出中央政府，让他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

郑注想聘用朝廷中出身名门世家并有威望才能的官员作为僚佐，以便壮大自己的声势。于是，邀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节度副使，韦温不同意。有人对韦温说：“你拒绝郑注的邀请，将来肯定后患无穷，你还是答应才是。”韦温说：“如果做两件事同样都不可避免遭受灾祸的话，那么，就应当选择较轻一点的灾祸。现在，我拒绝郑注的邀请，最多被他诬陷

^① 《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

贬逐到边远的地方,但如果接受他的邀请而跟随他,恐怕有难以预测的更大灾祸。”韦温终于拒绝了郑注的邀请。郑注又向李训请求僚属,李训和舒元舆打算以后除掉郑注,担心他的僚属会帮助他,于是选择朝廷中的一些忠厚长者作为他的僚属。以钱可复为节度副使,李敬彝为司马,卢简能、萧杰为判官,卢弘茂为掌书记。旧制,节度使受命,穿着戎服到兵部拜谒,这项制度后来逐渐废弛,郑注请求恢复。十月,乙酉(十三日),郑注前往凤翔赴任。这一天,由度支、京兆尹主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郑注向文宗辞行,文宗赐给他通天犀带。刚出京城的大门,旗杆折断,郑注心里很忌讳。

凤翔节度使李听自恃自己是为朝廷立有大功的老臣,对郑注不大礼貌。这时,郑注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代替李听的职务。于是,郑注先派牙将丹骏到凤翔慰问将士,随后,诬奏李听在担任凤翔节度使时贪污暴虐。十月,乙亥(初三),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

九月,己巳(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诏书撰写官、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并为同平章事。同时,命李训依照惯例仍然三两天进宫到翰林院一次,为文宗讲解《周易》。舒元舆担任御史中丞时,对于李训、郑注所厌恶的朝官,一律进行弹劾,因此,被任命为宰相。同时,文宗也鉴于以前李宗闵、李德裕担任宰相时结党营私,认为贾餗和舒元舆都是家世寒微而刚刚考中进士不久的朝官,所以擢任为宰相,希望他们不致朋比为党。

李训从一个被流放的罪人,遇赦回到京师,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宰相,文宗又对他非常信任。李训有时在中书门下省办公,有时在翰林院办公,朝廷的重大政务都由他决断。其

他宰相如王涯等人，只是看他的脸色行事，仍恐怕他不满意。上自神策军护军中尉、枢密使，下至禁军各级将领，见到李训无不震惊恐惧，迎拜叩首。

第二节 郑李策划，谋诛宦官

当初，宋申锡被贬官后，宦官更加骄横凶暴。唐文宗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内心已愤怒得不能容忍。李训、郑注既然深受文宗的宠爱信任，揣摸了解文宗的心思。于是，李训利用进宫给文宗讲解经典的机会，曾多次用敏感的言辞，试探打动文宗的心意，暗示文宗应下决心诛除宦官之事。一次，唐文宗在蓬莱殿看书，召来李训问道：“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朕览之久矣。战国时事，历历明白。朕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康佐云：‘穷究未精。卿谓如何？’”^①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之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②文宗感慨万分。李训又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③文宗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④李训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

① 《唐语林》第6卷，《补遗》。

② 《唐语林》第6卷，《补遗》。

③ 《唐语林》第6卷，《补遗》。

④ 《唐语林》第6卷，《补遗》。

此,天下幸甚!”^①

文宗看出李训反应敏捷,才能干练,能言善辩,认为可以和他商议诛除宦官。

同时,又因李训和郑注都是大宦官王守澄推荐的,估计和他俩商议大事,不会引起宦官的猜疑,于是,诚恳地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二人。文宗还担心宦官猜忌,让李训为《周易》注疏五条经义,颁示群臣,有能与李训解释不同的人,给予奖赏。文宗这样做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让朝廷的人认为文宗以老师、朋友的名分对待李训。

李训、郑注因此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二人相互依赖,昼夜商议对策,所提出的任何建议,文宗无不采纳。声势喧赫,震动天下。郑注经常留在宫中,有时休假在家,也是宾客盈门,他接受别人的贿赂财物堆积如山。外人只知道李训和郑注依靠宦官的权势擅自作威作福,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竟跟皇帝进行密谋诛除宦官。

李训、郑注为文宗拟定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第一步先铲除宦官,其次出兵收复西部河、湟失地,最后扫荡河北的割据藩镇。经营的方法及实施步骤,经探讨分析都有具体方略。文宗十分欣赏,对二人的宠爱和倚重,一天比一天增加。

宦官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也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唐文宗与李训、郑注正好抓住宦官的这一弱点,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当初文宗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右领军将军、身为宦官的循州兴宁县人仇士良曾经出力有功,可是,受到王守澄的压

^① 《唐语林》第6卷,《补遗》。

制,二人从此结怨。这时,李训、郑注替文宗设计,提拔仇士良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大和九年(835年)五月,乙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大不高兴。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宫中当权,与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因争权夺利,发生冲突。李训和郑注乘机劝文宗贬杨承和为剑南西川监军,韦元素为淮南监军,王践言为河东监军。八月,丙申(二十三日),唐文宗下诏斥责剑南西川监军杨承和当年曾袒护宋申锡的罪行,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和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在朝廷内外相互勾结,接受他们的贿赂。因此,都应加重处罚。杨承和流放■州,韦元素流放象州,王践言流放恩州,命令西川、淮南和河东分别派人,给他们加上脚镣手铐,装入囚车,押送到监管地区。不久,文宗又派宦官追踪而至,命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自杀。前枢密使崔潭峻已死,命剖棺鞭尸。

当年唐宪宗突然死去,宫中侍从都传说是宦官陈弘志谋杀的。现在,陈弘志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建议文宗召陈弘志回京。陈弘志走到陕西兰田县南青泥驿,九月,癸亥(二十一日),文宗派人携带刑杖,把陈弘志乱棍打死。

戊辰(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郑注为文宗筹划的策略:表面上提拔王守澄担任荣誉性的最高级军职,以表示对他的尊崇,实际上却是把他架空,剥夺了他的实权。李训、郑注又秘密地向文宗建议,请求诛杀王守澄。十月,辛巳(初九),文宗派遣宦官李好古送一瓶毒酒到王守澄家,命王守澄服下自杀。追赠

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他的弟弟王守涓时为徐州监军，召还京城，行至河南中牟县，被朝廷派人诛杀。

李训、郑注都是依靠王守澄的栽培提拔，才有今天高位，结果王守澄竟死在李训、郑注之手，所以，朝廷百官都为王守澄之死而拍手称快，同时对李训和郑注的阴险狡诈，忘恩负义，也至为痛恨。这样，元和末年年谋害唐宪宗的叛逆宦官几乎被诛除干净。

唐文宗与李训、郑注密谋消灭了元和末年叛贼逆党，反对宦官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了进一步打击宦官势力，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唐文宗与李训、郑注又密谋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诛除宦官的斗争，即甘露之变。

为了统一朝廷百官反对宦官的力量，唐文宗决定全力支持、依靠李训和郑注，并以他俩为核心，组织一支反宦官的队伍。文宗所以信任李训、郑注，一是认为他俩有胆有识，与自己志同道合，能帮助自己实现诛除宦官的大计，二是认为他俩都是因王守澄而进，与他俩谋事不至于引起宦官的猜疑。但是，消灭宦官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仅依靠李训、郑注二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文宗的支持下，李训、郑注又拉拢了一批朝官，作为反对宦官斗争的骨干力量。

当初，宋申锡和御史中丞宇文鼎一同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郑注的密诏，二人派京兆尹王璠去逮捕郑注。王璠把逮捕令秘密地告诉王守澄。于是，郑注得以逃脱，因而他十分感激王璠。王璠又和李训关系密切，于是，郑注和李训一起向文宗推荐王璠，王璠因此从浙西道观察使被召入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丞。后又转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京兆尹贾餗性情暴躁轻率，心胸狭窄。他和李德裕有矛盾，而和李宗闵、郑注关系亲近。上巳（三月三日），唐文宗在

曲江举行宴会，招待文武百官。按照惯例，京兆尹应当在大门外下马，向御史台官员行礼作揖，然后进门。贾餗依恃他的地位和权势，骑着马一路直闯而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和他争论起来，贾餗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黄脸儿怎么敢挡我！”因此被御史弹劾，扣罚俸禄。贾餗觉得受到羞辱，请求出任藩镇节度使。文宗下诏，任命他为浙西道观察使。但还没有动身，唐文宗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著作郎、分司东都舒元舆和李训关系密切，李训掌权后，推荐舒元舆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负责审问杨虞卿的案件。大和九年（835年）七月，癸丑（初十），舒元舆被提拔为御史中丞。九月，己巳（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同平章事。唐文宗认为贾餗和舒元舆都是家世寒微而刚刚考中进士不久的朝官，所以破格提拔他们担任宰相。

八月，己亥（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寺少卿。罗立言是一个贪官污吏，他用贿赂结交郑注，才得到这个职位。

九月，壬申（三十日），唐文宗任命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暂时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是皇室子弟，投靠李训、郑注，才得到提拔。

十月，庚子（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其他职务仍旧不变。这时，李训所推荐提拔的官员，大多是急进冒险之徒。但他们有时也推荐一些在朝廷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辈，如裴度、令狐楚、郑覃，都是几朝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很久以来，被当朝权贵所排挤，安置在闲散的位置上而无所事事。现在李训推荐他们担任要职。因此，不仅文宗被李训和郑注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且连士

大夫也有不少人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辅佐皇上达到天下太平。然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看到他们那么骄横傲慢，不可一世，认为他们肯定要失败。

十一月，丙午（初五），唐文宗任命大理寺卿郭行余为珪宁节度使。癸丑（十二月），任命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十六日），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戊午（十七日），任命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京兆少尹罗立言暂时处理京兆府的政务。己未（十八日），任命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最初，郑注和李训商议，待郑注到凤翔上任后，挑选几百名壮士，每人携带一根白色棍棒，怀揣一把利斧，作为亲兵侍卫。二人约定在十一月戊辰（二十七日）这一天，朝廷在虢河旁埋葬王守澄时，由郑注奏请文宗批准他率兵护卫葬礼，于是便可带亲兵随从前往。同时，奏请文宗命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到虢河旁为王守澄追悼送葬。就在这时候，郑注下令关闭墓门，命亲兵用利斧砍杀宦官，一个不留。计划确定以后，李训又和他的同党密谋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诛除宦官的功劳就全部归于郑注。不如让郭行余和王璠以赴珪宁、河东上任为名，大量招兵买马，作为亲兵，同时调动韩约统领的金吾兵和御史台、京兆府官吏和士卒，一齐发动，先于郑注一步，在京城先动手诛杀宦官，随后，再把郑注除掉。”珪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璠、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京兆少尹罗立言和御史中丞李孝本，都是李训所信任的心腹，所以，任命他们担任要职。李训只和这几个人以及宰相舒元舆密谋，其他朝廷百官都一概不知，万事安排妥当，择日发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唐文宗登

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例行奏报平安，却慌慌张张地奏道：“在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晚天降甘露，这是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德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昨晚，我已通过守卫宫门的宦官向皇上报告。”说完以后，韩约手舞足蹈给文宗叩头称贺，宰相也率领百官向文宗祝贺。李训、舒元舆乘机劝文宗立即亲自前往观看，以便承受上天所赐予的祥瑞，文宗欣然同意。接着，文武百官退下，列班于含元殿。辰时刚过，文宗乘软轿出紫宸门，到含元殿升朝，先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李训回奏说：“我和众人去检查过了，似乎不像是真正的甘露，不应该匆忙地对外宣布这件事，否则，恐怕天下的臣民就会向陛下祝贺。”文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随即命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众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

宦官走后，李训急忙召集郭行余、王璠等人，说：“快来听候圣旨！”王璠紧张得两腿发抖，不敢上前，只有郭行余一人拜倒在含元殿下接旨。当时，二人招募的亲兵几百人都手拿武器，立在丹凤门外等待命令。李训已经事先派人去叫他们来含元殿前，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宦官的命令。结果，只有王璠的河东兵来了，而郭行余的珪宁兵竟没有来。

仇士良率领众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正好遇见韩约，韩约紧张过度，脸色改变，汗流满面。仇士良觉得很奇怪，便问：“韩将军，你怎么啦！”话音刚落，一阵大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发现里面藏着很多手拿武器的士兵，又听到有武器碰撞的声音。仇士良等人大吃一惊，急忙往外逃走，守门的士卒正要关门，仇士良大声呵叱，门没有关上。仇士良等人慌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他气喘嘘嘘地对文宗说：

“宫里要发生暴乱了！情况紧急，请陛下赶快回宫！”李训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对他们说：“快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一百缗！”宦官立即抬起软轿，搀扶文宗上轿，冲破宫殿后面的丝网，出含元殿向北急走。李训上前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说：“臣奏事还没有完，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说：“李训不可能谋反！”仇士良根本不听，抢步上前来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在地。随后李训从靴子里拔出匕首，正要刺杀仇士良，可是被宦官救走。这时，罗立言率领京兆府担任巡逻任务的士卒三百多人从东面赶来，李孝本率领御史台随从二百多人从西面赶来，会同金吾士卒，一齐登上含元殿，挥刀击杀宦官，宦官大声喊冤，血流满地，死伤十余人。仇士良命令宦官在外面抵挡，自己引文宗急奔宣政门。李训在后面追赶，拉住文宗的软轿不放，大声呼喊停下。唐文宗呵斥李训住口，宦官彦志荣颇有勇力，乘机挥拳猛击李训的胸脯，李训栽倒在地。宦官把文宗抬进宣政门，等李训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宣政门已经关闭，只听门内宦官都高呼万岁。

这时，站在含元殿上的文武百官看到眼前的突发事变都目瞪口呆，接着四散奔逃。李训见文宗已入后宫，知道大势已去，只得找一脱身的方法，急忙换上随从官吏的绿色衣衫，骑马奔出宫门而逃，一路上他佯装疯颠，大声扬言说：“我犯了什么罪而被贬逐！”因而人们也不怀疑他，竟从宫中逃出。郭行余、王璠两人，见大势已去，早已奔退。罗立言、李孝本等人，见李训已逃远，料想事已无成，也各自逃命。含元殿中，寂静无人。这时，李家的天下，又变成了阉宦的天下。

宰相王涯、贾餗，本来没有参与李训的密谋，看到含元殿中发生的事变，一时摸不着头脑，仓促间回到中书省，静候消

息。宰相舒元與也回到中书省，佯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对王涯、贾餗说：“究竟是什么人谋反？我想皇上过一会儿就会开延英殿，召集我们商议。”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都来问宰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位宰相都说：“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请自便吧！”

仇士良等宦官这时已发现文宗竟然是这次屠杀宦官的幕后指挥者，十分愤恨，在文宗面前出言不逊，文宗既羞愧又惧怕，不敢作声。于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持刀露刃，从紫宸殿冲出，逢人便杀。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午饭，忽然有一官吏前来报告，说：“有一大群人马从宫中冲出，逢人即杀！”舒元與闻讯先逃，王涯、贾餗也来不及骑马步行，狼狈逃走。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吏和金吾卫的士卒一千余人争先恐后逃命。不一会儿，大门被关上，尚未逃出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所有皇城大门，搜查南衙各司，逮捕贼党。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以及正巧在里面的商贩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各司的印信、图书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品全被捣毁，抄掠一空。仇士良等人又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捕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进行严密搜捕。

舒元與换上平民衣服，单身骑马逃出安化门，被骑兵追上，生擒活捉。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总部。王涯已七十多岁，年迈体衰，被戴上手铐脚镣，严刑拷打，哪能忍受得住！王涯虽然没有参与李训的密谋，但在重刑逼供之下，无法忍受痛苦，只好自诬说，他和李训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推翻文宗，拥立郑注登基。王涯逃回长兴里私宅，紧闭大门，用招募的亲兵防守。神策军

将前来搜捕，到了他家门口，叩门不应，便佯装喊道：“王涯等人谋反，皇上打算命你接任宰相，我等奉护军中尉鱼弘志之命，请你立即入阁，快快出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王■听后信以为真，大喜过望，急忙开门相迎。神策军将再三向他祝贺升迁，请他上马速行。及与左神策军相近，才将他从马上一把抓下，加上铁链。王■这时才发现上当受骗，流着眼泪到了左神策军总部。他看到王涯等人也被抓到这里，便对王涯说：“你自己谋反，为什么要牵连我？”王涯说：“你过去担任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诛除宦官的计划泄露给王守澄，哪里会发生今天的事！”王■自知理亏，低头说不出话来。神策军在太平里逮捕了罗立言，又逮捕了王涯等人的亲属奴婢，都囚禁在左、右神策军中。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堂弟，其实李训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也被抓去杀死。已故前岭南节度使胡证是京城巨富，家产亿万，素与贾■关系很好，禁军打算抢夺他的财产，借口他的儿子胡■藏匿贾■，于是，到他家进行搜查，一日之内，家财并尽，胡■也被抓入左神策军中斩首。胡■的弟弟胡湘，时为太原从事，忽然在大白天看见一个没有脑袋的绿衣人，血流满地，进入室中。胡湘很忌讳。次日，胡■被杀的凶讯传来，而胡湘得以幸免。禁军又到左散骑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中抢夺财物，像扫地一样，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这时，京城的地痞流氓也乘机报平日的私仇，随意杀人，剽掠商人和百姓的财物，并且相互攻击，整个京城杀气腾腾，尘埃四起，漫天蔽日，一片混乱。

癸亥（二十二日），文武百官进宫早朝。直等到太阳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而立。到

宣政门时,大门还没有打开。当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秩序混乱,不能排列就位。文宗登紫宸殿,问:“宰相为什么不来?”仇士良回答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逮捕入狱。”接着,把王涯的供词呈递给文宗,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让他俩审视王涯的供词。文宗悲愤得几乎无法克制,问令狐楚和郑覃说:“这是不是王涯的亲笔手迹?”二人回答说:“是!”文宗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罪不容诛!”于是,文宗命令令狐楚和郑覃留在政事堂,参与决定朝廷的机要政务。同时,又命令令狐楚起草诏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的事情经过昭示朝廷内外。令狐楚在诏书中叙述王涯、贾餗谋反的事实时,用词空洞泛泛,不涉及要害问题,仇士良等人对此大为不满,为此,令狐楚失去被提拔为宰相的机会。

当时,京城街坊和集市中的劫掠事件仍未停止。朝廷命令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主要街道的路口和闹市,擂动街鼓警告匪徒,不准再扰乱京城秩序,并且杀死十几个带头闹事的人,余众方才骇散,京城这才安定下来。

贾餗换上民服,潜藏在一个百姓家里。住了一夜,看到各处都有禁兵把守,天地虽大,料想实在无法逃脱,便换上丧服,骑驴到兴安门,向守门人投案自首说:“我是宰相贾餗,受奸臣牵连,请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到左、右神策军去吧!”守卫士卒随即把他押送到右神策军中。

李孝本虽然穿六、七品官员的绿色衣服,但仍旧系着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用的金腰带,用帽子遮着脸,一个人骑着马直奔凤翔,打算投靠郑注。走到咸阳城西,被追兵认出擒获,押解到京师。

李训从宫中逃出后，直奔终南山。因为他素与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十分亲密，所以前去投奔。宗密准备为李训剃发，让他装扮成和尚，躲藏在寺院中。但宗密的徒弟们都不同意，认为私藏罪犯，必将招致大祸。李训无奈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奔郑注。途中，被胥县镇遏使宋楚抓获，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派人押送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训恐怕送到神策军后遭受毒打和羞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听说禁军到处搜捕我，他们肯定会从你们手中把我抢走领功。你们不如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京城请赏。”押送他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割下李训的首级送往京城。

仇士良因宗密容纳李训，派人将宗密抓来，押到左神策军中，谴责他不告发李训的罪责，将要处死他，宗密神态自若，平静地说：“贫僧认识李训已经多年了，也知道他谋反。然而，佛门之法，遇到有苦难的人，即要救援，不能爱惜自己的性命，死亦甘心！”中尉鱼弘志很欣赏宗密的为人，上奏文宗，释放了他。

甲子（二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郑覃为同平章事。乙丑（二十四日），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命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官复原职。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暂时代理京兆尹。在这几天之内，朝廷的大政方针，包括处决罪犯和任免官员，都由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决定，文宗事前根本都不知道。

乙丑（二十四日）左神策军派士卒三百人，高举李训的人头为前导，押解王涯、王□、罗立言和郭行余四人；右神策军派士卒三百人，押解贾餗、舒元舆和李孝本，一起前往皇家祖

庙和祭祀农神地神的太社，像呈献牲畜一样，举行呈献仪式。押解到东市、西市，游街示众，命文武百官前往观看。最后，在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把他们一一腰斩，砍下人头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李训等人的亲属家人，不管亲疏远近，一律处死，连怀抱中的婴儿和无知的儿童也一个不留，妻子女儿逃过一死的，也都被收为官奴婢。百姓怨恨王涯增加茶税，围观中有的人大声怒骂，有的人拿瓦片石块往王涯身上投击。王涯的儿子、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孟坚，太常博士仲翔，以及其余幼小妻女，连襟系颈，送入两军，无论老少全都处死。自王涯以下十一家，财产全部被军卒所分。王涯积累家财巨万，两军士卒及市人任意掠取，竟日不尽。王涯家中藏书数万卷，前代的书法名画都藏在墙壁之中，也都被人们破墙劫走。

176

王涯之死，人以为冤，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疏，为王涯等人鸣冤，求示王涯等三宰相罪名。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说：

凡是谈论甘露之变的人都认为，王涯、贾餗都有文学素养和很高声望，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李训、郑注企图诛除宦官的密谋，但最后却意外地惨遭灭族的横祸，都为他们感到悲愤，为他们所受的冤枉而叹息，我却认为并不是如此。作为宰相，当国家出现颠覆危机的时候，不能奋起挽救扶持，还要那种宰相干什么！王涯、贾餗安然地身居高位，饱享荣华富贵；而李训、郑注一伙小人，奸诈阴险，达到极点，最后终于窃取节度使和宰相职务。王涯、贾餗和他们一起共事，不以为耻；国家危难，不以为忧，苟且偷生，日复一日。自以为得到明哲保身的万全良策，谁都没有他聪明！假如人人都像他们那

样，而竟然无灾无难，那么，奸佞之辈谁不愿意去做！然而，想不到刹那间祸患发生，鼎足折断，食物四散，就不免暗室受刑，家破人亡。我认为，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仇士良怎么能够轻易地灭他们全族呢！

王涯有一个远房堂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年迈而家贫如洗。听说王涯官居宰相，于是，千里迢迢骑着毛驴来到京城，投奔王涯，打算谋求一个县主簿或县尉之类的小官。逗留长安两年有余，才见到王涯一面。王涯对这个远房堂弟十分冷漠，过了很久，王沐通过王涯的亲信家奴才说出自己的请求，王涯同意派他一个小官。从此以后，王沐每天早晚都要到王涯家中等候消息。禁军逮捕王涯全家人时，王沐正好也在那里，于是和王涯一起被腰斩。

舒元舆有一个堂侄名叫舒守谦，非常聪明，而且又很老实，处事谨慎，舒元舆十分喜爱他，舒守谦跟随叔父十年之久。有一天，他并没有犯错，舒元舆忽然对他大发雷霆，以后每天都斥责他，连舒元舆家的奴婢也鄙视他。舒守谦内心十分不安，请求返回江南故乡，舒元舆也不挽留，舒守谦悲伤惆怅，告辞而去。当天晚上，舒守谦走到昭应县，听到舒元舆全家被杀的消息，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

王□从前在浙西任观察使，修缮润州城壕时，役人掘得方石，上刻有十二个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王□看了不知其意，京口有一老者为他解释说：“此石非尚书之吉兆也。尚书祖名攸，攸生泗，是山有石也。泗生尚书，是石有玉也。尚书之子名遐休，休，绝也。此非吉征。”^①王□在甘露之变以后被灭族，果然应验。

^① 《旧唐书》第169卷，《王□传》。

贾餗年少时与沈传师为友，传师先死，曾托梦对贾餗说：“你大概活不长了！”贾餗醒了以后，前去沈传师的墓前祭拜，又梦到沈传师说：“事情已经如此，没有办法！”贾餗果然于甘露之变后被杀。

此前，郑注按照事先和李训约定的时间，率亲兵五百人从凤翔出发，到达扶风县。扶风县令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因此，拒绝接待，携带县官印信，率领县政府大小官员、士卒逃奔武功县。这时，郑注得到李训政变失败的消息，于是，又折回凤翔。仇士良等派人携带文宗的密旨，交给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诛杀郑注。张仲清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押牙李叔和建议说：“不用担心，我以您的名义用好言好语召来郑注，然后设计调开他的亲兵，在座席上就可以把他杀死，叛乱即刻就能平定。”张仲清点头同意，于是，设下伏兵等待郑注。

郑注的部将魏弘节劝郑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中等十余人，郑注惊慌失措，无心听取劝告，又依恃他的亲兵保护，应邀拜会监军张仲清，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留在门外予以款待，只有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监军使院。张仲清迎接郑注进入客厅，格外殷勤，宾主落座饮茶。郑注正与张仲清叙谈时，李叔和藏刀入厅，抢前一步接近郑注，抽刀猛挥，只听“唿”的一声，郑注的脑袋已经落地。厅后，伏兵突出，拿着大刀阔斧，跑出厅外，专杀郑注的随从亲兵。门吏又将大门关上，将郑注的五百名亲兵，杀得一个不留。此时，张仲清出示文宗的密敕，向将士宣布。接着，杀死郑注全家男女老幼，以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 and 他们的同党，共一千多人。钱可复有一个女儿，年仅十四岁，她抱住父亲的身体，请求不要杀他的父亲，张仲

清不答应,只令免她一死。她难过地说:“我父被杀,我还有什么脸面求生!”于是,她与其父同时被杀。卢弘茂的妻子萧氏,临刑前又哭又骂道:“我是萧太后的妹妹,你们这帮奴才敢杀我,尽管从便!”此话一出,士卒都不敢动手了,她才幸免一死。郑注的妻兄魏逢,帮助郑注为奸,多次贪污行贿,当上率更令、凤翔少尹。甘露之变前,去京城与李训联络,正值事变,被杀。

这时,朝廷还不知道郑注已经被杀,丁卯(二十六日),文宗下诏剥夺郑注的所有官职和爵位,京城宣布戒严,命令与凤翔相邻的泾原、邠坊节度使王茂元、萧弘紧急戒备,密切注视凤翔城中的动静,以备不测。同时任命左神策军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

戊辰(二十七日)夜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人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仇士良令将其挂在兴安门上示众,人心稍微安定,京师各军才各自回营。接着,籍没郑注的家产,得绢一百万匹,还有许多其它财物。

还有一个韩约,逃跑躲避了几天。戊辰(二十七日)夜半潜出崇义坊,被神策军看见,一把抓住,当即押送到右神策军中。己巳(二十八日),斩韩约。至此,发动甘露之变的全部朝官都被宦官一网打尽,残酷屠杀。

唐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的有功人员,各根据功劳的大小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仇士良、鱼弘志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的大小升迁官位和级品。从此以后,凡朝政大事都由“北司”的宦官决定,“南衙”宰相只不过照发公文而已。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上胁迫天子,文宗已是木偶一般,能够保全性命,已是万幸;对下鄙视宰相,凌辱百官如同草芥。每次在延英殿讨论政事,

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谋反的事折辱宰相。郑覃、李石反击说：“李训、郑注的确是谋反的头目，但他们最初究竟是由谁推荐提拔起来的呢？”仇士良等人哑口无言，宦官的嚣张气焰逐渐有所收敛。朝廷的百官由此都依赖宰相郑覃和李石。

当时，政事堂只剩下空房破屋，办公用品荡然无存，连桌椅都没有。江西、湖南两道奉献一百二十人的衣粮，供宰相重新招募随从警卫。辛未（三十日），李石上疏拒绝说：“如果宰相忠心耿耿，那么，神灵就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即使遇上盗贼，也不可能受到伤害。但如果宰相心术不正，即使警卫严密，也会被鬼神诛杀。我愿意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因此，请求按照过去的惯例，由金吾士卒作为导从也就足够了。对于江西、湖南两道奉献的衣粮，请求停罢退回。”文宗表示同意。

十二月，庚辰（初九），唐文宗向宰相说：“最近，京城的大街小巷和集市的秩序是不是已恢复平静？”李石回答说：“逐渐安定了。不过，最近几天天气特别寒冷，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郑覃说：“罪犯的所有亲人都已被杀，其余的人恐怕不应该再问罪了。”

当时，宦官对李训等人恨入骨髓，凡是和李训稍有一点瓜葛的亲友，或者曾经被他们推荐提拔过的人，都横加诛杀或贬逐，不肯放过，所以，两位宰相向文宗谈及此事。

当初，王守澄厌恶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禔等人。李训、郑注乘机建议文宗派遣他们分别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去巡视边防。等他们出发后，郑注命翰林学士顾师邕起草诏书，下令盐州等六道杀掉田全操等六人。不料李训失败，六道接到诏书后都未

执行。十一月，丙寅（二十五日），仇士良等人认为顾师邕伪造诏书，假传圣旨，把他逮捕，押到御史台监狱。十二月一日，把顾师邕流放儋州，走到兰田，文宗下诏命他自杀。

李训、郑注死后，仇士良等下令召六道巡边使回京。田全操等人追究李训、郑注企图谋杀他们的罪责，在回京途中扬言说：“等我们回到京城后，凡是看到穿读书人衣服的，不管他是官是民，都全部杀光！”十二月，癸未（十二日），田全操等人乘驿马急速驰入长安西城北头的金光门。京城居民大为惊恐，有谣言说，盗贼攻进城中，官吏和百姓不明真相，呼号狂叫，四处奔逃，尘埃四起。朝廷各机关的官员听到谣言后，也一哄而散，有人甚至来不及系上腰带、穿上袜子，跳上马背就狂奔而去。

这时，郑覃和李石正在政事堂办公，看到手下的官吏和士卒渐渐逃去，郑覃对李石说：“现在外面的情况很乱，人心难测，最好暂且出去躲避一会儿。”李石说：“宰相的地位尊贵，责任重大，一举一动，都为天下人所瞩目，不可轻举妄动。现在，实际情况还不了解，只有坚定地坐镇不动，才有可能安定人心。如果连宰相也惊慌失措，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大乱。何况真有灾祸，逃也逃不脱！”郑覃表示同意。李石继续坐在政事堂批阅公文，神情自若。

这时，朝廷的敕使不断传来命令说：“立即关闭皇城各城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士卒站在大明宫南面的望仙门下，对敕使说：“等盗贼来了再关闭城门也不晚。现在应当冷静地观察情况的变化。不要露出恐惧的样子。”直到黄昏以后，京城的骚乱才停息。当天，京城街坊和集市的地痞流氓都穿着大红色或黑色的衣服，手拿弓箭、刀枪，向北眺望，盯着皇城，只等皇城门关闭，就下手大肆抢掠。如果不是李

石和陈君赏镇定不移,京城几乎再度陷入大乱。当时,中书、门下两省值班的官员,临走时向家人告辞,都认为不可能再回家了,就好像永别。

十二月,丁亥(十六日),唐文宗下诏说:

凡李训等叛逆人的亲属党羽,除此前已经被杀和朝廷仍在通缉中的,其余一概不再追究。南衙各司的官员,虽然被迫追随李训而受到牵连,一律予以赦免。任何人不得再进行揭发控告,或者加以恐吓。逃亡在外躲藏的官员,也一律不再追捕,必须在三天之内回到本司。

此诏一下,天日稍开,阴霾渐散。只是禁军仍然骄横暴虐,无视国法。京兆尹张仲方,素来懦弱,眼看人民饱受欺凌,却不敢过问。宰相因他不称职,改派他出任华州刺史,另以司农卿薛元赏接任京兆尹。薛元赏刚直不阿,饶有气节。一次,薛元赏偶然来到李石家中,听到李石正坐在厅中和一人大声争吵。薛元赏派人察看,说是有一个神策军将正在向李石上诉事情。薛元赏急忙走入厅中,责备李石道:“您作为宰相辅佐皇上,治理天下,但现在却不能制服眼前的一个军将,让他这样对您无礼,那么,您还凭什么去镇服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呢?”说完以后,转身匆匆出去上马,命左右侍从擒拿那名军将,押到下马桥待命。等薛元赏来到时,军将已被剥掉衣服,跪在地上。军将的同党向仇士良报信,仇士良派宦官召薛元赏,说:“中尉叫你屈驾过去相见”薛元赏说:“我这里有公事在身,等办完后马上去。”于是,把那个神策军将用刑杖打死。随后,薛元赏穿着待罪的白色衣服,去见仇士良。仇士良说:“你这个傻书生,怎么竟敢杖杀我禁军的大将!”薛元赏回答说:“中尉是朝廷大官,宰相也是朝廷重臣。如果宰相的部下对您无礼,您该如何处置呢?您的部下对宰

相无礼，难道可以饶恕他吗？您和朝廷的关系，如同手足一体，应当尊重朝廷的法律。现在，我已经穿着罪犯的囚衣而来，是死是活，由您决定。”仇士良得知军将已死，也无可奈何，又见薛元赏理直气壮，反而转怒为喜。于是，叫人摆上宴席和薛元赏高高兴兴地对饮起来，尽欢而散。

从前，宰相武元衡被刺，皇帝命宫廷军械库拿出弓箭、佩刀，发给金吾卫士卒，要他们负责宰相的安全，从家门口一直护送到建福门才退，现在，全部撤消。

第三节 甘露之变，历史反思

甘露之变是文宗朝以李训、郑注为首的朝官在文宗的支持下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的一场生死大搏斗。结局是李训、郑注彻底失败，横尸阙下，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气焰更加嚣张。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局？

一是李训、郑注有轻视宦官的麻痹思想。

在甘露之变以前，宦官陈弘志被杖杀，王守澄被鸩死，元和逆党诛除殆尽。李训、郑注被反宦官斗争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下一步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宦官一网打尽。其实，陈弘志和王守澄之死，对于仇士良等人来说，虽说有兔死狐悲之感，但也产生了某种警觉。李训、郑注视仇士良无异于陈弘志和王守澄，本想一举消灭宦官，结果反遭杀身灭族之祸。

二是李训求胜心切，起事仓促，准备不足。

宦官的势力根深蒂固，且又拥有禁军，诛除宦官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李训发动甘露之变仅与舒元舆、郭行余、王□、

韩约、罗立言、李孝本几个人密谋，而且部署不周，直至仇士良等人视甘露之时，方召王□、郭行余来受敕旨。韩约的伏兵隐蔽不好，风吹幕起，又有兵器相撞之声，因而惊走仇士良等人。如果事先检查周密，必不会发生如此漏洞。在起事之前，李训虽然命令郑注、王□、郭行余等人多募壮士，结果募得既不多（在甘露之变中，仅有五百人），且又未经训练，仓促上阵。李训原来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里应外合在虢河边起事，但又怕郑注抢了头功，于是，李训临时改变计划，先于郑注一步，提前五天在京城发动甘露之变。起事仓促，图功急战，焉能不败。

三是李训用人不当。李训在甘露之变中所用的几个人，无一是可以与共举大事者。韩约懦弱怯阵，见到仇士良等人“变色流汗”。在紧急关头，李训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呼叫，而罗立言、李孝本竟未能率众一拥而上，杀退劫持文宗的宦官而夺回文宗。最不该用者就是王□。在此之前，宋申锡为相，文宗与其谋诛宦官，宋申锡以王□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王□竟“泄其谋”，而宋申锡被贬。这次甘露之变中，王□紧张得两腿发抖，不敢接旨。用这些人欲成大事，岂有可能！

四是屡失良机，放走仇士良。仇士良到了左金吾厅院内，此时幕后伏兵，就该一齐杀出，但韩约已吓得目瞪口呆，伏兵仍然伏而不动。仇士良等人发现伏兵，惊骇而走，此刻伏兵齐出，仍来得及，而伏兵仍旧蒙在幕里。仇士良等人冲出大门，跑回含元殿向文宗告变，李训全力抓住文宗的软轿不放，大声呼喊，而罗立言、李孝本却没有率兵冲上去，竟让仇士良逃走。

五是李训孤军奋战，缺少外援。李训在甘露之变中确实勇敢无比，但他的“攀舆”、“大呼”始终是一人，没有人配合

他。当时,李训的兵多,阉党人少,如果李训的士卒齐声呐喊,既可壮胆,又可形成强大的声势。可惜那五百“壮士”竟连呼喊的勇气都没有,只有李训一个人在那孤军奋战,甚至被宦官打倒都得自己爬起。另外,李训在京城举事,首先应与凤翔的郑注联络,使得里应外合。但起事之初,郑注竟不知,及其率五百骑至扶风时,“闻训败乃还”,竟被监军所杀,“兵皆溃去”。李训不仅应与郑注密切配合,也应取得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声援。

李德裕评李训失败的原因说:

夫举大事,非北门(指禁军)无以成功,此所谓天下之常势也。李训因守澄得幸,虽职在近密,而日夕游于禁中,出入无碍,此时挟守澄之势,与天子契若鱼水,北军诸将望其顾盼,与目睹天颜无异,若以中旨谕之,购以爵赏,即诸将从之,势如风靡矣。训舍此不用,而欲以神州灵台游徼搏击之吏、抱关拥彗之徒,以当精甲利兵,亦犹霜蓬之御烈火矣。赖中人觉其变,未及其乱,向使训计尽行,所诛者不过侍从数百人而已,其徒尚数千人,与北门协力抱怨,则天下横流矣。^①

李训发动甘露之变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两《唐书》的作者都认为李训、郑注为“小人”。刘响说:“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②郑注“诡辩阴狡”^③。宋祁说:“李训浮躁寡谋,其死宜哉!”^④郑注为“斩斩小人”^⑤。两

① 《会昌一品集》外3,《奇才论》。

② 《旧唐书》第169卷,《李训传》史臣曰。

③ 《旧唐书》第169卷,《郑注传》。

④ 《新唐书》第179卷,《李训传》史臣曰。

⑤ 《新唐书》第179卷,《李训传》史臣曰。

位史家以这种偏见为李训、郑注作传,当然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诋毁李训、郑注为“小人”。只有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认为李训、郑注都是“奇士”。可见史家的观点不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同。

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唐朝自玄宗以来,宦官的势力不断膨胀,上胁天子,下凌群臣,百官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李训、郑注敢于向宦官斗争,这种冒险犯难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种精神正是中晚唐的时代所急需的。裴度征淮西时曾说过:“主忧臣辱,义在必死 贼未授首,臣无还期。”^①宪宗听后为之感动流泪。李德裕对武宗说:“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②,“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③正是靠这种精神取得了割据藩镇斗争的胜利。李训、郑注看到“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而决定向宦官发难,虽然没有擒斩仇士良,将宦官一网打尽,但李训在甘露之变中与宦官搏斗的英勇表现,可谓勇士、斗士。事败以后,死得也很从容,毫无畏惧。况且,在甘露之变前夕,李训、郑注合力杖杀陈弘志,鸩死王守澄,元和逆党基本上被肃清,因之而得以告慰于先帝,并借以取信于文宗。这样的人如果称为小人,那么,那些阿谀奉迎宦官的人就是君子吗?文宗虽然是一个懦弱的君主,但他信任李训、郑注,在一年之内就提拔李训当了宰相,并委以谋诛宦官的重任,可见文宗独具慧眼而识奇才。文宗曾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

① 《新唐书》第173卷,《裴度传》。

② 《旧唐书》第174卷,《李德裕传》。

③ 《新唐书》第180卷,《李德裕传》。

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①李训、郑注的确不愧为奇才。李训精通《周易》,为文宗讲解《周易》的微言大义,“颇叶于上意”,时方盛夏,而文宗不知疲倦,竟听得入了迷。李训、郑注二人都思维敏捷,颇工文辞,有口辩,为文宗制定了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的治国方略。这一方案是切中时弊切实可行的。如果甘露之变成功,而依次实施这个方案,也许会出现“大和中兴”。怎么能说李训、郑注“浮躁寡谋”、“意果而谋浅”呢?

李训、郑注不仅敢于向宦官斗争,而且也善于向宦官斗争。为消灭弑杀宪宗、敬宗的宦官逆党,二人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办法。首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散宦官的力量。宦官仇士良有拥立文宗之功,但他受到王守澄的压制,于是,李训、郑注向文宗建议,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原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宫中当权,与王守澄争权不和。李训、郑注又乘机向文宗建议,出杨承和为剑南西川监军,韦元素为淮南监军,王践言为河东监军。随后不久又将他们流放到边州,最后,令他们自杀。接着,李训建议文宗召回杀害宪宗的凶手,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行至青泥驿,被朝廷派人杖杀。李训、郑注又建议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名义上尊崇王守澄,实际是把他架空,剥夺他的兵权。宦官的力量分散以后,王守澄便孤立了,于是,文宗得以轻而易举地鸩死王守澄,元和逆党殆尽。第一步谋诛宦官的行动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于是,开始第二步除宦行动,发起甘露之变,可惜功亏一篑。王夫之说:“文宗进李

^① 《新唐书》第179卷,《李训传》赞曰。

训、郑注而谋诛内贼，非尽不明也”（《读通鉴论·十四》）。能除天下大害，就是功臣，尽管没有全部完成诛除宦官的任务，但其功劳是不能抹煞的。

李训、郑注所以被一些史家斥为“小人”，主要是因为李训“背守澄而劝鸩”。李训、郑注虽为王守澄所荐引，最后竟杀死王守澄，可见二人亦善恶分明，并非与宦官同流合污之人。李训、郑注谋诛宦官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背叛王守澄不能算是反复小人，鸩杀王守澄也不能说是阴险。如果说李训“因郑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故出注于凤翔”，则认为李训反复无常，也不尽然。李训正是“谋中外协力以诛宦官”，是有意安排郑注出为凤翔节度使，以便里应外合，后来事实也证明二人都是为消灭宦官而合作的，并且都为国捐躯。

当然，郑注以医术得宠，初期依靠王守澄，招权纳贿，诬陷宋申锡，做了一些坏事。他的人格、才学、能力均无法与李训相比。但他后期与李训以诛除宦官为己任，通力合作，几乎成就消灭宦官之大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谈谈文宗与甘露之变的关系。

从唐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文宗是直接参与了甘露之变的谋划，是幕后总指挥，而李训、郑注等人只不过是前台表演的悲剧人物而已。

据《新唐书》第二〇七卷《仇士良传》记载，甘露之变以后，仇士良、鱼弘志怨恨唐文宗与李训等人密谋，诛除宦官，多次想废黜文宗。崔慎由为翰林学士，一次夜里在宫中值班，有中使召入，至一密殿，见仇士良等人坐堂上，帷帐周密，对崔慎由说：“皇上身体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即位以来，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你应当写一道诏书。”崔

慎由听罢大吃一惊，说：“圣上高明之德，天下人皆知，怎能轻议废立？我的家族上千人，兄弟群从尚且有三百，我怎么能做出灭族的事？虽死也不能从命。”仇士良等人默然无语，过了很长时间，打开后门，将崔慎由引至一小殿，文宗坐在那里。仇士良等人一一历数文宗的过失，文宗低头不语。既而仇士良指着文宗说：“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于是送崔慎由出门，仇士良警告他说：“不要泄露此事，否则，祸及你的宗族。”

《资治通鉴》第二四五卷唐文宗大和九年条载：

仇士良等宦官知道文宗参与了李训的密谋，十分愤恨，在文宗面前出言不逊。文宗羞愧惧怕，不再作声。

《唐鉴》第二□卷载：

九年（文宗大和），十一月，帝与李训、郑注谋诛中官。训及王□、郭行余、李孝本、罗立言，诛中官，不克，训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预谋，怨愤，出不逊语，帝惭惧不复言。

《唐会要》载：

文宗即位，以仇士良等威福任己，思渐除之，卒有李训之败，公卿辅相，赤族受祸。

《唐诗纪事》第二卷载：

甘露事后，帝不乐，往往瞠目独语云：须杀此辈（指仇士良等人），令我君臣间隔。

光化四年（901年）四月，昭宗在《改元天复赦》中说：

……夫匡国之臣，殁身无悔，所祈后代，雪彼沉冤。大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一十七家并陷逆名，本蒙密旨，遂令忠愤，终被冤诬六十余年，幽枉无诉，宜沾恩沛，用慰泉扃，宜并洗雪，各复官资

.....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唐文宗确实是参与了甘露之变,而且,唐文宗又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皇帝。一方面,他不甘心受制于家奴,从即位以来,就想消灭宦官集团;另一方面,他又惧怕宦官势力,不敢与宦官做坚决的斗争。大和二年(828年),刘訥对策揭露了宦官的罪行,指出宦官专权对国家的严重危害。这是反对宦官的强大社会舆论,说出了文宗和朝官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然而,由于文宗和考策官惧怕宦官的威势,刘訥终于落第。大和五年(831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又由于郑注、王守澄的诬告,宋申锡被贬,使这次反宦官的斗争破产。在甘露之变中,文宗也是如此。他虽然在事先提拔了一批人,与李训、郑注密谋将宦官一网打尽,但在事发后,他并未全力支持李训、郑注,似乎是一个局外人,任凭宦官摆布,不敢有所作为。事后又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惭愧不复言。这样懦弱无能的皇帝,岂能完成诛除宦官的历史重任!

那么,既然如此,在甘露之变以后,仇士良等宦官为什么不杀唐文宗呢?主要原因是,朝廷之内以郑覃、李石为代表的朝官对仇士良等宦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朝廷之外,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代表的强藩公开反对仇士良等宦官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并且向文宗保证,一旦发生不测,誓死出兵,以清君侧。这样,仇士良等宦官废黜杀害文宗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第十四章 党争纷起,互相排挤

“牛李党争”一词,目前在史学界是用来概括唐代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士大夫两大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沈曾植说:“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①陈寅恪以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②“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③“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④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入仕途径来看,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出身。李党成员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李商隐、刘轲等,都是进士及第,只有李德裕、郑覃二人非进士出身。当然,李德裕重视门第,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主张对科举制度进行某些形式上的改革,并不是完全否定和取消科举制度。真正反对并主张完

191

①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3,大中二年下引。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全取消科举制度的只有郑覃一人。其次,从出身来看,陈寅恪先生所列的牛党成员如:牛僧孺、李宗闵、李珣、杨嗣复、魏瓘、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萧遘、李汉、张元夫、杜□、杜牧、白敏中、白居易、萧绾、苏景胤,皆系士族;而陈氏所列李党成员如陈夷行、李让夷、刘轲皆系进士而非士族,李绅、李回为进士而兼士族,只有李德裕、郑覃系士族而非进士出身,其中以经学标榜者仅郑覃一人。可见,牛李两党都是由士族和庶族混合组成的。因此,牛李党争既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也不是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

那么,牛李两党斗争的焦点究竟是什么呢?主要是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对待藩镇割据,牛党主张姑息迁就、息事宁人,而李党主张坚决平叛、维护统一。李党重视政治改革,而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党反对佛教,武宗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党于大中元年(847年)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①。李党坚决主张维护边境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资治通鉴》载: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洎、王涯复策。□,涯之甥也,涯不先言,洎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洎、涯学士,

^① 《资治通鉴》第248卷,唐宣宗大中元年条。

埶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

第二次斗争是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由于中书舍人李宗闵曾在元和三年（808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讽刺他的父亲，十分痛恨。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官，二人产生矛盾。这一年，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给钱徽写信，推荐自己所亲近的考生。等到放榜后，段文昌和李绅所推荐的考生都落选了，考中的进士当中郑朗是郑覃的弟弟，裴^{①76}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唐穆宗说：“今年礼部考试很不公平，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朝廷公卿大臣的子弟，没有才能，靠托人情才考中的。”穆宗问翰林院诸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异口同声地说：“确实像段文昌所说的那样。”于是，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十人不中选。四月，丁丑（十一日），穆宗下诏说：

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复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亦多。比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宁抚，式示殊恩，特

掩尔瑕，庶明予志。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谔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讫，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复。^①

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

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曾写信为自己的亲友请托之事，以便使皇上明白是非曲直，收回诏书。钱徽说：“如果我问心无愧，无论升官还是贬官，都无所谓，为什么要去揭发人家的私人信件？这难道是士大夫和君子所应当干的事吗？”说完随即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毁，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君子的风度。从这件事以后，李德裕和李宗闵二人各分为朋党，相互倾轧，近四十年。

第三次斗争发生在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当时，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拜相的希望，但李逢吉却援引牛僧孺为宰相，而把李德裕逐出京城，任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由此，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

文宗朝，牛李两党的斗争也很激烈。

大和五年（829年）八月，唐文宗召命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向文宗推荐李德裕为宰相，未成。这时吏部侍郎李宗闵得到宦官的支持，唐文宗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九月，壬辰（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宰相李宗闵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建议文宗命他外出赴任。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辛巳（初六），武昌节度使牛僧孺来京城朝拜。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辛卯（十六

^① 《旧唐书》第168卷，《钱徽传》。

日),唐文宗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一起排挤李德裕的党羽,逐渐把他们从朝廷中贬逐出去。

裴度以自己年老多病,恳请唐文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职务。六月,丁未(初五),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情减轻后,可三、五天到中书门下办公一次。当初,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奏请李宗闵为幕府的观察判官,由此李宗闵逐渐被提拔重用。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荐李德裕,于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辞职的机会,建议文宗批准并将裴度外放到藩镇任职。九月,壬午(十一日),唐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虽然不是李党成员,但因推荐李德裕为相而受到牵连。

大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唐朝,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奔赴成都,李德裕向朝廷奏报。牛僧孺认为接纳维州悉怛谋投降有百害而无一利,唐文宗认为牛僧孺言之有理,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同时把悉怛谋等人全部逮捕送还。吐蕃把悉怛谋和随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员在边境上全部杀死,手段极为残酷。李德裕由此更加憎恨牛僧孺。

大和六年(832年)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多次对文宗说:“朝廷命令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把吐蕃降将悉怛谋捆绑送还,拒纳维州,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理方法实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对文宗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故意阻挠李德裕为国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十二月,乙丑(初七),文宗任命牛僧孺带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不久，唐文宗任命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李德裕从西川调来朝廷任职，唐文宗对他十分器重，看样子急于任命他为宰相。但是，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京兆尹杜□是李宗闵的党羽，一次，往见李宗闵，发现他面带忧色，便问：“你莫非担心兵部尚书李德裕即将被任命为宰相？”李宗闵回答说：“是的，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呢？”杜□说：“我有一个办法，定可以化解你们之间的怨恨，只是怕你不能接受。”李宗闵问：“你有什么办法？”杜□说：“李德裕文学造诣很高，但因为经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心里一直感到遗憾。如果能推荐他主持科举考试，他肯定会喜出望外。”李宗闵沉默不语，然后又问：“是否再想想别的办法。”杜□说：“如果你不愿意让他主持科举考试，那么，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倒可以。”杜□再三和李宗闵约定，不得泄露消息。然后去见李德裕。李德裕迎接杜□说：“你怎么会想起来看我这个受冷遇的人？”杜□说：“靖安相公李宗闵让我来转达他对你的问候。”随即把将要推荐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的意图透露给他。李德裕听后又惊又喜，不由地流下泪来，说：“御史大夫是朝廷举行大礼时在宫门纠察百官班列的重要职务，作为晚辈，我怎敢担当此任！”说罢一再请杜□转达对李宗闵的谢意。但是，李宗闵又和给事中杨虞卿进行商议，杨虞卿坚决反对推荐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结果没有执行这个计划。

大和七年（833年）二月，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李德裕进宫拜谢，文宗和他谈起朝廷中的朋党问题，李德裕说：“现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官员都在结党营私。在此之前，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他的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

给事中萧澣等人相互交结，关系密切。他们攀附朝廷权贵，对上交结宰相，对下干扰有关部门的工作，为读书人求取功名和谋求官职，无不如愿以偿。文宗得知后十分厌恶他们，所以和李德裕谈话时，首先说起这方面的事。李德裕因而得以排挤、打击他所不喜欢的人。

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在宪宗朝曾驳斥过朝廷礼官给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拟定的谥号，认为推崇过分。现在，李德裕作了宰相，张仲方内心甚为不安，于是，声称身体有病，请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唐文宗调张仲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庚戌（二十三日），唐文宗贬给事中杨虞卿为常州刺史，中书舍人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过了几天，文宗再次谈起朋党的问题。李宗闵说：“我对于朝廷中的朋党活动，历来非常清楚，所以，对于杨虞卿这些人，都不给他们好的官职。”李德裕反唇相讥说：“他们在此之前担任的给事中、中书舍人职务难道还不是好的官职？这又是谁授予他们的职务？谁在朋比为党？”李宗闵听出李德裕是在讥讽自己，不免大惊失色。

丁巳（三十日），萧澣被贬为郑州刺史。这样一来，李宗闵一党的几个重要成员全部被排挤出中央政府。

李宗闵十分厌恶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免除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唐文宗不经意地对宰相说：“殷侗精通经学，这一点很像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侗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他们对朝政的议论却不足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殷侗议论朝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愿意听。”

六月，壬申（十六日），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十分不满，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

廷的所有事情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我们宰相干什么？”崔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朝廷的一切重大事情。”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欲言又止。

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下诏，正式决定进士科停考诗赋。

大和八年（834年）九月，辛亥（初三），文宗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来京城。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都厌恶李德裕，因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和李德裕互相排斥，于是，决定征调李宗闵再回中央政府，增强和李德裕对抗的力量。壬戌（十四日），唐文宗下诏，命李宗闵从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来京城。

十月，庚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十七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以同平章事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乙巳（二十八日），礼部贡院奏请进士科举考试仍然加试诗赋，文宗批准。

李德裕面见文宗，表示不愿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请求留在京城任职。丙午（二十九日），文宗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对文宗说：“朝廷任命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的制书已经下达，不应当因他不愿上任就中途改变朝廷的决定。”十一月，乙亥（二十九日），唐文宗再次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再带同平章事的头衔。这时，李德裕和李宗闵各自结党，相互之间极力排挤异党、支援同党。文宗对此大伤脑筋，深为忧虑，经常叹息道：“消灭河北三镇的叛贼还比

较容易,但消除朝廷的朋党实在是太难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君子和小人之间互不相容,就像冰块和炭火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罐子里一样。所以,君子当权,则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当权,提拔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撤免贬逐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只称赞他所喜欢的人,诋毁他所厌恶的人,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应该衡量部属的品德行为,再给他官职;考察部属的才干能力,再根据他们的才能大小授予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奖赏;有严重罪行的官员,加以撤免惩处。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有眼不能明辨是非,有权不能决断事情,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一并进用。朝廷的大政方针皇帝不能作主,决策权逐渐转移到他人之手。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生出蛊虫;食醋酸败,就会引来蚊蝇。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责备自己,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那些人所抨击的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或贬黜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

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们的言行一致,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重用他们。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驱赶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一味抱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播种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唐文宗连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消灭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当初,李德裕担任浙西道观察使时,漳王李凑的老师杜仲阳由于宋申锡案件的牵连,被流放到金陵。文宗诏命李德裕予以特别照顾。适逢李德裕已奉命调离浙江西道,于是,嘱托留后李蟾按文宗诏令办理。大和九年(835年)三月,尚书左丞王□和户部侍郎李汉上疏指控说李德裕用重金贿赂杜仲阳,秘密地和漳王交结,企图谋反。文宗大怒,召集各宰相及王□、李汉、郑注等人当面对质。王□、李汉等人一口咬定这是事实,诬陷李德裕。宰相路隋说:“李德裕不至于如此,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也应当有罪了。”王□等人这才不再作声。四月,唐文宗改命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丙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镇海节度使,同时命令他尽快离京上任,不得面见皇帝辞行。这是由于此前在王□等人诬陷李德裕时,他出面为李德裕辩解的缘故。

庚子(二十五日),朝廷颁布诏令说,因文宗前不久刚刚

患病时，宰相王涯招呼李德裕一起去看望文宗病情，而李德裕竟然不去，又因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强行征收百姓积欠的赋税三十万缗，导致百姓穷困，所以，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诏令说：

有国之典，本于明罚，为君之道，必在去邪。皇王大政，谅无易此，奸凶与比，诚敬尽亏。无君之心，因事辄见，岂可尚居崇秩，犹列东朝？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性本阴狡，材则脆弱，因缘薄艺，颇颇清途。既忝藩镇，旋处钧轴，靡怀愧畏，肆意欺诬，废挠旧章，汨乱彝序。贤良尽逐，当白昼而重关；诡诈是谋，逮中宵而万变。朕尝以寒暑得疾，初甚惊人，凡百臣子，奔走道路；而德裕私室晏然，全无忧戚。王涯驻车道左，络绎追呼，满朝倾骇，竟以不至。又在西蜀之日，征逋悬钱，仅三十万贯，使疲羸老弱，徒转沟壑。交结异类，任用俭人，贿赂流行，朱紫无辨。是宜处之重典，以正刑书。犹以夙经委使，载深宽宥，俾佐遐服，用示宽恩。可守袁州长史。驰驿发遣。^①

京城长安盛传谣言，说郑注为皇上配制长生不老仙丹，须用婴儿心肝入药，百姓相互传告，吓得把小孩都锁在家里，严密看管，闹得人心惶惶。文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郑注的心里也很不安。御史大夫李固言向来憎恶杨虞卿，于是，和李训一起陷害他，对文宗说：“我昨天追查这件事，发现谣言出于京兆尹杨虞卿家人之口，因而传遍京城。”文宗大怒，即令逮捕杨虞卿下狱。杨虞卿的弟弟杨汉公及儿子杨知进等八

① 《唐大诏令集》第57卷，《大臣·宰相·贬降上》。

人自缚，挝登闻鼓诉冤，文宗下令让杨虞卿归家。第二天，唐文宗贬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此前，郑注求作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郑注因此怀恨在心，在文宗面前极力诽谤李宗闵。这时，正好李宗闵竭力为杨虞卿辩解，文宗大声怒斥他说：“你曾经说过，郑覃身上有妖气。今作妖，是郑覃，还是你呢？”六月，壬寅（初四），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文宗的诏令说：

夫宰辅之任，缉熙庶工。苟或政紊彝伦，迹涉党比，则何以执是邦柄、毗予一人？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顷以词艺，列于班行，乃藉宗枝，骤升显贵。朕嗣膺大宝，梦想勤劳，谓其忠厚小心，再委枢务，每必造膝而问，虚己以求。将欲俾人不迷，致我垂衣而理，付之钧轴，断然不疑，而乃事靡灭私，言非纳谏。近者别登俊彦，与之同列，忌贤不悦，物论喧哗，翼赞之效蔑闻，怨嫌之声屡作。前后叨位，中外同辞，唯进奔竞之徒，莫修恭慎之道。蔽我卑听，擅我化权，不思急召之恩，都忘再擢之宠。况且志无报主，举非正人，顾其操心，乃是速戾。则何以式示百辟，以维四方？尚从屈法之典，俾守遐藩之牧。所谓全体，良愧知臣。可明州刺史，仍驰驿赴任。^①

七月，辛亥（初八），唐文宗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壬子（初九），文宗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文宗的诏令

^① 《唐大诏令集》第57卷，《大臣·宰相·贬降上》。

说：

明州刺史李宗闵，股肱之臣，付以大政，所宜竭节，以答殊荣。事或负予，法所难贷，虽欲终始，其可得乎？且细大之愆，既暴前诏，而交通非类，踪迹又彰，岂可尚领方州，牧吾黎庶？宜谪遐佐，以肃朝伦。可处州长史。驰驿发遣。^①

唐文宗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他二人都因是李宗闵的同党而被贬职。

郑注又揭发李宗闵担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澥交结宫中女学士宋若宪和知枢密杨承和，因而被任命为宰相。唐文宗贬左金吾大将军沈澥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初三），三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命女学士宋若宪自尽。《三贬李宗闵潮州司户制》说：

交结凶邪，叨取荣显，奸险阴匿，因事尽彰。顷为吏部侍郎，令沈澥于内人宋若宪处密求宰相。及事踪败露，文字犹存，阅视之际，良深叹骇。既专枢柄，益附私党，附下罔上，废义灭公。言多矫诬，动挟欺诈，伤风败政，负我何深！案诸刑章，法在无赦。尚以早经任使，赐以全生，投之裔夷，示我恩贷。呜呼！知人则哲，朕方自咎，为臣苟进，当鉴于斯。百尔君子，宜体予意。^②

戊寅（初五），文宗贬李珣为江州刺史。再贬沈澥为柳州司户。

杨虞卿、李汉、萧浣都是朋党的首领，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李汉为汾州司马，萧浣为遂州司马。

① 《唐大诏令集》第57卷，《大臣·宰相·贬降上》。

② 《唐大诏令集》第57卷，《大臣·宰相·贬降上》。

郑注和李训对他们所厌恶的朝官，都指斥为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羽，每天都有人被贬逐。上朝时，百官的班列为之一空，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文宗也知道这种情况。郑注和李训担心被人控告，动摇自己的地位，于是，二人劝文宗下诏，九月，癸卯朔（初一），唐文宗下诏说：

凡是李德裕、李宗闵的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原来的部下，除今日以前贬黜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再追究。

这样，人心才稍稍安定。

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发生甘露之变。甲子（二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郑覃为同平章事。乙丑（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

开成元年（836年）三月，壬寅（初三），唐文宗任命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四月，己卯（初十），唐文宗任命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当初郑注、李训指控为李德裕、李宗闵同党的人，逐渐官复原职。

甲午（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固言与李宗闵、杨嗣复关系很好，郑覃非常憎恶他。因起居郎缺员，李固言上奏说：“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都可以胜任这个职务。”郑覃说：“崔球是李宗闵的党羽，况且起居郎记录皇帝的言行，为千古效法，不可用朋党之人。如用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这件事因此而被搁置。

郑覃当宰相以后，提拔李绅为河南尹，不久，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毫汴颖观察使。七月，李德裕为

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一月，检校户部尚书，复浙西观察使。李回以库部郎中负责撰写皇帝的诏令，拜中书舍人，赐金紫官服。

开成二年（837年）四月，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为同平章事。

五月，授李德裕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代替牛僧孺。牛僧孺听说李德裕代替自己的职务，乃以军府事交付副使张鹭，即时入朝。当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得止四十万，其余一半已被张鹭支用。牛僧孺上奏争论此事，诏李德裕重新检括，果如牛僧孺所说之数。李德裕称初到镇时患病，被部下官吏隐欺，请求朝廷处罚，唐文宗没有再追问此事。补阙王绩、魏瓘、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諲、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李德裕妄报钱帛以陷害牛僧孺，文宗竟也不追究李德裕的责任。

牛僧孺入朝，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牛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小事为怀。在洛阳归仁里建了一所房屋，将任淮南节度使时购得的嘉木怪石，置之庭院，显得非常清静幽雅。常与诗人白居易吟诗其间，无复进取之意。

十月，戊申（十八日），李固言罢相，带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唐文宗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珣并为同平章事，仍兼任原盐铁转运使和判户部的职务。

宰相陈夷行性情耿介正直，厌恶杨嗣复的为人，每次宰相在一起商议朝政，二人往往事论不休。陈夷行以脚病为

由,请求辞职,文宗没有批准。

宰相杨嗣复打算向朝廷推荐提拔李宗闵,遭到郑覃和陈夷行的激烈反对。双方相互争论攻击,指斥对方为朋党。唐文宗最后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当初,宰相李固言和杨嗣复、李珣关系密切,所以推荐他二人为宰相,以便排挤郑覃、陈夷行。朝廷每次议政,双方争论不休,是非竞起,文宗不能决断。

九月,唐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左仆射,并令左神策军副使王元直带着任命诏书前去洛阳宣赐。根据以往的惯例,东都留守入朝,没有中使赐诏的仪式,但恐怕牛僧孺不接受任命,所以,派中使前去洛阳督促他尽快来京城。牛僧孺不得已入朝就职。因庄恪太子刚刚去世,牛僧孺在延英殿拜谢文宗时,谈到太子的事情,恳切地阐述父子君臣之义,人伦大经,不可轻移国本。文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甚至流下泪来。

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唐文宗称誉判度支杜□有才能,杨嗣复、李珣乘机奏请文宗任命杜□为户部尚书。陈夷行坚决反对,并说对臣下任命的旨意应当由皇上亲自作出,而不应该让宰相专权。

五月,唐文宗和宰相在一起议政,陈夷行又含沙射影地说不应使臣下专权而作威作福,郑覃也说开成三年、四年的朝政不如开成元年、二年。这引起了杨嗣复、李珣的强烈不满,双方的矛盾激化,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杨嗣复多次上表请求辞职,并且不上朝。唐文宗对杨嗣复、李珣比较信任,又怨郑覃、陈夷行言辞偏激,丙申(十六日),罢免郑覃和陈夷行的宰相职务,让郑覃担任右仆射,陈夷行担任吏部侍郎。郑覃的性情清正俭约,陈夷行也性情耿直,所以,杨嗣复等人十分痛恨他们。

此时，右仆射牛僧孺不想参与朝政，唐文宗对杨嗣复说：“牛僧孺借口有病，不愿意上朝，不行的话，就听其自便吧！”

八月，唐文宗任命牛僧孺为检校司空、兼同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辞行之日，唐文宗赐给牛僧孺觚、散、樽、杓等金银古器，命中使转告他：“你是一个正直的君子，所以赐给你这些古器，你可以在京城再住些日子。”牛僧孺说：“汉南水旱之后，流民急需安顿，不宜在京城滞留。”再三请行，文宗才同意。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辛巳（初四），唐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唐武宗免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的职务，让他担任吏部尚书；任命刑部尚书崔珙为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被免去宰相职务，担任太常卿。

九月，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来京，丁丑（初四），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会昌元年（841年）三月，甲戌（初三），唐武宗任命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唐武宗调杨嗣复、李珣分别担任湖南观察使和桂管观察使，并派宦官前往潭州、桂州杀杨嗣复和李珣。李德裕和同僚崔珙、崔郸、陈夷行联名几次上奏，请求武宗赦免杨嗣复和李珣的死刑。于是，武宗派人追回诛杀杨嗣复和李珣的使者，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珣为昭州刺史。

八月，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此前，江汉发生水灾，毁坏襄州百姓的房屋。于是，李德裕认为牛僧孺失职，建议罢免他的职务，改任散官。

会昌二年(842年)二月,丁丑(十二日),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绅入京,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六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左仆射。

七月,唐武宗任命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九月,唐武宗听说太子少傅白居易很有名望,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于是,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向来厌恶白居易,因而说白居易衰老多病,不堪担负朝廷重任。白居易的堂弟左司员外郎白敏中的学问不低于白居易,而且很有见识和器量。甲辰(十三日),武宗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李德裕对武宗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曾和刘从谏交结,不宜再让他继续留在东都,以免妨碍讨伐昭义的军事行动。戊戌(初十),武宗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会昌四年(844年)七月,甲辰(十三日),唐武宗任命淮南节度使杜□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闰七月,壬戌(初十),唐武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带同平章事的头衔,出任淮南节度使。

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和湖州刺史李宗闵,他对唐武宗说:

“刘从谏占据上党有十年,文宗大和年间曾入朝,当时牛僧孺、李宗闵执政,不扣留刘从谏,反而给他加上宰相头衔,放纵他归还上党,以致形成今天的祸患,竭尽天下人力物力才将上党攻取,这都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的罪过。”李德裕又派人到潞州搜求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相互交往的书信,却一无所得,于是命令孔目官郑庆上言,称刘从谏每次得

到牛僧孺、李宗闵的书信，都要亲自烧毁。唐武宗下诏将郑庆交御史台审查，御史中丞李回、御史台侍御史知杂事郑亚查问后认为情况属实。河南少尹吕述也给李德裕写信，声称刘稹被剿灭的捷报传到东都洛阳时，牛僧孺发出叹息声，有怨恨之言。唐武宗得知后勃然大怒，将牛僧孺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降为漳州刺史。十月，戊子（初九），再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李宗闵贬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期流放于封州。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查所部江都县尉吴湘，说他擅自盗用官家因公出差用的税粮钱，并强娶管下百姓颜悦的女儿，将他家的资产衣装估价作为赃款，论其罪当处死刑。吴湘是吴武陵哥哥的儿子，李德裕平素就厌恶吴武陵。议论此案的人都声言吴湘冤枉，谏官于是向唐武宗请求重新审理，唐武宗颁下诏书，派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复审此案。崔元藻、李稠经过复查，回奏朝廷说：“吴湘偷盗税粮钱实有其事，而颜悦本是衢州人，曾经任青州牙推官，他的妻子也是士族，情况与初审论罪事实有出入。”李德裕认为崔元藻和李稠论事模棱两可，没有给吴湘定重罪论死刑，二月，朝廷将崔元藻贬为端州司户，李稠贬为汀州司户。对吴湘案不再复审，也不交付司法官署依法详细判罪论刑，即按照李绅所奏，将吴湘处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都上疏论争，均未被采纳。

李德裕提拔柳仲郢为京兆尹，柳仲郢平素与牛僧孺相友善，于是向李德裕道谢说：“想不到李太尉如此恩奖，但为报厚恩，我怎敢不再去奇章公牛僧孺门馆呢！”李德裕对这些话并不以为嫌。

五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罢相，改任右仆射；中书

侍郎、同平章事崔铉也被罢相，改领户部尚书衔。乙丑（十九日），唐武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依旧判户部。

七月，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病逝，宣宗即位。四月，壬申（初二），唐宣宗下令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仍带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甲戌（初四），唐宣宗又下令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因为他们都是李德裕的党羽。

五月，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为同平章事。

七月，壬寅（初三），淮南节度使李绅卒。

八月，唐宣宗任命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韶州刺史李珣为郴州刺史。这五位前宰相都是唐武宗所贬逐的，到这时，五人同日北还。李宗闵还未离开封州就死了。

九月，唐宣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除他同平章事的官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带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掌朝政时，提拔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唐武宗死后，李德裕失势，白敏中于是趁朝廷上下对李德裕一片愤怒，竭力排挤李德裕，指使李德裕的党羽李咸揭发李德裕执政时的罪过，因此，李德裕被贬职。

白敏中任宰相执政之时，凡以前受李德裕鄙薄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加以重用。

三月，唐宣宗颁下诏敕说：

在会昌五年毁佛时所拆毁的寺庙，如果僧人有能力修缮或营造的，听任他们自己居处，官府不得禁止。

这时，唐宣宗和白敏中等人都竭力反对会昌年间唐武宗和李德裕的政策，所以，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六月，牛僧孺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八月，丙申（初三），唐宣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带同平章事衔，出任西川节度使。

九月，乙酉（二十三日），前永宁县尉吴汝纳，上表申诉其弟吴湘犯罪不至于处死，而“李绅与李德裕内处相通，互为表里，欺瞒迷惑唐武宗，冤枉杀死我弟吴湘，乞求皇帝陛下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人来对质辨诬。”丁亥（二十五日），唐宣宗下诏御史台，令调查此案的真实情况向上汇报。十二月，庚戌（十九日），御史台上奏，据崔元藻所列举的吴湘冤枉情况，和吴汝纳申诉的差不多。戊午（二十七日），唐宣宗下令贬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因为以前不能辨白吴湘的冤情，大中二年（848年）正月，乙酉（二十四日），李回被降职调任湖南观察使，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绅虽死，也被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瑕因为起草贬李德裕官职的制书没有完全写明李德裕的罪状，己丑（二十八日），也被贬为端州刺史。

九月，甲子（初八），唐宣宗再次将潮州司马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将湖南观察使李回贬为贺州刺史。

十月，牛僧孺卒。

大中三年(849年)闰十一月,崖州司户李德裕病死于贬所。

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李党争历时四十余年。元和三年(808年),宰相李吉甫排斥牛僧孺、李宗闵,埋下了党争的祸根。长庆元年(821年),内相(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排斥李宗闵、杨汝士,朋党正式形成。长庆二年(822年)六月至宝历二年(826年)十一月,李逢吉为宰相,牛党占优势。大和三年(829年)八月至大和七年(833年)六月,大和八年(834年)十月至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宗闵为宰相,牛党又占优势。开成时,李党的郑覃、陈夷行,牛党的杨嗣复、李珣都是宰相,争斗激烈。会昌时,李德裕执政,该党大盛。大中时,白敏中为宰相,牛党复兴,击溃李党,党争结束。

值得研究的是,牛李党争这个词有些不科学。《旧唐书》中无“牛党”、“牛僧孺党”之说,所谓“牛李”,不指牛僧孺党、李德裕党,而是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属于同一集团。如《旧唐书》第一七四卷《李德裕传》载:

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属同一集团,但并不意味着牛僧孺是这个集团的首脑。牛僧孺两次拜相,第一次是李逢吉引用的。《旧唐书》第一七三卷《李绅传》载:

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长庆)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章事。

第二次是李宗闵引用的。《旧唐书》第一七四卷《李德裕传》载:

大和三年八月,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郑滑节度使。……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

牛僧孺于长庆三年(823年)三月至宝历元年(825年)正月,大和四年(830年)正月至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两次为宰相共计不到五年。在四十余年的党争中,牛僧孺被人援引为相,并且时间不长,显然不可能成为党魁。

《旧唐书》中一般用“二李朋党”一词来泛指李宗闵为首的集团与李德裕为首的集团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旧唐书》第一六六卷《白居易传》载：

大和以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

同书第一七二卷《李石传》载：

文宗自德裕、宗闵朋党相倾,大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

同书第一五九卷《路隋传》载：

宗闵、德裕朋党交兴。

同书第一六九卷《郑注传》载：

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

同书第一七六卷《李宗闵传》载：

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牛李党争的所谓“牛党”,实际上是以李宗闵为首的集团,牛李党争,确切地说应该是李宗闵

和李德裕党争,或简称为“二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提法源于《新唐书》第一八卷《李德裕传》:

李逢吉……欲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

此处的牛、李之憾指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的对立和斗争,被后人沿用,遂有“牛李党争”一说。但当时李德裕的政敌主要是李逢吉,李逢吉援引牛僧孺为相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排挤、打击李德裕。所谓“交怨愈深”(《旧唐书》语),应指李德裕对李逢吉,或兼指李德裕对李逢吉、牛僧孺,不可能单指李德裕和牛僧孺的矛盾。

近人岑仲勉提出“李德裕无党”,其根据有三:

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赞皇勋》:

或问赞皇之秉钧衡也,毁誉无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玉泉子》云: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裴庭裕《东观奏记》上云: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讎。

以上所谓“奖拔孤寒”、“结怨侯门”、破“朝贵朋党”、“疾朋党如仇讎”等不能说明李德裕无党。奖拔孤寒正反映李德裕不只注重门第,反对科举制度;“疾朋党如仇讎”,破“朝贵朋党”,只能说明李德裕坚决与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政

敌势不两立。至于说李德裕“门无宾客”，更不符合事实。
《玉泉子》又记：

卢肇……每谒见，待以优礼。

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
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卢肇等人不就是李德裕的宾客吗？

又如《旧唐书》所载：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郑）覃
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大和）七年春，德裕作相。
五月，以覃为御史大夫。^①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
朝谒。^②

（开成）四年九月，（陈夷行）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华
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华州召
入，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③

李宗闵复相，与李训、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李）
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郑覃辅政，起
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④

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諲欲置德裕深
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⑤

李回……尤为宰相李德裕所知。^⑥

① 《旧唐书》第173卷，《郑覃传》。

② 《旧唐书》第173卷，《郑覃传》。

③ 《旧唐书》第173卷，《陈夷行传》。

④ 《旧唐书》第173卷，《李绅传》。

⑤ 《旧唐书》第173卷，《李绅传》。

⑥ 《旧唐书》第173卷，《李回传》。

大中元年冬，坐于李德裕亲善，……再贬抚州刺史。^①

李让夷……深为李珣、杨嗣复所恶，终文宗世官不达。及德裕秉政，骤加拔擢，……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②

李德裕在翰林，（郑）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出镇浙西，辟为从事，……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③

大中二年，吴汝纳诉冤，德裕再贬潮州，亚亦贬循州刺史。^④

上述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郑亚等人都是李德裕的党羽，他们与李德裕在仕途上是共进退，荣辱与共的。

① 《旧唐书》第173卷，《李回传》。

② 《旧唐书》第176卷，《李让夷传》。

③ 《旧唐书》第178卷，《郑畋传》。

④ 《旧唐书》第178卷，《郑畋传》。

第十五章 科举之争,莫衷一是

唐代科举取士,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科举制度不讲门第,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一批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得以参与封建政权,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但是,唐代的科举制度也存在某些弊端。

首先是考试科目不切合实际。以进士科为例,主要考诗赋而不重儒家经典。“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①结果“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 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②应试之人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不重视学习儒家经典,不重视学习历史知识,而只是单纯地学习《文选》。所谓《文选》,正是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录秦汉以至齐梁的诗文总集。六经与历史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及其实践经验,经可以使人明治理,史可以使人通政事,而诗文与政治的关系却不那么直接,“文成七步,未足化人”^③。考试的内容与为官从政的需要互相脱节,造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矛盾现象。

217

① 《旧唐书》第190卷,《贾曾传》。

② 《全唐文纪事》第14卷,《贡举一》。

③ 《资治通鉴》第202卷,唐高宗上元元年条。

其次,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相当严重。“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①从武则天时起,科举考试已是贿赂公行,如同市井。“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皆不事学问,惟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②即使是开元盛世,依然“请托大行,取士颇滥”。“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而那些没有门路的人,只能“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③唐代科举考试,试卷不糊名,考试成绩全凭主考官主观认定。并且,在考试之前,应试之人到京师,必各携带其平日所作诗文,干谒公卿大臣及有名望的大儒,请为推许褒扬,造成一定的舆论,此名为“公卷”;及录取之时,主考官或出于自谦,或为了慎重,特托知名人士代拟榜第,名为“通榜”。这种录取方式促使考生在考试之前大肆请托,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费冠卿有诗云:

萤烛不为苦,求名始辛酸;
上国无交亲,请谒多少难;
九月风割面,羞汗成冰片;
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④

① 《新唐书》第45卷,《选举志》下。

② 《朝野僉载》第1卷。

③ 《唐摭言》第6卷,《公荐》。

④ 《唐文粹》第18卷,《感怀》。

这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士人,为了进士及第,四处奔走请托,确实也很辛苦。而权贵人家子弟,可坐以父兄之势以取功名,较寒门子弟易于录取。实际上,科举考试也不是人人在考试成绩面前完全平等,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

在干谒请托之风气的影响下,及第进士与主考官之间极易形成私人密切关系,部分进士往往被朋党所利用,成为政治上的宗派集团。因为进士之间互相推敬谓之“先辈”,同时及第的进士谓之“同年”,主考官谓之“座主”,应试人自谓“门生”,将试之时各相作保谓之“合保”。就凭这些关系,很容易使进士们聚集结合,并且,由于唐代考试不糊名,通过“温卷”、“关说”的关系,及第进士对座主感恩戴德。放榜之后,进士先拜谒主考官,举行隆重的谢恩仪式。“状元以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词毕,“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以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谢恩之仪完成后,步入期集院,“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下一步“侯宰相上堂后,参见”,此谓之“过堂”。此后又须到吏部谢恩,谓之“关试”。从这一系列的谢恩过程来看,可见唐人极重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门生间施恩望报之意特重,竟有座主视门生为田产者。唐朝李允《独异志》记载:

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答曰:“余有三十余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年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札,不令就春闱之试,如以

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慚而退，累日不食。^①而门生未报座主之恩，总以为终身遗憾。这样，科举取士本为国家选拔人才，而却成了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

唐朝中后期，科举之弊日益严重。元和长庆以后，诗道日益陵夷，晚唐诗偏重调声练字，竟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多不务实。唐文宗就是一个颇好诗的皇帝，闻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的诗句，则“嗟赏移时”。暇时且与诸学士联句为娱。每当科举考试之时，文宗亲自出题作诗，并亲阅试卷。上行下效，助长了进士的浮华风气，考试舞弊现象亦更为严重。如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都是朝廷公卿大臣的子弟，不当在选中。穆宗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进行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复落十人，钱徽贬江州刺史。穆宗下诏说：

访问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②

文宗时，杨虞卿“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③科举之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④

对待科举制度，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文宗朝，以郑覃为代表坚决反对科举制度。史载郑覃虽精通经学，但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在开成初年，奏请礼部贡院应停止进士科考试。在此之前，唐文宗曾与郑覃谈到

① 《松窗杂录》。

② 《旧唐书》第16卷，《穆宗纪》。

③ 《旧唐书》第176卷，《杨虞卿传》。

④ 《续唐诗话》。

科举取士的问题。郑覃说：“南北朝时期，朝廷多选用文学浮华之士，所以没有治理好国家。士人如果有才能，可以胜任职务，即可任用，何必非强调要有文学才华？”文宗说：“进士及第的人已经作过州县官的，方镇奏请署官的即可任用，其余的人不可以任官。”郑覃说：“进士科及第的人大多数都是轻薄浮华之徒，不必全部任用他们做官。”文宗说：“科举及第的人，有的轻薄，有的敦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轻薄浮华之人未必完全出自进士科。况且，进士科国家已设置二百年，也不可以马上改变。”郑覃说：“但也不可过分地推崇进士科。”文宗曾对宰臣说：“现在，朝廷各个部门的工作拖拖拉拉，要加强管理，于是指眼前的香炉说：‘此炉原来非常华丽，使用的时间长了，就失去了光彩。如果不重新加以修饰，怎么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呢？’”郑覃说：“改变社会风习，应当讲究实效。最近三十年来，士人多不务实，选人主要靠关系，讲情面。因此，被选用的人像嵇康、阮籍那样，只会空谈，而不会做实事。”宰相李石说：“这是由于天下太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现在的人也羡慕王夷甫那样的人，耻不能赶上他。”文宗说：“你们辅佐我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振举法度而已。”

除郑覃主张取消进士科以外，还有李德裕“不喜科试”，有人以此认为李德裕反对科举制度，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李德裕的确不是科举出身，“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年才及冠，志业大成。”^①《唐语林》也载：“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卫公曰：‘好驴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似乎李德裕因自己非由科举进用，就一

① 《旧唐书》第174卷，《李德裕传》。

定恒嫉进士举者。唐人笔记记载这样一件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①近人陈寅恪先生且认为赵郡李氏与荁阳郑氏“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②然而，李德裕“不喜科试”、“不乐应举”，并非反对科举制度。

大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时，有一个叫刘三复的人，“少贫苦学，有才思”，曾拿着自己所作的诗文登门拜谒李德裕，李德裕看过他的文章后，热情地接待他，由此两人成为朋友。李德裕“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③

卢肇等人有异才，李德裕曾被贬宜阳，卢肇投以文卷，向李德裕请教，由此被李德裕所知。会昌三年（843年），王起知贡举，问李德裕想要录取谁，李德裕回答说：“还要问我想录取谁吗？像卢肇、丁映、姚鹄，难道能不让他们及第吗？”王起于是按照李德裕所指的次序放榜。^④

唐文宗爱好文学，非常欣赏卢纶的诗，曾问侍臣：“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回答说：“卢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卢简能、侍御史卢简辞即是他的儿子。”

从上述几件事可以看出，李德裕积极鼓励友人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又为自己所了解的人推荐及第，则其不恶进士已很明显。卢纶是范阳大族，李德裕赞美其四男皆进士及第，说明他不但不恶进士，而且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李德裕与郑覃不同，他并不完全反对科举制度，只是反

① 《玉泉子》。

②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③ 《北梦琐言》。

④ 《太平广记》第182卷，《贡举》。

对进士科的浮华,主张改进科举制度的某些内容。大和七年(833年),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以进士不由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他上疏说:

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仄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状、保辨、识牒皆停。而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①

223

杨绾的这一建议,虽然切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最终竟没有施行。

大和七年(833年)八月,礼部奏:

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所问大义,便与习大经内,准格明经例问十条,仍对众口义。伏准新制,进士略问大义,缘初釐革,今且以通三通四为及格。明年以后,并依明经例。其所试议论,请限五百字

^① 《新唐书》第44卷,《选举志》上。

以上为式。敕旨依奏。^①

李德裕改革进士科考试内容,七月奏请,八月便开始施行。可惜的是,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李德裕罢相,李宗闵再握政柄,乙巳(二十八日),礼部奏:

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得人故也。去年八月敕节文,先试帖经、口义、议论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请先试帖经,通数依新格处分。敕旨依奏。^②

进士科考试仍加试诗赋,得到文宗的批准,于是,李德裕改革进士科考试内容便告失败。

武宗即位以后,李德裕再度入相,继续改革科举制度。李德裕既重视科举,用以选拔人才,又重视教育,用以培养人才。早在和大和七年(833年)八月就规定:“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③会昌时,武宗下诏说:

公卿百僚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每一季一度据名籍分番于国子监试帖。三度帖经全通者,即是经艺已熟,向后更不用帖经。如三度全不通及三度托事故不就试者,便落下名籍。至贡举时不在送省之限。^④

这一规定目的在于使科举考试重视儒家经典,而且注重考生的平时成绩。不论公卿子弟或其他人,凡修明经进士业

① 《唐会要》第76卷,《贡举中·进士》。

② 《唐会要》第76卷,《贡举中·进士》。

③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④ 《全唐文》第78卷,《武宗加尊号郊天敕文》。

者,一律隶名太学,由国子监统筹管理。如不遵从规定,则取消其应试资格。并且明确规定:“如无经义,虽有文章,不在送省之限。”^①这一规定的实施,一方面把教育与科举密切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科举考试内容不切合实际的弊端,扭转家家置《文选》、人人读《文选》的浮华之风,形成家家置经书、人人读经书的局面。

唐代科举,每年录取进士的名额,并不固定,大体上是在二十名至二十五名之间。如大和四年(830年)、大和九年(835年),曾两度规定:“及第不得过二十五人。”^②李德裕为了激励士人发奋进取之心,本着“才堪即与”的原则,对进士及第的名额作了弹性规定。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唐武宗下诏说:

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定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③

并且,为了促进科举的均衡发展,特于会昌五年(845年)正月,颁布全国各地乡贡的分配名额,如下表:

进 士	明 经	项 目	单 位
		人 数	
30 人	200 人		国子监
20 人			宗正寺
30 人	50 人		东监、同华、河中

① 《全唐文》第78卷,《武宗加尊号郊天赦文》。

② 《唐会要》第76卷,《贡举中》。

③ 《唐会要》第76卷,《贡举中》。

进 士	明 经	项 目
		人 数 单 位
15 人	20 人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宣商、□坊、泾□、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
10 人	15 人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郛、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
7 人	10 人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

要求各州府必须认真进行初试，送省之后，仍必检勘。如果州府妄给解者，则试官停现任用。中央会试之后，仍要进行复试，多一层关复，则少一层舞弊。

唐代录取进士，旧有“呈榜”之制，即在进士放榜之前，礼部侍郎分别到各位宰相的家中，先呈及第人名，谓之“呈榜”。呈榜是为了征求宰相的意见，“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无畏忌”，所以“多有改换”，因而“颇致流言”。取士之滥，莫不由此。李德裕深知“比来贡举艰难”，乃因“取宰相与夺”。会昌四年（844年）十二月，“请罢呈榜之旧制”，他上奏说：

将务责成，在于不挠，既无取舍，岂必预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后便为定例。^①

为保证实施，特别申明：“如有固违，御史纠举。”此项改革保

^① 《会昌一品集》补一《请罢呈榜疏》。

证了科举考试的独立，皇帝和宰相不干涉进士的录取，使主考机关独立地行使职权。

为了防止科举考试出现舞弊现象，坚持实行复试制度，将及第人的试卷送请中书门下详复。在录取程序上，先复试，后放榜。如礼部侍郎王起奏请：

伏以礼部放榜已是成名，中书复试尚未及第，若重复之中，万不一定，则放榜之后，远近误传，其于事理，实为非便。请今年进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试讫，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复，候敕却下，本司然后准例大字放榜。^①

有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归私门，不复知有人主。进士及第后的谢恩、题名、曲江会等活动既败坏社会风气，又浪费钱财。针对这些问题，李德裕征得武宗的同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②于是，李德裕表明国家设科取士之宗旨，及宣布进士“座主门生”之积弊。他说：

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恩，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寝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

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会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③

李德裕的这些改革合情合理，并非绝对不准参见有司，只是要求“一度”而止。“既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

① 《全唐文》第643卷，王起《请复试再行放榜奏》。

② 《会昌一品府》补一《停进士宴会题名疏》。

③ 《会昌一品府》补一《停进士宴会题名疏》。

宴乐,并无所禁。”^①只不过“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②又恐积习过久,难以顿改,以致进士阳奉阴违,私下聚集,乃“委御史台察访奏闻”。^③

唐代取士采取科举、门第双轨并行的制度,即用门第(门荫)以补科举之不足。李德裕出身士族,以门荫入仕,但并不就此嫉恶进士。另外,李德裕也维护门第,并力图振兴门第。会昌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还要呈宰相决定取舍。后来及第进士人数不多,宰相在延英殿讨论此事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武宗说:“贡院不理解我意。不录取公卿子弟,这有点太过分了,无论子弟、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录取。”李德裕回答说:“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武宗说:“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④李德裕是在看到士族子弟在科举中受排挤时说这番话的。

在科举之争中,由于唐文宗爱好文学,因此,他比较支持进士科。虽然郑覃多次请求罢进士科,但文宗都没有同意。

① 《会昌一品集》补一《停进士宴会题名疏》。

② 《会昌一品集》补一《停进士宴会题名疏》。

③ 《会昌一品集》补一《停进士宴会题名疏》。

④ 《旧唐书》第18卷上,《武宗纪》。

李德裕不主张取消进士科，而主张改革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文宗虽然同意，但实行不到一年又恢复旧制。李德裕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在文宗朝收效甚微，在武宗朝方才取得一些成绩。

第十六章 崇信佛教,礼拜菩萨

唐敬宗在位时,因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大力宣传推广佛教,因此,长安城中信奉佛教的僧尼越来越多。

及文宗即位,亲阅万机,想革除前朝弊政,曾对左右侍臣说:“自从我做了天子,没有做什么对百姓有利的事情。现在,天下幸好没有兵戈,我将尽除害民之物,使亿兆之民认为当今是尧、舜之世,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凡是对社会没有裨益而有害于百姓的事情,你们尽管直言不讳地指出。”左右侍臣有人说:“只有佛教无益于社会风化,而害民尤为严重,应当禁止佛教的流行。”于是,唐文宗命令有关部门禁止佛教信徒讲经传教。

可是,诏命将要执行,正巧尚食厨吏为文宗做御膳,用鼎煮鸡蛋,刚点着火,忽然鼎中发出极微弱的如人说话的声音,靠近鼎仔细一听,原来是鼎中的鸡蛋向观世音菩萨呼救,声音非常凄惨,似乎是在哀诉。尚食厨吏感到很奇怪,就将此事报告皇上。文宗命左右侍臣前去查验,果如尚食厨吏所奏。文宗叹息说:“我过去不知道浮屠氏的力量竟有如此之大!”

次日,下令尚食厨吏不要再以鸡蛋为御膳,并且向各州县发布诏令,于各寺庙塑观世音菩萨像,供奉礼拜。

唐文宗好食蛤蜊,一天,左右侍臣端来满满一盘子蛤蜊,让文宗品尝。其中有一个蛤蜊用手掰不开,文宗觉得很奇

怪。于是，焚香祈祷。过了一会儿，蛤蜊自然张开，里面有两个小人，形眉端秀，如同真人一般，螺髻瓔珞，脚踏莲花，谓之菩萨。文宗把这两个小菩萨放进金粟檀香盒中，以玉屑覆盖，赐给长安兴善寺，令供奉礼拜。至会昌毁佛寺，遂不知所在。

以上两件事，无史料可考证，难免有迷信色彩。

大和元年（827 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有一个禅师，在元和中得到朝廷的谥号曰“大寂”，其塔未蒙赐额，诏赐名“圆证之塔”。

大和二年（828 年）七月，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奏，润州鹤林寺故禅师玄素传牛头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此径山大觉之师。伏请依释门例赐谥号大额。文宗赐谥号为“大律禅师”，“大宝般若之塔”。

同年十月，河中观察使薛平奏，中条山兰若营造之初有两泉涌出，今因是皇上的生日，请赐号“太和寺”，文宗许之。

大和九年（835 年）七月，李训奏称：现今僧尼太多，虚耗国家税收和百姓的财物。丁巳（十四日），唐文宗下诏，命全国各地政府分别考试所在地的僧尼，凡是读经不合格的，一律限令还俗。同时禁止再修建新的寺院和私自剃度百姓为僧尼。《条流僧尼敕》说：

朕斋居法宫，详念至理，思欲建皇极，端化源，大苏生灵，渐复古道，矧伊耗蠹，必在澄清。而释氏之宗，来自西国，殷、周已前，何尝由此，唐虞之际，宁匪盛时。逮至汉明因梦以言征，傅毅猝词而臆对，远承象教，从此流行，荡然相传，垂七百祀。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异同之论虽多，俗尚之讹未革。遂使风驱成俗，云构满途，丁壮苟避于征徭，孤穷实困于诱夺。永言斯弊，

宜峻科条。自今以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吏严加捉搦。不得度人为僧尼,累有明敕,切在提举。惟我元元,务在长育,擅有髡削,亦宜禁断。比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讲,集众兼戒忏,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后,巡门家提,刑割生人,妄称度脱者,并宜禁断。且僧尼本律,科戒甚严,苟有违犯,便勒还俗。若有自愿还俗者,官司不须制立。如闻两街功德使近有条约,不许僧尼午后行游。虽曰缁徒,无非赤子,有妨自遂,亦軫予怀,从今以后,午后任行。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文字通流,免有舛误,兼数内念得三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诸州府敕到后,许三个月温习,然后试练。如不及格,便勒还俗。其有年过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齿未至、夙婴痼疾并暗聋跛躄不能自存者,并不在经试限。若有戒律清高、修持坚苦、风尘不杂、徒众共知者,亦不在试经限。天下更不得创造寺院、普通兰若等。如因破坏,即任修葺。於戏!理国之本,在正风俗。故王化首婚姻之道,所以序人伦;霸图著胎养之令,所以务生聚。况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蕃无生之法!略期疏涤,用洁缁流,俾尔齐氓,去末归本。庶富之渐,其在斯乎!凡厥司存,勉率吾教,各勤检驭,称朕意焉。①

可是,不到三个月,郑注想得到僧尼的支持和赞誉,再三请求停止继续淘汰僧尼,也得到文宗的批准。

开成二年(837年)二月,乙巳,因太宗皇帝先置昆沙门

① 《唐大诏令集》第113卷,《政事·道释》。

神及功德在蓬莱殿,这一天移出配诸寺安置。三月,甲戌,以慧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

开成四年(839年)三月,丁丑,文宗于紫宸殿问宰臣:“南朝惟以写经造佛为功德,这难道就是功德吗?”杨嗣复回答说:“古称博济生人谓之功,布泽无私谓之德。那怎么能称为功德呢!”郑覃说:“功德莫大于救济百姓。”唐文宗说:“功济生人,德及后嗣,这样说不是很合适吗?”

第十七章 谈经论诗，儒雅风度

唐文宗喜好儒家经典，爱好文学，善于作诗，颇有儒雅风度。

文宗为江王时，即好读书。在王府中像《礼记》、《春秋》、《史记》、《周易》、《尚书》、《毛诗》、《论语》这些书几乎没有，宫中内官得《周易》一部，秘密地献给他。

文宗即位后，经常手捧《周易》阅读，爱不释手。每次视朝之后，即博览群书。当读到乱世之君酷虐百姓时，则必愤怒不已；当读到尧、舜、禹、汤事迹时，则赞叹不止，肃然起敬。唐文宗曾对左右侍臣说：

“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则何以为人君耶？”^①

文宗崇尚贤良，与人为善，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每当与宰相、翰林学士议论朝政时，总是称誉有才能、有学问的文学之士，因此，有很多人以文学才能得到文宗的重用。在议政的余暇时间，文宗经常与宰相、翰林学士在一起讨论经学和文学。

大和二年（828年）五月，文宗纂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写于太液亭，朝夕观览。

李训精通《周易》，文宗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文宗讲解《周易》的微言大义，令文宗非常满意，文宗听得几

^①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乎入了迷。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十分炎热,文宗命取水玉腰带和避暑犀如意赠给李训。李训表示感谢,文宗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①

文宗诏命兵部尚书王起、礼部尚书许康佐为侍讲学士,中书舍人柳公权为侍读学士。每有疑义,便召学士入宫,顾问讨论经义,习以为常。时人称王起、许康佐、柳公权为“三侍学士”。三学士受到文宗的特殊恩宠。于是,许康佐进献《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文宗非常高兴。大和九年(835年)五月,乙巳朔(初一),文宗集《春秋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宣付史馆。

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擅长经义,王起博学多闻,俱召至翰林院,讲论经史。王起嗜学成癖,虽官位崇重,犹夙夜孜孜不倦,废寝忘食,书无不览,经目不忘。转兵部尚书,以庄恪太子登储君之位,欲令儒者授经,乃兼太子侍读,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说:

邦国之礼,祀为大事;毳璧之议,经有前规。谨按《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毳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

①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常制。^①

文宗从之。

郑覃擅长于经学，稽古守正，文宗特别尊重他。当时，文宗爱好文学，郑覃以经义启导，曾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②文宗从之。郑覃又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开成二年（837年）十月，国子监《石经》^③刻成。郑覃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奏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固无职田，请依王府官例，赐禄粟，从之。又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唐文宗曾作诗给郑覃看，郑覃说：“我请求陛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日理万机，这是天下所有臣民共同仰望的。”文宗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郑覃退出后，文宗又将诗给李宗闵看，李宗闵赞叹不已，一句一拜，用心看过后退出，文宗笑着对他说：“你这样做，不要让郑覃父子看见！”唐文宗爱好诗歌，尤其善于作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相同，而古调尤为清峻。他曾想设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马上就有推荐人选的。宰相杨嗣复说：“现在善于作诗的人，没有像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禹锡那样的水平。”文宗听后默默无语。宰相李珣奏曰：“现在设置诗学士，有些不合适。况且，诗人大

① 《旧唐书》第164卷，《王起传》。

② 《旧唐书》第173卷，《郑覃传》。

③ 此石经现在西安碑林，6502525字。

多数是穷薄之士，不知道对朝廷应尽何责任。现在的翰林学士都有文词，陛下可以与他们一起阅览古今优秀的作品，有疑难问题，也可以向他们请教。陛下过去命王起、许康佐为翰林侍讲学士，天下的人都说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实。我听说宪宗作诗，格调合乎古代的规定。当时一些轻薄之徒，专好雕琢，聱牙崛奇，讥讽时事，求取声名，称为元和体，实际上并非宪宗的本意。今陛下又要设置诗学士，我深深地忧虑一些轻薄小人，竞相作嘲讽时政的诗歌，留心于云山草木之间，岂不也成为开成体了吗？这样做会玷污皇上的德化，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文宗于是作罢。

开成元年（836年）四月，戊戌（二十九日），唐文宗和宰相们从容地谈论历代诗作的优劣，宰相郑覃说：“历代优秀的诗歌作品，莫过于《诗经》三百篇。《诗经》三百篇，都是西周的国人讽刺或赞美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搜集起来，以便了解民间的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没有听说君王亲自写诗的。以后诗人的作品，文字虽然华丽，可是没有实际内容，对改善朝政无所裨益。李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成为亡国之君。陛下为什么要效法他们，如此重视诗歌呢？”

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文宗经常亲自出题，而且亲自过目审阅试卷。开成元年（836年）二月，癸未（十三日），宰臣奏事于紫宸殿，文宗说：“以前诗赋的格律不好，昨试进士，题目是我亲自出的，所见诗赋，似胜去年。”宰相李石说：“陛下改诗赋格调，以正颓俗。高锴亦能励精取士，仰副圣旨。”文宗说：“四方进呈的章奏，用辞非常华丽，但却言之无物，应当处罚掌书记。”李石说：“古代的人因为叙述事情才写文章，现在的人却为了写出华丽的文章，不惜歪曲事实，这种弊病实

在是到了必须扭转的时候了。文宗说：“但效古为文自然，体尚高远。”^①时又诏兵部尚书王起进文场秀句一卷。九月，敕秘书省及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

唐文宗所作的诗在《全唐诗》中保存下来的有以下几首：

大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失败以后，仇士良愈专恣，文宗登临游幸，未尝为乐，或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赋此诗。

宫中题

辇路生春草，
上林花发时（又作上林花满枝）。
凭高无限意，
无复侍臣知。

这首诗表达了文宗在甘露之变以后的忧郁心情。

开成元年（836年）三月，庚申，唐文宗游览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赋《暮春喜雨诗》：

风云喜际会，
雷雨遂流滋。
荐币虚陈礼，
动天实精思。
渐浸九夏节，
复在三春时。
閤□垂朱阙，
飘飘入绿墀。
郊勅既瞰足，

^① 《册府元龟》第40卷，《帝王部·好文》。

黍稷有丰期。
百辟同康乐，
万方伫雍熙。

宦臣、文武百官纷纷写诗属和。这首诗反映文宗观雨祈望丰年的喜悦心情。

题程修已竹障
良工运巧思，
巧极似有神。
临窗忽睹繁阴合，
再盼真假殊未分。

裴度拜中书令，因身患重病，未能拜见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上巳（三月三日），文宗于曲江赐宴，群臣赋诗。唐文宗遣中使赐裴度诗：

上巳日赐裴度
注想待元老，
识君恨不早。
我家柱石衰，
忧来学丘祷。

并赐亲笔手书说：“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异日进来。”文宗的亲笔手书刚刚由宦官送到裴度的家门，裴度已经去世。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唐文宗对朝廷元老重臣裴度的器重、怜爱之情。

上元日诗三首
上会高会集群仙，
心斋何事欲祈年。
丹诚傥彻玉帝座，
且共吾人共大田。

又云：

□生三五叶初齐，
上元羽客出桃蹊。
不爱仙家登真诀，
愿蒙四海福黔黎。

开成三年（838年）夏日，唐文宗与学士联句。时五学士属和，文宗独称赞柳公权词情意足，不可多得。

夏日联句

人皆苦炎热，
我爱夏日长。（唐文宗起上句）
熏风自南来，
殿阁生微凉。（柳公权联下句）

文宗又令柳公权将诗句题写在墙壁上，看了很久，赞叹说：“钟、王复生，无以加矣！”

唐文宗还经常邀请翰林学士到宫中，讨论经义，评论文章，让宫女侍候茶汤饮馔。柳公权是一个饱学之士，文宗经常让他来陪伴自己，谈天说地，往往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房中的蜡烛燃烧完了，文宗还舍不得放他走，便与他坐在黑暗的房里闲聊。宫女只得将蜡烛燃烧时滴下的烛泪，包在纸中揉搓成纸条点燃照明。一次，柳公权陪伴文宗在宫中游玩，文宗忽然对他说：“我有一件喜事，边关上军队将士换季的春衣，长期以来供给都不及时，而今年二月就将春衣发放到边关军队中了。”这确实算得上一件大喜事。柳公权向唐文宗表示祝贺，文宗非让他作一首贺诗。柳公权文思泉涌，只踱了三步，便口诵成章：

去岁虽无战，
今春未得归。

皇恩何以报，
春日得春衣。

文宗对他十分佩服，当即倍加赞赏地说：“你才走了三步，一首好诗便脱口而出，曹子建那样大的才气，还得七步成诗呢！”

唐文宗在听政之余，博览群书，因此，他的学识非常渊博。文宗每对宰臣，未曾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值得一读。文宗说：“朕尝览之。穿凿之学，徒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后为有得也。”^①

有一天，唐文宗在延英殿顾问宰臣说：“《诗》云：‘呦呦鹿鸣，食草之苹’。苹是何草？”^②当时在场的宰相李珣、杨嗣复、陈夷行等人，你瞧我，我瞧你，谁也回答不上来。最后，李珣回答说：“臣按《尔雅》，苹是雫萧。”^③

文宗说：“朕看《毛诗》疏，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雫萧。”^④

又有一天，文宗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⑤宰相们都被问住了，谁也回答不上来，文宗说：“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妃有刘栗金跳脱，是臂饰。’”^⑥

唐朝诗人刘禹锡《赏牡丹》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大和年间，文宗在内殿赏花，问侍臣程修己道：“今京城传唱牡丹诗，谁写得最好？”程修己答道：“中书舍人李正封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此句最佳。”唐

① 《册府元龟》第40卷，《帝王部·文学》。

②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③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④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⑤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⑥ 《唐诗纪事》第2卷，《文宗》。

文宗听后赞叹不已。开成年间，文宗于内殿观赏牡丹，翘足凭栏，忽然吟诵起舒元與所作的《牡丹赋》：“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方理解舒元與诗的深刻寓意，不禁叹息很久，泪下沾襟。因命作乐，聊以自慰。

当时有一个宫女名叫沈翘翘，为文宗唱《河满子》，歌词中有“浮云蔽日”之句，其声调婉转。文宗听了大为感动，问：“你知道吗？此句是《文选》古诗第一首，意思是说忠臣被奸邪所掩蔽。”于是，文宗赐给她金臂环，问她是什么地方来的。阿翘回答说：“我本是吴元济的女儿，元济败，我易姓沈，因善于歌舞而得为乐坊的一名歌女。”又说：“我本来是演奏方响的。这种乐器是用白玉制成的，光亮皎洁，可照十几步远。用一个犀牛角制成的小锤敲击它，即可发出声音。架子是用檀香木制成的，装饰的文彩似云霞之状，芳香袭人，经月不散。制作精巧，不是中国固有的乐器。希望陛下将此乐器赐给臣妾。”文宗命赐给她，并让她用此乐器演奏《凉州》之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文宗称之为天上的仙乐。于是，选宫女做沈翘翘的弟子。

文宗每次听音乐，总不喜欢郑、卫靡靡之音。诏命太常演习开元年间的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伴奏。舞曲练好之后，太常少卿冯定集乐工在宫廷正式演出，冯定站在乐工中间。文宗看到他端正直立，脚下就像生了根一样，问他姓名，翰林学士李珣回答说：“此人是冯定。”文宗非常高兴，又问：“此人莫非就是善于作古文的那个人吗？”于是，召他升阶，文宗亲自吟诵冯定所作的《送客西江诗》。吟罢越发高兴，因赐冯定禁中瑞锦，并令他把所作的古体诗抄录呈上。

开成初年，宫中有一条黄色的蛇，半夜从宝库中爬出来，游于阶庭中，光彩照人，不可擒捉。宫人用珊瑚块投击它，蛇

与珊瑚块都消失不见了。掌管宝库的人将此事报告文宗，文宗下令遍搜库内，得到一个用黄金铸的蛇，头上套着一个珊瑚块。文宗拿起来仔细观看，说：“从前隋炀帝为晋王时，曾以黄金蛇赠陈夫人。我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的侍臣看到蛇的颌部有一个“禊”字。文宗顿时明白了，说：“果然不出我所料！阿禊是隋炀帝的小名。”文宗的博学多识大多类此。于是，命取玻璃连环将黄金蛇系于玉觥的前腿上，其后，再也看不到黄金蛇活现了。

第十八章 恩威并用，安抚四夷

唐文宗在位期间，唐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新罗、日本等国基本上保持着友好和睦关系，发展了双方的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

第一节 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唐朝的东北边境，有契丹、奚、室韦、□□等族，大抵属于东胡族。

唐初契丹居于辽河上游，东接高丽，西接奚境，南到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至室韦，地方三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有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其君长姓大贺氏。“苦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①，可见这时契丹还处于原始社会。突厥强盛时，本臣于突厥，隋大业中，契丹有些部落降于隋朝。唐太宗贞观初年，其酋长摩会，曾率部来降。太宗进攻高丽时，其酋长窟哥，又请内属，因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氏。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契丹遣使朝贡。

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契丹遣使朝贡。

^① 《旧唐书》第199卷下，《契丹传》。

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契丹遣使朝贡。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契丹大首领介落等十九人来朝。

开成元年(836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领列环等三十一人来朝。

开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契丹遣使朝贡。

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契丹大首领萨葛等三十人来朝。

奚地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抵白狼河(滦河上游),北邻黠戛国。有兵三万,分为五部,每部有酋长一人,称为俟斤。风俗大抵同于突厥,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贞观时,曾率部内属,唐于此置饶乐都督府,以其酋长可度为都督,以后和唐朝经常往来。但到后来,契丹起兵反抗,奚常和契丹互为表里,时称“两蕃”。

245

有大历以后,奚经常来唐朝贡,有时一年之中来两、三次。以前,唐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镇割据独立,朝廷姑息迁就。河北蕃镇都力图保住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再与奚、契丹为敌,因此,两蕃亦很少寇边。其每年朝贡,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长三五十人入朝,唐朝皇帝在麟德殿接见他们,赐以金帛遣还。其余的人都留在幽州的客馆中,不去京城朝拜唐朝皇帝。于是,形成一种固定的朝贡制度。

大和四年(830年),奚部落进犯幽州。四月,丁未(初三),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打败了奚部落军,辛酉(十七日),李载义活捉奚部落酋长茹羯,奉献朝廷,唐以其为右骁卫将军。十二月,奚遣使朝贡。

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奚遣使朝贡。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奚大首领匿郎等三十人来朝。

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奚遣使朝贡。

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奚大首领温讷骨来朝。

室韦东至黑水□□,西邻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口(在今黑龙江上游西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而无统一的首领。从事打猎和农业,是已经定居的部落,或数百家或数千家聚居于川谷之地。贞观初年,就曾遣使来唐。唐朝设“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在室韦族居住地区,唐朝设立了室韦都督府,加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室韦遣使朝贡。

大和五年(831年)至八年(834年),室韦凡三次遣使朝贡。

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贡。

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献马五十匹。

开成二年(837年)十二月,室韦遣使朝贡。

开成四年(839年)正月,唐文宗在麟德殿坐朝,接见入朝贺正的室韦大都督阿朱等十五人。同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豈虫等三十人来朝贡。

□□分为粟末和黑水二部,古称肃慎,北魏时称为勿吉。其地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至高丽,北邻室韦。粟末□□居南,黑水□□居北。唐武德时,于其地置燕州,任命突地稽为燕州总管,赐姓李氏。公元722年,唐朝任命在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首领为勃利(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

的伯力)州刺史。公元725年,唐朝在黑水□□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而由唐朝中央政府派遣官吏为长史。这样,唐朝就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和内地的联系。

渤海王国,是以粟末□□为主的政权,“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①。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中宗时,就和唐朝通使往来,玄宗先天年间,在其地设置忽汗州都督府,任命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至此,始去□□号,专称渤海,臣属于唐朝。其职官多模仿唐朝,其官吏服色,也和唐朝一样。与唐相往来,十分频繁。

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四月,渤海遣使来朝。

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

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

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渤海遣使来朝。

大和六年(832年)三月,渤海王子大明俊来朝。

大和七年(833年)正月,渤海王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来谢策命。

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

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渤海王子大延广等人来朝贡。

渤海国国王由唐朝皇帝册封,大和四年(830年),渤海国王大仁秀去世,他的儿子大新德早年死去,于是,他的孙子大彝震被立为国王,改年号为咸和。唐朝以权知渤海国务大

^① 《旧唐书》第199卷下,《渤海传》。

彝震为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

渤海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渤海的土特产如貂鼠皮、海豹皮、鹰（专名海东青）、马、铜、麝香、人参等，都经常输到内地来。唐朝在青州设有渤海馆，专门负责与渤海贸易之事。唐朝也经常赠与渤海锦、绢、缙、帛和金银器皿等物。在文化方面，唐朝内地文化大量传入渤海，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①。不少学生就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有的进士及第，从而带回了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国王遣使向唐朝求经史文化典籍。由于大量吸收内地汉人的文化制度，渤海经济、文化都很发达。

第二节 与回纥、沙陀的关系

248

回纥亦称回鹘，和突厥同一种姓，是现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唐初臣属于突厥，是个游牧部落。其酋长皆自称俟斤，回纥时分九部，号为九姓回纥。有兵五万，人口共十万，活动于娑陵河（今蒙古色楞格河）一带。

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率众内附，进入黄河流域，置六都督府、七州，而总隶于燕然都护府。自此，唐朝和回纥的关系，日趋密切，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也愈趋频繁。

文宗大和四年（830年）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汗国派人来唐贡奉特产或进行贸易时，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唐朝地方政府都担心回鹘兵变作乱，因而，经常要派军迎接和护送，以防

^① 《新唐书》第219卷，《渤海传》。

意外。柳公绰到任后，回鹘汗国派梅录李畅运马一万匹前来交易，柳公绰只派一名牙将单人匹马到边境上去迎接慰劳。李畅抵达太原后，柳公绰命令大开节度使衙门，接受李畅的拜谒。李畅被柳公绰的信任所感动，潸然泪下，告诫他的部下，沿途不准奔驰打猎，侵扰百姓。结果，回鹘此行交易无一侵扰。

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回鹘遣使朝贡。

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回鹘遣使朝贡。

大和六年（832年）三月，回鹘昭礼可汗被部下杀死，可汗的侄子胡特勒被立为可汗。

大和七年（833年）四月，丙戌（二十九日），唐文宗册立回鹘国新立可汗胡特勒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六月，唐文宗任命原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已。李载义到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你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你来欺侮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你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以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可见，李载义下令全部撤除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守卫李畅住的地方。使李畅尊敬而畏惧，不敢再违犯唐朝的法令。

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回鹘遣使朝贡。

开成二年（837年）十月，回鹘遣使朝贡。

开成四年（839年）闰正月，回鹘遣使朝贡。

同年，回鹘汗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杀死。这时，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得到消息后，

他用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自杀，国内人民立**娑炤**特勒为可汗。此后，草原连年发生瘟疫，又大风雪，羊马大批死亡，回鹘汗国因此逐渐衰落。

当时唐朝和回纥最大的贸易就是绢马交易和茶马交易。绢马交易常常是马数万匹易绢数十万匹，主要由官府间主持进行交换。回纥统治者因助唐收复两京，恃功和唐朝进行马、绢不等价的交易，“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①搞得唐朝库藏空虚，马价还偿还不清。直到大和年间，犹常支出绢二十万匹、二十三万匹等偿还回纥的马价。茶马交易的数量也很大。并且，有许多回纥商人留居长安，他们往来西市，资金财产相当雄厚。所以，民间的交易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

居住在河东陁岭以北的沙陀部落，向来以骁勇著称，九姓回纥和六州胡都被沙陀的骁勇所折服。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他奏请朝廷任命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批准他们迁居到云州、朔州的边塞之间，以便保卫河东的北方边境。朱邪执宜和沙陀的诸位酋长前来太原拜访柳公绰，柳公绰热情地设宴招待他们。朱邪执宜神采焕发，态度严肃，进退举止彬彬有礼，柳公绰对幕僚说：“执宜看起来外表严肃，实际上内心对人宽厚；说话虽然缓慢，却条理分明，言之成理，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朱邪执宜的母亲和妻子前来拜见，柳公绰让夫人设宴款待，馈赠礼物，然后把她们送回。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对他的赏识和信任，竭尽全力回报。云州和朔州之间有残破的营栅十一个，朱邪执宜派人把它们一一加以修复，命令他

^① 《旧唐书》第195卷，《回纥传》。

的部落兵士三千人分别镇守。从此以后,在边境上游牧的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等族部落不敢再轻易侵犯唐的边境。

第三节 与吐蕃的关系

吐蕃源出汉代西羌族,发展而成为现代的藏族。活动的地区在今西藏和四川西部一带,都城在唐时名逻些城,即今拉萨。

隋唐之际,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建立了政权,唐初,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各部。贞观八年(634年),派贡使到唐朝。自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日益亲密,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高宗以来,唐和吐蕃的关系日有进展。至中宗时,又以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遂和同为一家了。虽然唐与吐蕃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和平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唐文宗在位期间,吐蕃一直与唐朝保持友好和睦关系。

大和元年(827年)八月,吐蕃使论壮达热进国信、金银器、玉腰带及马等。

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吐蕃遣使朝贡。

大和五年(831年)正月,吐蕃遣使论乞热来朝。

大和六年(832年)又遣使论董勃笼来朝。

大和九年(835年)正月,遣使论_豊热来朝。

开成元年(836年)遣使论悉立热来朝正,并献国信及马。

开成二年(837年)遣使论监通来朝。在此之前,唐文宗遣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从简入蕃。其年五月,吐蕃使者

抵达长安，进国信金银器、玉带、獭褐、犏牛尾、朝霞、杂药并马牛橐驼等。唐文宗将吐蕃送的这些礼物赏赐给宰相以下的文武百官。

开成三年（838年），吐蕃彝泰赞普去世，他的弟弟达磨被立为新赞普。彝泰赞普在位时身体多病，把朝政委任大臣，所以仅能自守，很久没有侵扰唐朝。达磨荒淫残虐，国内人民离心离德，灾害和怪异现象接连发生，吐蕃因此而逐渐衰落下去。

开成四年（839年），吐蕃遣使论焦熟等人来朝。

第四节 与南诏的关系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曾大举入寇四川，掠走大批手工工匠和金银财宝。不久，南诏撤兵，又与唐朝恢复了友好关系。从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到开成五年（840年），南诏多次遣使朝贡。

唐朝中后期，和南诏虽然曾经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战事，但经济、文化的交流没有中断，双方人民的友好关系还是日益增长的。唐朝很多工匠将丝织业技术传入南诏。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陷成都，“乃掠子女工巧数万，引而南，……自是工文织”^①，和内地差不多。内地的佛教、音乐也传入南诏。许多汉人流寓南诏，将汉人文化大量带入。南诏的经济、文化也大量传入内地。如朱金、丹沙、浪人剑、白惇等土特产，都传入唐朝。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谈到南诏

^① 《新唐书》第222卷中，《南蛮传》。

的棉布,唐人称为朝霞吉贝、白^惇吉贝者,织作精致,都已传入内地。南诏还有一种赤藤杖,屡见于唐人的诗歌中,该是南诏的一种特产。此外,南诏乐也传入了唐朝,也为唐朝的十部乐之一。唐朝和南诏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双方经济、文化生活,密切了双方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是当时双方关系的主流。

第五节 与新罗的往来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东边,系由三韩中辰韩的一部发展壮大而形成的。起初因国小地僻,未能和中国通使往来,萧梁时始随百济使者通于梁朝。而至隋开皇时,册封新罗王金真平以来,与中国关系日趋密切。尤其是唐高宗以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与唐朝来往尤为频繁。

253

唐文宗即位不久,大和元年(827年)四月,新罗即遣使朝贡。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与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新罗又两次遣使朝贡。大和五年(831年)二月,新罗马子金能儒与僧九人入朝。同年,因新罗王金彦义去世,唐文宗诏以其同母弟金景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充宁海军使、新罗王,命太子左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前往吊祭册立。^①

开成元年(836年),新罗王子金义琮来谢恩,兼宿卫,次年四月十一日回国,赐物有差。

^① 《旧唐书·新罗传》、《册府元龟·封册》皆误以景徽为彦义子。《唐会要》则不书其血亲关系、又以彦义卒于大和四年。据《三国史记》载,《唐会要》记载为是。

开成二年(837年)十二月,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紫金鱼袋金允夫上疏说:“本国王命臣入朝充当质子已经二十六年了,其间两次蒙授试官,并充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根据以往惯例,都蒙特授正官。”于是,唐文宗授金允夫为武成王庙令。

开成五年(840年)四月,唐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及年满应归国学生共一百零五人并放还。

共计新罗与唐朝的通使往来在一百二十次以上,所以,新罗是和唐朝通使往来最多的邻国之一,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新罗与唐朝的往来不仅次数多,而且内容丰富,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

新罗经常在前王去世、新王继立时向唐朝告哀,并请求册立新王,唐朝也经常派遣吊祭册立使节前往新罗。《全唐诗》中录有十多首皇甫曾、李益、权德舆、刘禹锡等送别赴新罗吊祭册立使节的诗,预祝使者要很好地完成出使的使命,可见唐朝对出使新罗的重视。同样,新罗亦极为重视与唐朝的关系。

朝贡、贺正(祝贺元旦)是政治,也是外交使节的往来。对此,双方也都很重视。新罗所派朝贡及贺正的使节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而唐朝亦封以高官,以重臣之礼相待,并以厚礼回报。可见双方在这方面都很郑重其事,这也是双方睦邻友好政策所必须的。新罗常派宗室或王子来唐朝朝贡、贺正,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在唐朝作为质子,一称侍子,宿卫于唐朝。质子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这当然是消极的。而唐朝对待新罗质子常予以厚赐重赏,以取得好感,或者给以高官厚禄,以安其心。开成时,新罗质子金允夫官为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即是一例。而质子当唐朝遣使至

本国时,还可以充当副使。通过质子加强了唐朝与新罗的联系及相互间的了解和情谊。

唐朝对新罗的朝贡、献方物也常予以回赐,这实质上是双方的官方贸易,而以朝贡的方式出现而已。仅据两《唐书》、《册府元龟》等记载,通过朝贡这种官方贸易由新罗进入唐朝的,动物有果下马等;海产品有海豹皮等;金属有金、银、铜等;佛事有金银佛像、佛经、幡等;金属工艺品有镂鹰铃等;纺织品有朝霞绸、鱼牙绸、纳绸、布等;药物有牛黄、人参等。唐朝回赐的器物有金银钿器物、金带、银钿带、银带、鱼袋等;衣服有紫罗绣袍、锦袍、紫袍、绿袍等;纺织品有锦彩、彩綾、瑞文锦、五色罗彩、绢、帛等;动物有白鹦鹉等。《唐会要·新罗》载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藩之最”,可见其贡献之多。如曾一次输金二千两,一次贡银二千两,一次进入人参二百斤等。唐朝的回赠,曾一次赐锦彩三百段,又一次赐彩綾五百匹、帛二千五百匹等。这些贡献与回赐,除少数专供帝王及其使者享用外,大量是作为交换的商品的。

除朝贡、献方物这种官方贸易外,唐朝和新罗的民间经济交流也很发达。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新罗商人在中国的商业网,北起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南到江淮流域的楚州、扬州。登州有新罗所,楚州、泗州都有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专门用来停居新罗商人。

开成元年(836年)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780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綾、罗、縠、绣织成、细绸、丝、布、牦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蕃互市。”唐朝虽然禁止某些物品与蕃互市,但淄青节度使请求开禁,究竟如何,不悉其

详。不过,从唐代宗到宪宗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李师道等一家是高丽人,并以淄青节度使兼海陆运使、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以其职务之便,自可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至文宗开成五年(840年),青州节度使仍兼押两蕃使,仍然具有和新罗贸易的有利条件。

在双方的经济交往中,除前述官方贸易的贡品外,新罗的刀、剑也传入唐朝。如圆仁回国前经过楚州时,新罗译语人刘慎言就送他九匹绢、新罗刀子十枚。这时,唐朝的茶种也传入新罗,《三国史记》第十卷《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唐大和后期)说:“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经济的交流促进了双方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在文化方面,中国的文化典籍开始传入新罗,唐朝的太学广泛招收外国的留学生。唐朝的京城建筑、职官和选举制度等都影响到新罗。凡是唐朝边境少数民族和邻国到唐朝太学学习的,都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称宾贡进士。新罗到唐朝留学的人,有时一次数人,有时一次十数人或数十人,其中宿卫的质子同样可以入学。新罗人入唐考中宾贡进士后,或即在唐朝做官,或大多数是归国以望有所建树。新罗来唐的僧侣也很多,这些新罗僧人足迹遍布唐朝各地。慈藏是新罗最早来唐的名僧。他于贞观十二年(638年)来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携藏经、妙像、幡花等回国。慈藏回国后,新罗王敕命他为大国统,他制定了许多法规管理教育僧众,从他受戒者很多,因此佛教大行于新罗。他又曾建议改服式,将唐人服饰及礼仪朝会制度传入新罗。沙门圆胜来唐专学僧律,是新罗律宗的创始人。真鉴禅师,于贞元二十年(804年)随岁贡使团渡海至沧州,遇神鉴大

师,始削发 元和五年(810年),受具足戒于嵩山少林寺;又入京师,居于终南山三年;至大和四年(830年)归新罗。这些来唐的新罗僧人,不仅拜访唐朝高僧以求佛法,也与唐朝的士人学者往来,故他们回国时,常有唐文士或僧人赋诗送别。

入唐的新罗学生及其考中宾贡进士者,以及至唐求法的僧侣,他们来时带着新罗的方物和文化习气,回国后传播中国的儒学、佛学和文学艺术,这就成为当时双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唐朝和新罗的文化交流,密切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第六节 与日本友好关系的发展

257

日本,在新罗东南,居大海之中,世与中国通。隋朝时,日本几次遣使到中国。贞观五年(631年),日本再次派使者来唐。有唐一代,日本所派“遣唐使”共十三次,迎送唐朝使者到日本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总计有十九次。日本所派“遣唐使”经常带领许多留学生或学问僧,到唐朝来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经典。特别从高宗起,到中宗、玄宗时,日本大规模地派遣使团来华,多时竟达到一次五百人。所以,唐朝和日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

大和三年(829年),日本仿唐朝造龙骨水车以灌溉农田。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日本遣唐使薛原朝常

嗣等人到达扬州。其第四船搁浅，“大唐迎船十只许来，一日一度运回信物”。一个船上的货物要用十来只船装运，可见其数量之多。次年（839 年）正月，日本遣唐使到达京师长安，正式向唐文宗朝贡，进真珠绢。

日本和尚圆午（号慈觉）随其使常嗣入唐求法，在扬州受到节度使李德裕的热情接待。圆午留唐九年，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第十九章 开成政事，维持残局

开成元年（836 年）正月初一，唐文宗登宣政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建议用神策军代替金吾卫守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认为不妥，极力反对，于是作罢。文宗下诏：

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崔潭峻顷遭诬陷，每用追伤，宜复官爵，听其归葬。^①

二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疏皇帝，要求公开向全国人民宣布：王涯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在奏章中强烈指出：

王涯等人不过一介书生，蒙皇上宠爱，享受荣耀，谁不愿意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怎么能够谋反呢？李训等人实际上只想诛讨宦官，自以为能消除宦官专权，挽救国家的危亡。可是，左右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导致互相残杀，结果，李训、王涯等人被宦官所杀，还诬陷他们谋反。我认为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犯宦官所指控的那些罪行。假如宰相真是图谋不轨，那也应该交给御史台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正式审判定罪。怎么可以允许宦官擅自派出军队，任意杀戮劫掠，祸乱殃及士大夫和平民百姓，血染宫门，僵尸万具。接

259

^① 《旧唐书》第 17 卷下，《文宗纪》下。

着,又以搜捕同党为名,牵连亲戚朋友,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我本打算亲自前往朝廷,当面向陛下陈奏是非善恶,但又深怕连我也被诬陷杀害,以致于事无成。因此我想最好还是恪守自己岗位,加强训练士卒,在朝廷内部作陛下的心腹,在朝廷外部充当陛下的藩篱。如果朝廷中的奸臣确骄横仍难以控制的话,我一定出兵,誓死以清君侧。

仇士良等宦官得知此奏,也很畏惧,因劝文宗给刘从谏加官进爵。丙申(二十六日),唐文宗授予刘从谏检校司徒的中央官衔。

三月,壬寅(初三),唐文宗任命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在一个融洽的气氛中,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地对文宗说:“王涯等人既然已经被杀,他们的家属也都被株连杀绝,尸骨狼藉,无人料理。最好是请朝廷派人代为收拾掩埋,以便顺应阳春祥和之气。”文宗听罢,不免悲伤很久,命京兆尹派人收葬王涯等十一个人的尸体,每人各赐予葬服一套,埋葬在京城西郊。随后,仇士良秘密派人发掘王涯等十一人的坟墓,把他们的尸骨都扔到渭水中。

丁未(初八),皇城留守郭皎上奏说:“南衙各司的仪仗队中,如果有锋利的刀枪,请求一律上交军器库使。以后,凡是仪仗队在列队需要时,另外发给用木头做的仪刀。”文宗批准了郭皎的请求。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又派牙将焦楚长前往京师呈递奏章,辞让朝廷加授他的检校司徒的中央官衔。强调说:“我在此之前上奏朝廷的意见,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如果陛下采纳,那么,就应当为王涯等人平反昭雪。如果陛下不

予采纳,那么,也不应当随便给我办官。现在怎可以不为王涯等含冤而死的官员申冤平反,反而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升官加赏呢!”于是,刘从谏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仇士良等宦官的罪恶。

辛酉(二十二日),唐文宗召见焦楚长,好言安慰解释,然后让他返回。当时,仇士良等人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百官人人自危,每天都担心家破人亡。等到刘从谏的上奏送达朝廷后,仇士良等宦官才开始有所畏惧,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因此宰相郑覃、李石勉强可以施政,文宗也依赖刘从谏的声援而得以勉强维持自己的地位。

四月,己卯(初十),唐文宗提升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当初李训所控制的李德裕、李宗闵党羽,开始稍有人调动升迁。

甲午(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丙申(二十七日),以李固言判户部事,李石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五月十一日,唐文宗登紫宸殿,与宰臣论政说:“为国之道,达到大治是很难的。”李石回答说:“朝廷法令能够实行就容易。我听说周文王掌握升降官吏的大权,陛下对臣属推心置腹,精诚感动上天,还担心天下不能大治?”文宗又问:“治乱是由人的邪正,还是由时运决定的呢?”郑覃回答说:“由圣明的帝王,由忠臣决定的,这是由于人的因素。”李石说:“也由时运决定。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陛下,这就是时运;陛下如何治理天下,这就是人的因素。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当乱离无奈何之际,又安得不依靠时运呢?”文宗说:“你说得对。”李石又说:“咸阳令韩辽请开凿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

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昨日韩辽初步计算，用工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万里内不用车运粮，这样，辕下牛都可以用于耕田，永远造福于秦中。”李固言说：“王涯以前已曾陈奏，实秦中之利，但恐征役令非其时。”文宗说：“莫非阴阳忌讳吗？如果对人民有利，朕没有什么顾虑。”

宰相与文宗论政后下拜退出，外面立刻传出谣言说：“皇上打算把禁军交给宰相统辖，宰相已向皇上下拜谢恩了。”因此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又相互猜疑，人心恐慌不安，好多人几天都不敢脱衣服睡觉，准备紧急应变。宰相李石奏请文宗召见仇士良等人，当面解释误会，消除他们的疑虑。于是，文宗召见仇士良等人，和李石等人一起解释事情的经过，让他们不要轻信谣言，猜疑恐惧，仇士良等人这才不再怀疑，事情才算化解。

闰五月，以河中节度使李程为左仆射，判太常卿事，以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听为河中节度使。文宗曾感慨地说：“把兵权交给他而不用猜疑，把他放到一个闲散位置上而没有怨言，只有李听才能做到。”

乙未，因起居舍人缺员，宰相李固言上奏说：“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都可以胜任此职。”郑覃说：“崔球游于李宗闵之门，并且，赤墀下秉笔，为千古法，不可用朋党。如果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丝毫异议。”结果，由于双方看法不同，没有任命。文宗说：“对于朝廷的公事，你不要总是反对！宰相之间不要矛盾重重。”郑覃说：“如果宰相的意见完全一致，恐怕一定会发生蒙蔽欺骗陛下的事！”

甘露之变以后，唐文宗心情一直很忧郁，常常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左、右神策军踢球比赛也因此十减六七，即使在

出席盛大宴会时，奏乐的伎工满布庭院，文宗也仍没有笑容。文宗在退朝后闲暇的时候，有时候徘徊眺望，有时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哀声叹气。

十一月，壬午（十七日），唐文宗在延英殿对宰相说：“朕每次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总是愁绪满怀。”宰相说：“治理天下不可能急于求成。”文宗说：“朕每次读书观史，看到古往今来的君臣事迹，羞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凡君主。”李石说：“现在南衙和北司的臣僚中，有些小人对陛下还有很多的₂₆₃不满，但愿陛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像刘弘逸、薛季棱那样奏公守法，就应当加以表彰，以便鼓励官员们都奉公守法。”

甲申（十九日），文宗又对宰相说：

“我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后，有些被奸臣所迫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行，只好退朝后喝醇酒，希望喝得大醉，借酒浇愁罢了！”宰相说：“这都是我们失职的过错。”

十一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

十二月，庚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宰相李石对文宗说：“卢钧被授予岭南节度使，朝廷百官都相互庆贺。认为岭南是个富饶的地方，近年来，谁想担任岭南节度使这个职务，都必须用重金贿赂北司的当权宦官，才能如愿以偿。现在，北司不干扰朝政，陛下也应当表彰他们，以便南衙、北司的官员都能奉公守法。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文宗采纳了李石的建议。卢钧赴任以后，以清廉宽惠著称。

开成二年（837年）正月，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序说：

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

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犄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约计中外兵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收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食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焉。^①

二月，王彦威又进所撰《唐典》七十卷，起武德，终永员。

四月，诏将仕郎、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陈夷行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五月，以东都留守裴度为太原尹、兆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依前守司徒、中书令。以户部侍郎李珣判本司事。以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以前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为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以苏州刺史卢商为浙西观察使。

八月，庚戌（十九日），唐文宗册封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唐敬宗的儿子李休复为梁王，李执中为襄王，李言杨为杞王，李成美为陈王。癸丑（二十二日），立自己的儿子李宗俭为蒋王。

十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依前同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前西川节度使杨嗣复为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十二月，以前忠武军节度使杜□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时杜□已经正式授官，久未向皇上谢恩。户部侍郎李珣奏杜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正在为他的妻岐阳公主服丧。李珣因此事而对文宗说：“根据唐朝丧礼的规定，驸马为公主服丧三年，士族之家不愿做皇亲国戚，原因就在于此。”

文宗闻奏大惊，即日下诏说：

制服轻重，必资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行期周，永为定制。^①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甲子（初五），天刚刚亮，宰相李石从亲仁里家中上早朝，走到半路，暗中埋伏在故郭尚父（子仪）宅的强盗，向李石发射冷箭，箭头只擦伤了他一点皮肤。左右侍从四散逃走，李石的空骑受到惊吓后，回头飞奔回家。想不到坊门里也埋伏着杀手进行拦截，挥刀向李石砍去，砍断了马的尾巴，李石幸免一死。唐文宗接到报告后，大为惊骇，立即派遣中使进行慰问，赐金疮药，又派六军兵士三十人保护宰相。同时下令中央和地方政府紧急搜捕，捉拿刺客，但是没有抓到凶手。

乙丑（初六），进宫朝见的文武官员只有九个人，京城人心慌慌，骚动数天以后，才安定下来。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继甘露之变以后的乱局，出任宰相。当时，危机四伏，人人恐惧，宦官骄横凶暴，为所欲为。李石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忘我操劳，以致朝廷的法制和社会秩序初步恢复，朝廷运转基本趋于正常。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因此十分痛恨他，秘密地派出杀手行刺。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李石非常恐惧，屡次上疏声称有病，请求辞职。唐文宗完全明白李石辞职的真正原因，可是也无可奈何。丙

^① 《旧唐书》第17卷下，《文宗纪》下。

子(十七日),任命李石带同平章事的头衔,为荆南节度使。及李石赴镇,没有举行天子赐宴的仪式,朝廷百官为李石感到悲伤。李石,上表辞让中书侍郎,于是,加李石检校兵部尚书、兼平章事。

李石卸任以后,唐文宗以诸道盐铁转运使、正议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宏农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杨嗣复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朝议郎、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珣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判户部事。

宰相陈夷行性情耿介正直,他厌恶杨嗣复的为人。每当宰相在一起议论朝政时,二人往往争论不休,互相斥责。陈夷行以脚病为由,请求辞职,文宗没有批准。

宰相杨嗣复打算向朝廷推荐提拔李宗闵,恐怕郑覃作梗,于是,先通过宦官在宫中私下说服文宗。二月,乙未,唐文宗对宰臣说:“李宗闵被贬在外地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应当在朝廷授予他一个职位。”郑覃说:“陛下如果怜悯李宗闵贬得太远,只可把他向内地调动几万里,而不宜再召回朝廷任职。如果再重用他,我先请求辞职。”陈夷行说:“李宗闵过去在朝廷结党营私,扰乱朝政,陛下为什么偏爱这种卑鄙小人?”李珣主张授予李宗闵一官。陈夷行说:“过去,舜放逐四凶而天下大治,朝廷如果求治,为何可惜这十几个被贬逐的人呢?”杨嗣复说:“办事应该守中庸之道,不能以个人的爱憎作为标准。”文宗说:“让李宗闵作一个州刺史总可以吧!”郑覃说:“那恐怕对他太优待了,最多让他担任洪州司马。”陈夷行说:“李宗闵养成郑注的罪恶,几乎倾覆朝廷,他是国家的一大蠹虫!”杨嗣复说:“以前,陛下想要给郑注加官,宗闵不同意,陛下总该记得吧!”郑覃说:“杨嗣复是李宗闵的同党,

包庇李宗闵。我看李宗闵的罪恶超过了李林甫。”杨嗣复说：“郑覃此话太过分了！昔玄宗末年，委任李林甫，嫉贤妒能，破人家族。李宗闵在位的时候，没有干过这种坏事，况且，大和末年，李宗闵、李德裕同时得罪，两年之后，李德裕再领重镇，而李宗闵仍然未离开原来被贬的地方。陛下惩恶劝善，进退之理应当一视同仁。这并不是说我是李宗闵的同党，敢包庇他。最近，殷侗与韩益奏请复官，我考虑到韩益前年犯贪污罪，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而郑覃为他说情，对我说，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追究了！请问谁在为朋党包庇人呢？”

为李宗闵复官一事，郑覃、陈夷行和杨嗣复相互争论不休，相互攻击对方为朋党。文宗对起居郎周敬复、起居舍人魏瓘说：“宰相吵成这个样子，难道能够允许吗？”二人回答说：“这样下去当然不行。不过，郑覃、陈夷行是出于对陛下的忠心，因而对杨嗣复的态度激愤，自己也没有察觉。”最后，唐文宗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

当初，宰相李固言和杨嗣复、李珣关系密切，所以推荐二人当宰相，以便排挤郑覃、陈夷行。朝廷每次商议朝政的时候，双方都争论不休，是非竞起，文宗不能决断。

七月，唐文宗任命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为□宁节度使。这两个人的任命都是由杨嗣复拟议。文宗在延英殿召对宰相，问陈夷行说：“最近，我任命两个藩镇的节度使，你以为合适吗？”陈夷行回答说：“如果是出自圣上的本意，那么，就合适。”杨嗣复说：“如果是出自圣上的本意，并且合乎实际，那么，人情都满意。如果虽然出自圣上的本意，但不太合乎实际，作为臣下怎么能不说话呢？”文宗说：“的确如此，朕本来就没有私心。”陈夷行说：“自最近几年以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杨嗣复说：“齐桓公在仇

虏当中挑选管仲作宰相，哪有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顾虑呢？”文宗很不高兴。

仙韶院乐官尉迟璋被授予王府率的官职，右拾遗窦洵直在朝廷争论说：“伶人自有本身的官职，不应当授予清秩。”郑覃说：“如此区区小事，不值得在朝廷争论！王府率是六品杂官，窦洵直却说是清秩，这样说合适吗？我认为窦洵直是沽名钓誉。”杨嗣复说：“我曾听说窦洵直这个人很深沉，今在朝廷论一乐官，是有点莫名其妙，但也不足为怪。”陈夷行说：“谏官在朝廷上只应当议论宰相的得失，不应当议论乐官。但是，既然已经议论了，就必须作出决定。今后乐人每隔七八年可以升迁一官，不然，则加手力课三数人。”文宗说：“可以重新授予他一个官职。”于是，授予窦洵直充州长史，赐绢一百匹。

文宗在紫宸殿与宰相议论政事，说：“天宝中政事，实在不太好。当时姚崇、宋轸在不在？”李珣回答说：“姚崇已死，宋轸罢相。”他又接着说：“人君明哲，但善始善终特别难。玄宗曾说：‘自即位以来，未曾杀一个无罪的人。’而任李林甫为相，放纵李林甫陷害破人家族，玄宗不是很糊涂吗？”陈夷行说：“陛下不可以把权力交给别人。”杨嗣复说：“夷行所说的话太随便了！唐太宗用房玄龄当宰相十六年，魏征十五年，何曾失道？臣以为任用房、魏，即使时间再长，也不为不理，而任用邪佞之人一日便足以败国。”陈夷行所言都是影射杨嗣复专权。

唐文宗用郭橧为坊州刺史，右拾遗宋祁认为不可。不久，郭橧犯贪污罪，文宗对宰相说：“宋祁论事可嘉，他授此官是什么时候？”杨嗣复说：“去年。”又说：“谏官论事，陛下只记其姓名，论事正确，应当奖励；论事不当，也应当让他知

道。”陈夷行说：“谏官论事，是他的本职工作。如果论一事则加一官，那么，官何由得，不免有私情。”文宗说：“私情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理平之时，也不可免。”文宗竟以夷行言辞偏激，而渐渐疏远他，不久，罢免陈夷行宰相的职务，守吏部尚书。

十二月，诏以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可守司徒、中书令。守太子太师、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同平章事郑覃罢太子太师，仍三五日入中书。

开成四年（839年）三月，唐文宗对宰臣说：“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李珣对曰：“邦国安危，亦如人之身。当四体和平之时，长宜调适，以顺寒暄之节。如恃安自忽，则疾患旋生。朝廷当无事之时，思省阙失而补之，则祸难不作矣。”

269

河东节度使裴度回到京城，由于身体有病，回到家中卧床不起，未能拜见文宗。文宗接连派遣中使到他家慰问赏赐。三月，丙戌（初四），裴度去世，朝廷追赠谥号为“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没留下给朝廷的遗表，派人问他的家属，找到一份没有写完的手稿，手稿中只说自己为皇上没有立太子而担忧，而没有提及自己的个人要求。裴度的身材和相貌并未超过一般人，但威望却远达周边的蛮夷各族，蛮夷各族酋长见到唐朝的使者，常常问裴度的年龄多大？是否还得到朝廷重用？他和郭子仪一样，都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德高望重，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维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人物。

四月，戊辰（十七日），唐文宗称赞判度支杜□的才能，杨嗣复、李珣乘机奏请杜□为户部尚书。陈夷行说：“对臣下任命的旨意应当由皇上作出。自古以来，国家所以覆亡，往往

由于大权旁落，而由臣下专权所造成的。”李珣对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商量，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天下太平。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圣上，那还用宰相做什么？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表议论则表示怀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则常僚，岂能自保？陛下曾对我说过：‘窦易直劝我，宰相提出任命官员的名单，只是五人留三人，两人勾一人。他应当劝我谨慎地选择宰相，而不应劝我猜疑宰相。’”文宗说：“易直此话太庸俗了。”又说：“韦处厚作宰相，三天当中提荐了六个节度使，也有点儿离奇。”

五月，丁亥（初七），唐文宗和宰臣们一起议论朝政。文宗问：“延英政事，每日由谁记录监修？”李珣说：“由我负责。”陈夷行说：“宰相记录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政的情况，一定炫耀自己的才能，这样，皇上的圣德将被掩盖。所以，我屡次说过不应该使臣下专权而作威作福。”李珣说：“陈夷行的言外之意，是怀疑宰相中有人玩弄陛下的权威。我以前多次请求辞职，现在，如果能让我担任皇子诸王的太傅，也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了。”郑覃说：“陛下在开成元年（836年）、二年（837年）处理朝政最为完美，三年（838年）、四年（839年）就渐渐不如以前了。”杨嗣复说：“开成元年（836年）、二年（837年）是郑覃、陈夷行担任宰相，政事当然完美，三年（838年）、四年（839年）我和李珣共同主政，当然不如以前了。我承蒙陛下厚爱，提拔为宰相，不能尽心尽职。郑覃说开成三年（838年）以后，政事一年不如一年，看来此话意思是说罪责在我了！”因而，叩头说：“我今天就辞职，不敢再进中书省了。”随即急步退出。文宗派人把他召回，好言安慰说：“郑覃失言，你又何必这样！”郑覃起身道歉说：“我性情

愚笨,说话没有顾虑。近来朝政逐渐转好,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也没什么关系。刚才我说的意思不是针对嗣复一人,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反感,看来是嗣复容不下我。”杨嗣复说:“陛下不以我才能浅薄,用为中书侍郎。朝政好坏,我负有一定的责任。陛下每月给我俸禄数十万,又赏赐我许多珍异的物品,目的是想让我辅佐陛下,使天下达到大治。既然朝政一年不如一年,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罪过,而且也连累皇上的圣德。我请求皇上另外任用贤能的人,允许我辞去宰相的职务。”文宗说:“郑覃的话是偶然说出来的,你怎么抓住不放?”

杨嗣复退下,一连三次上疏辞职,文宗派宦官把辞呈退回。他又几天不上朝,再三上表请求辞职。文宗派宦官召他上朝,癸巳(十三日),杨嗣复才开始上朝。文宗刚刚起用杨嗣复,非常信任他,而认为郑覃、陈夷行议论政事,言辞过于偏激。丙申(十六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郑覃的性情清正俭约,陈夷行也性情耿直,所以,杨嗣复等人十分痛恨他们二人。郑覃、陈夷行罢相后,朝廷大权尽归杨嗣复了。

唐文宗对宰臣说:“新修《开元政要》如何?”杨嗣复回答说:“臣等未看到此书。陛下欲以此书传示子孙,则应先把此书交给我们审查,参定可否。因开元政事与贞观不同,玄宗有时喜好畋猎,有时喜好声色,选贤任能,未得尽美,撰述此书给后人看,重要的是设立规范,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文宗又对宰臣说:“贞元政事,初年特别好。”李珣说:“德宗中年喜好财货,方镇给他进奉财物,他就给节度使加官进爵。租赋出于老百姓,再让贪官污吏聚敛财富,自然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这些贪官污吏用从百姓身上榨取的财物向

皇上进奉,从而得到皇上的恩宠。这样,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好呢!”文宗说:“人君聚敛财货是不行的,而应该减轻百姓的赋税,节约政府开支。”李珣又说:“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王_圭、魏征启告太宗不要改变初心,意即在于此。自古以来,做好事而能坚持到底,确实很难啊!”文宗说:“朕心永远不改变,一定善始善终。”

六月,因久旱不雨,文宗十分忧虑。宰相等人对他说:“水旱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改变的,请圣上要多多保重龙体,不要过分忧虑。”文宗脸色骤变,说:“朕为一国之君,无德政惠及天下百姓,导致如此天旱,这是天在谴责我呀!如果再过三天不下雨,我就退归南内,更选贤明的人来主持国家的大政。”

宰臣呜咽流涕,纷纷请求皇上免除自己的职务。当天晚上,果然天降大雨。

七月,唐文宗任命大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八月,以左仆射牛僧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十月,杨妃请求文宗立自己的弟弟安王李溶为太子,文宗和宰相商议,李珣反对。丙寅(十八日),文宗立敬宗的小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文宗旧病逐渐加重,十二月,乙亥(二十七日),文宗病情稍有好转,这一天,坐在思政殿召见翰林院值班学士周墀,和他一起喝酒。文宗问他:“朕可以和前代王朝的哪个帝王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可以和尧、舜相比!”文宗说:“朕岂敢和尧、舜相比!希望你能告诉我,我是否能比得上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大惊,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亡国之君,

怎么可以和陛下相提并论！”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受制于各地强大的诸侯，而今朕受制于宦官家奴。就此而言，我恐怕还不如他们！”文宗说着说着便伤心地哭泣起来，泪水湿透了他的衣襟。周墀也拜伏在地，流泪不止。从此以后，文宗一病不起，不再上朝。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戊寅朔（初一），文宗因病重没有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己卯（初二），唐文宗下诏，立颖王李鐔为皇太弟，凡国家军政大事，由他全权处置。诏令又说，皇太子李成美尚年幼，没有经过老师的训导，仍封为陈王。当时，文宗病重，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宰相杨嗣复、李珣来宫中，打算由他俩辅佐太子代行皇上的职权，处理朝政。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鉴于当初立皇太子的时候，自己没有一点功劳，于是上言，说皇太子年幼，而且有病，建议废除重立。李珣说：“皇太子的地位已定，怎么能轻易改变！”于是，仇士良、鱼弘志假称文宗的诏令，立李鐔为皇太弟。当天，仇士良、鱼弘志率禁兵至十六宅宫，迎接颖王李鐔到少阳院。接着，百官在思贤殿拜见李鐔。

辛巳（初四），唐文宗在太和殿驾崩。朝廷任命杨嗣复暂摄冢宰，主持治丧。

文宗遗诏说：

敕 朕以寡昧，祇承丕业。慕贞观之至化，希开元之中兴，十有五年，勤劳宵旰，虽俗未臻于仁寿，而物或近于义宁。斯乃群后叶心，岂朕独致？自谓励精未已，治平可期，诚不感通，宿疾重遘，药石无补，至于弥留。惟怀懿图，宜有顾托，是用审讯，其听予言。皇太弟鐔，睿哲明裕，孝友温文，中正宽仁，博达周敏，必能扬祖宗之休烈，阐皇王之令犹，宜于枢前即皇帝位，仍以门下侍郎

平章事杨嗣复摄冢宰。军国务殷，岂可久旷？以日易月，宜遵旧章。皇帝三日而听政，二十七日释服。天下节度观察防御等使，及监军诸州刺史，职守非轻，并不得离任赴哀。天下人吏百姓，告哀后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婚嫁祠祀饮酒食肉。释服之后，无禁举乐。文武官等，朝晡临事，皆十五举音。宫中当临者，非时无得擅哭。汉文薄葬，朕实慕之，营奉山陵，务从俭约，勿以金银彩缘饰丧具。医术之徒，夙夜劳苦，深可矜念，不须加罪。仙韶乐官，勒归本司。五坊鹰犬，并令解放。呜呼！生死常期，今古无异，予素知远，何足甚哀！咨尔将相卿士内外腹心爪牙之臣，其敬保我太弟，缉宁邦家，成朕素怀，克底于道。布告遐迩，咸使闻知。^①

癸未（初六），仇士良劝说皇太弟李鐔下令，命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自尽。李鐔又下敕，命于本月十四日举行文宗大殓的仪式，凡亲属和百官等一律穿上丧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大殓的日期太远，李鐔不听。这时，仇士良等人仍怨恨文宗，于是，凡教坊的乐工和曾经被文宗宠爱的宦官，相继被诛杀或贬逐。裴夷直又上言：

“陛下由藩王的身分继承帝位，所以应当谨慎忧惧，内心充满哀伤及敬慕，迅速举行丧礼，早日商议大政方针，以便安抚天下人心。可是，现在文宗皇帝去世还不到几天，就多次诛杀他的亲近臣僚，以致各地的官员都被惊扰，先帝的在天之灵不免也被伤害。这样下去，人们会怎样看待陛下呢？现在国家的体制最为重要，假如先帝的亲近臣僚无罪，就不应该惩罚他们，假如他们有罪，他们已经处于国家法律的天罗地网

^① 《唐大诏令集》第12卷，《帝王·遗诏》。

之中,无法逃脱,等十天后先帝入棺大殓结束,再惩罚也不晚。”李鐔不听。

辛卯(十四日),文宗的尸体正式入棺大殓。同一天,武宗李鐔即皇帝位。

唐文宗享年三十三岁,群臣谥曰“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其年八月十七日,葬于章陵。

唐章陵在今陕西富平西北天乳山。该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陵墓建筑与顺宗李诵丰陵基本相同。陵园周围二十公里。现存陵前石刻有华表一对、石狮一只、石人一尊,均已残毁。陪葬墓有贤妃杨氏墓一座,今已无考。

附 录 唐文宗朝大事年表

宝历二年 (826 年)

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李悟勾当军国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江王李涵入宫。

癸卯(初十),江王李涵在紫宸殿外廊接见宰臣,下教处分军国事。

乙巳(十二日),宰臣百僚三上表劝进,文宗李涵正式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改名为李昂。

庚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和元年 (827 年)

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和。

六月,癸巳(初三),唐文宗任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七月,原横海军节度副使李同捷除兖海节度使,不受诏,结幽镇谋叛。

癸酉(十三日),朝廷举行葬礼,在庄陵埋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李湛,庙号为敬宗。

八月，庚子（十一日），唐文宗下诏削夺李同捷在身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和义成节度使李昕、义武节度使张□，各率本镇兵马讨伐李同捷。

大和二年（828年）

二月，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

三月，唐文宗亲自主持制举考试，贤良方正科考生、昌平县人刘_凶对策，抨击宦官专权跋扈，下第。裴休、李_珣、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为之鸣冤，李_珣上疏让官，不报。

六月，晋王李普去世。辛酉（初七），朝廷追赠为悼怀太子。

九月，丁亥（初四），王智兴奏称攻下横海管辖的棣州。

甲午（十一日），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暗地里援助李同捷，唐文宗下诏，撤消王庭凑担任的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及其爵位，命令诸道兵马四面围攻讨伐。

十月，魏博军队在平原打败横海军，接着，乘胜攻占了平原城。

十一月，乙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李□为横海节度使。

十二月，丁巳（初六），王智兴奏报 他的兵马使李君谋率兵渡过黄河，攻破横海管辖的无棣县。

壬申（二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去世。

戊寅（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魏博行营都知兵马使元志绍率所部兵马二万人谋叛，回逼魏州，欲杀史宪诚父子。

丁丑(二十六日),唐文宗命谏议大夫柏耆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同时,征发义成、河阳两道兵马讨伐元志绍。

大和三年 (829 年)

正月,李听和史唐率军联合进攻元志绍,打败他的军队,元志绍率五千人逃往镇州。

李载义奏称攻占横海沧州长芦镇。

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接着进攻德州。

四月,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写信给李□,请求投降。

乙亥(二十六日),柏耆斩李同捷于将陵,沧景(横海)之乱平定,李□入沧州。

五月,辛卯(十三日),朝廷贬柏耆为循州司户。不久,李□去世。

六月,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史宪诚为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史孝章为相卫节度使。

甲戌(二十六日),魏博将士哗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为留后。新任节度使李听入城不得。

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毫无准备,大败而逃,士卒损失逃亡过半,輜重兵器全部丢弃。

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划归魏博管辖。

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

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官职和爵位。

甲戌(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吏部侍郎李宗闵为同平章事。

九月,辛巳(初四),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縠綾罗等衣服。

壬辰(十五日),以兵部侍郎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十月,丙辰(初九),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

十一月,甲午(十八日),唐文宗亲赴圜丘祭天,宣诏大赦天下,禁止各地进献奇技淫巧之物。

丙申(二十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报:南诏侵犯边境,袭击并攻陷了□、戎二州。

甲辰(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兵和南诏军队在邛州以南交战,西川兵大败。南诏乘胜攻占邛州。

十二月,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暂时负责东川节度使事。

庚戌(初四),南诏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将士退守牙城,抵抗南诏军队。

壬子(初六),唐文宗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

南诏军队侵犯东川,进入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西城。郭钊写信责备嵯颠入侵,蛮兵退去。

南诏军队驻留成都西城十天,之后大肆掠夺妇女和各种工匠几万人,以及各种珍宝奇货退去。

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再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

大和四年 (830 年)

正月,戊子(十三日),唐文宗立儿子李永为鲁王。

辛卯(十六日),唐文宗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二月,乙卯(初十),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兴元府新兵发生哗变,节度使李绛全家遇害。

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安抚回鹘、沙陀等族。

温造与兴元都将卫志忠设计杀害哗变新兵八百多人。己丑(十五日),兴元监军杨叔元被流放到康州。

六月,丁未(初五),唐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军,等病情减轻后,可三、五天一入中书门下。

七月,癸未(十一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宋申锡为同平章事。

九月,壬午(十一日),以裴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因病辞职,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大和五年 (831 年)

正月,庚申(二十一日),卢龙监军奏报副兵马使杨志诚作乱,节度使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

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带同平章事的头衔,任命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戊戌(二十九日),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诬告宰相宋申锡与漳王李凑谋反。

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锡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太子右庶子。

癸卯(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

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五月,丙辰(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 本道派遣使者去南诏,索要其掠夺的西川百姓,总计四千人返回。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来降,不受。

十月,戊寅(初四),李德裕奏报 南诏出兵侵犯□州,攻陷三个县城。

大和六年 (832 年)

正月,群臣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文宗辞去尊号而不受。

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

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原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为枢密使。

十二月,乙丑(初七),牛僧孺罢相,充任淮南节度使。

丁未(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大和七年 (833 年)

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

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

六月,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

乙亥(十九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

进士科停考诗赋。

诏诸王出阁。

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

杜牧作《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及为《孙子》作注。

九月,以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

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四次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文宗最后仍不接受。

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风后不能说话。

大和八年 (834 年)

正月,丁巳(初五),唐文宗的病情稍有好转,亲临太和殿,接见左右亲近的臣僚。

六月,文宗因久旱下诏求雨,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认为,现在求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处死郑注而为宋申锡平反。

八月,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

十月,辛巳(初四),幽州军队内乱,将士驱逐节度使杨志

诚和监军李怀件，推举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守事务。

庚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甲午（十七日），李德裕罢相，以同平章事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任命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

乙巳（二十八日），礼部贡院奏请进士科考试仍然加试诗赋，文宗批准。

丙午（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王元逵暂为留后。

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杨志诚流放到岭南。杨志诚走到半路，被朝廷派人杀死。

乙亥（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带同平章事的头衔。

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得到文宗的批准。

幽州奏报 莫州发生兵变，刺史张元湑去向不明。

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

癸未（初七），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留后。以王□为尚书左丞。

大和九年（835 年）

正月，乙卯（初九），唐文宗任命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巢县公李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齐王。

唐文宗征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池和昆明

池。

三月，丙辰（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节度使。

四月，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癸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丙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镇海节度使。

唐文宗任命京兆尹、河南人贾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二十五日），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五月，乙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

戊辰（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六月，壬寅（初四），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因与王守澄争权不和，李训和郑注乘机劝文宗出杨承和为剑南西川监军，韦元素为淮南监军，王践言为河东监军。

七月，甲辰朔（初一），唐文宗贬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辛亥（初八），唐文宗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壬子（初九），唐文宗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

丁巳（十四日），唐文宗下诏，命各地测试僧尼，凡读经不合格者，一律遣归还俗。同时禁止再修建新的寺院和私自剃度百姓为僧尼。

甲子（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仍为翰林侍讲学士。

八月，丙子（初三），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命女学士宋若宪自尽。

丁丑(初四),唐文宗任命太仆寺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

戊寅(初五),贬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珣为江州刺史。

丙申(二十三日),免去剑南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的职务,把他们分别发配到边远的象州、恩州等地监管。不久,又派人追命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自尽。

九月,癸卯朔(初一),唐文宗下诏:凡是李德裕、李宗闵的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学生弟子和原来的部下,除今日以前贬黜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再追究。

盐铁使王涯奏请改革江淮、岭南地区的茶叶税收办法,增加茶税。

癸亥(二十一日),山南东道监军宦官陈弘志在青泥驿被杖杀。

丁卯(二十五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

戊辰(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己巳(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與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并为同平章事。

十月,郑注再三请求文宗停止继续淘汰僧尼,文宗批准。

辛巳(初九),文宗派遣宦官李好古前往王守澄的住宅,赐王守澄毒酒,把他杀死。

庚子(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其他职务仍旧不变。

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李训、郑注、舒元舆等谋诛宦官,发动甘露之变,未成。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郑注等。

甲子(二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郑覃为同平章事。

乙丑(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

十二月,诏六道巡边使田全操等还京师。以薛元赏为京兆尹。

开成元年 (836 年)

正月,辛丑朔(初一),唐文宗御临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

二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朝廷,请问宰相王涯等人被杀的罪名。丙申(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刘从谏为检校司徒。

三月,壬寅(初三),唐文宗任命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四月,己卯(初十),唐文宗任命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

甲午(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闰五月,乙酉(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听为河中节度使。

七月,以魏轶为补阙。

九月,丁丑(十一日),宰相李石上言文宗,为前宰相宋申锡鸣冤。庚辰(十四日),唐文宗下诏恢复宋申锡的所有官爵,任命他的儿子为成固县尉。

十二月，庚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

开成二年（837 年）

四月，乙巳（十二日），唐文宗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仍兼任其他职务。

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为同平章事。

六月，河阳发生兵变，节度使李泳逃奔怀州。丁未（十五日），唐文宗贬李泳为澧州长史。戊申（十六日），任命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七月，辛未（初十），韦温罢太子侍读。

八月，庚戌（十九日），唐文宗册封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唐敬宗的儿子李休复为梁王，李执中为襄王，李言杨为杞王，李成美为陈王。癸丑（二十二日），立儿子李宗俭为蒋王。

十月，国子监《石经》刻成。

戊申（十八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开成三年（838 年）

正月，甲子（初五），宰相李石上朝时，半路上有盗贼用弓箭暗杀他，受了轻伤。

丁卯（初八），唐文宗追封已经去世的齐王李湊为怀懿太子。

戊申（疑误），唐文宗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珣并为同平章事。

宰相李石请求辞职，丙子（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李石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丁酉（疑误），唐文宗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

五月，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下诏禁诸道言祥瑞。

九月，壬戌（初七），文宗议废太子。

壬申（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

十月，庚子（十六日），皇太子李永突然去世，朝廷赠谥号为庄恪。

开成四年（839 年）

三月，丙戌（初四），裴度去世，朝廷追赠谥号为文忠。

五月，丙申（十六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

七月，甲辰（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太常卿崔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月，丙寅（十八日），唐文宗立敬宗的小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840 年）

正月，己卯（初二），唐文宗下诏立颖王李鐔为皇太弟，全权处置国家军政大事。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

辛巳（初四），唐文宗驾崩于太和殿。